炎黄春秋

建国前后
深恐执政党腐败的毛泽东

中苏论战
邓小平舌战赫鲁晓夫

法大，权大？一场艰难的诉讼
——奚弘状告《人民日报》侵权案审理始末

关于“吴晗问题”性质的高层争论

“满洲共党要案”与楚图南

知过必改 方为马列
——纪念博古诞辰90周年

明末忠良杨继盛冒死斗奸佞

1997 5
总第62期

上图　朝露　作者　王明明

右图　前人诗联　作者　张虎

《当代炎黄书画精萃》

《当代炎黄书画精萃》

作品选登

炎黄春秋

1997/5 （总第62期）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絜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洪 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王恂 舒元璋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简祖扬 李华鹏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 徐 孔

副秘书长： 段向群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邮编：100802

电话：66170955

印刷：河北省丰润县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M

出版日期：每月8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阅价：4.00元 零售价：5.00元

目 录

英杰谱

②**建国前后 深恐执政党腐败的毛泽东** …………… 李月兰

⑥中苏论战 邓小平舌战赫鲁晓夫 …………… 刘金田

⑪**知过即改，方为马列**

——纪念博古诞辰90周年 …………… 温济泽

法制苑

⑯**法大，权大？一场艰难的诉讼**

——奚弘状告《人民日报》侵权案审理始末 …………… 丁 文

春秋笔

㉘**关于“吴晗问题”性质的高层争论** …………… 苏双碧

遗闻录

㊳**“满洲共党要案”与楚图南** …………… 魏亦胄

㊹我三次见到叶挺军长 …………… 邹健东

㊼1950**年：上海拉响空袭警报** …………… 会 军 汪 洋

求实篇

㊾毛泽东书赠傅斯年的是《焚书坑》 …………… 王戎笙

㊿**莫再把彭述之照片错当陈独秀** …………… 唐宝林

同心结

(52)**从越南来的洪水将军**

…………… 洪 峰 范 硕 韩守文

人海浪

(56)毛泽东蒋介石座上客 根据地国统区穿梭人

胡仁奎传奇 …………… 何 奇

(62)**奔向延安热土** …………… 朱鸿召

(65)研究泰山历史的年轻学者周郢 …………… 王兆麟

文荟园

(67)乐坛英才郑律成 …………… 申 春

(70)**一支拙笔歌昌世 三副长联颂伟人** …………… 刘 利

古镜台

(72)**明末忠良杨继盛冒死斗奸佞** …………… 春 晓

(74)“天国”内讧焚毁南京报恩寺塔 …………… 经盛鸿

九州景

(76)北洋天然水寨刘公岛 …………… 吴济夫

(77)**在嘉峪关上** …………… 陈淀国

编读窗

(78)**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

——读萧克《朱毛红军侧记》有感 …………… 靳树鹏

建国前后深恐执政党腐败的毛泽东

● 李月兰

精通中国历史的伟大思想家和政治家毛泽东，深深懂得治国之道。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就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谈过，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避免“人亡政息”的新路，是完全可以跳出黄炎培所提到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期率的支配。新中国建立之前，他谆谆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国解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党地位，毛泽东在重视言传的同时，更重视身教。他率先垂范，谦虚谨慎，廉洁自律，成为全党楷模。

在凯歌声中他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制定了反对歌功颂德的一系列禁令

1948年8月13日，当时担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打电报给周恩来，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说“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商量后，赐以指示”。毛泽东看罢吴玉章的电报，联想到当时有的同志在报刊上将自己的名字与“马恩列斯”齐名的情况，十分不安。立即于8月15日给吴玉章写信说道：“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毛泽东的这段话，充分表明了他作为一个伟人虚怀若谷的胸襟。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使中国的革命事业赢得了成功，在全党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得到人们的称赞和崇拜，是很自然的事。实际上，吴玉章的意见，也是党内对毛泽东赞颂和推崇的真实反映。即使如此，毛泽东却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的集体结晶。

在毛泽东看来，对待歌功颂德现象的问题

能否解决好，直接关系到领袖与政党、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为此，他将这个问题上升到原则立场的高度去看待。

为了在执政以后继续保持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防止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腐化和官僚化，就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力戒骄傲。强调："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处处严于律己，模范地遵守了以上的禁令。

1950 年 5 月，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沈阳市人民政府为此致函中央新闻摄影局，请求代摄毛泽东全身八寸站像四幅。毛泽东在来函中"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写："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铜像"旁批写："只有讽刺意义"。

同年 9 月 20 日，毛泽东又就中共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正在韶山为他修建一所房屋和一条公路的事情，致信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和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指示："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

10 月，他在北京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天安门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建议上批示："不要这样做。"

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毛泽东身体力行，同全国人民一起共度难关。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全国人民在定量，我也应定量。是不是肉不吃了，你们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带个头啊？"当身边工作人员同意后，毛泽东庄严宣布："那好，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虽然他最喜欢吃红烧肉，但七个月竟没有吃过一次。青黄不接时只吃些青菜（有时是野菜），以致全身浮肿。……

毛泽东严于律己，坚持与人民同甘共苦。他生活俭朴，随遇而安。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而毛泽东曾穿过的两件极普通的睡衣，一而再，再而三地缝补了多次的补丁，直到他逝世，一直穿了好多年。

他清德垂范，教育亲友要与普通群众一样，不做"特殊公民"

毛泽东严于律己，即使是处理亲朋故旧的问题，他也始终严守党和国家的政策原则和组织程序。他要求亲友与广大人民群众一样遵纪守法，努力工作，服从领导，坚决反对亲友们利用他的威望向政府提出无理要求，作"特殊公民"。

毛泽东恋亲但不为亲友徇私。解放不久，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写信给毛泽东，谈到自己对工作安排问题的一些想法和要求。1949 年 10 月 9 日，毛泽东为妻兄杨开智的请求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当时担任湖南省军政委员、长沙市军管会主任的王首道，信中写道："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另一封给杨开智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的早年是寄居在外祖父家的。他有 9 个表兄弟，自幼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很好。解放以后，毛泽东曾多次给他们写信，并多次接他们上北京作客，寄钱赠衣物。但当他们提出要毛泽东推荐介绍到北京参加工作时，毛泽东都未答应。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是他最要好的朋友。1910 年毛泽东到湘乡东山小学读书，文运昌是引荐人和担保人。后来，他还曾积极向毛泽东推荐过《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进步刊物。1936 年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称赞文运昌在引导自己接触新思想上起了作用。建国初，文运昌因刚从华容返回湘乡不久，尚未找到固定的工作。1950 年正月，他的胞弟文南松写信给毛泽东，请他出面为文运昌介绍个工作。对这样一位曾有恩于自己的表兄的小小要求，毛泽东也

没有答应。1950 年 5 月 12 日，毛泽东给文南松的复信中写道："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毛泽东济亲但不为亲友撑腰。1950 年，湖南省湘乡县风音乡文氏四兄弟致信毛泽东，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并要求给他们生活救济。对此，毛泽东于 5 月 27 日写信给当时的湘乡县县长刘亚南，除请他调查信中所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外，还非常严肃指出："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满。"当毛泽东得知文家的亲属到北京看望他，回湘后非常神气，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的情况以后，毛泽东又于 1954 年 4 月 29 日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信："我的亲属唐家坨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毛泽东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毛泽东极重故友、学友之情。解放后他给很多同窗学友复过信，并对有困难的给予经济资助。但当他们提出请毛泽东为其谋取工作或解决组织问题时，毛泽东都谢绝了。

毛森品是毛泽东在湘乡县立东山学校读书

左图：1949 年 3 月 5 日到 13 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大会上作报告

时的同学，两人关系很好。解放以后，毛森品多次给毛泽东写信，除汇报个人近况外，还反映了当地干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当毛森品提到家庭生活有困难时，毛泽东拿出自己的工资三次周济他，共 550 元。但当毛森品提出为其推荐工作时，毛泽东于 1950 年 4 月 18 日写信给他，说道："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曾同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相识的周容，请求毛泽东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 年 5 月 16 日，毛泽东给他复信："组织问题，未便率尔绍介，应就当地所有表现，向当地组织请求，听候解决。"

共产党决不当八旗军，毛泽东要求子女与工农划等号，不能特殊

明末清初，弓马娴熟、能征惯战的八旗军曾威风一时，但八旗军子弟却名败千古。这深刻的历史教训，使毛泽东把现实与未来沟通起来，把教子与治国联系在一起。他说过："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毛泽东用这样的思想教育干部子弟，并且，首先用这样的思想塑造了长子毛岸英。

毛岸英生长在艰苦的斗争岁月，小时候随母亲一起坐过牢，后又流浪上海街头，饱受饥寒之苦。以后在列宁的故乡上了大学，还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成为一名苏联红军中尉。按说，毛岸英已经有了这样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可以不必再经过艰苦的锻炼了。但是，毛泽东却认为，子女们的前程只能在实际斗争的磨炼中去创造，只能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上去实现。1946 年 2 月，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毛泽东提出要他上中国的劳动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以便了解中国的情况，将理论付诸实践。毛岸英愉快地答应下来，不久，来到陕北吴家枣园，接受磨炼。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坚决支持毛岸英参加志愿军，奔赴朝鲜前线作战的请求。并为毛岸英上前线一事亲自向当时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情，要他带毛岸英到朝鲜去经受战争的考验。毛岸英被安排在志愿军总部当俄语翻译和机要秘书。但十分痛心的是，1950 年 11 月 25 日，志愿军总部遭美帝国主义的飞机轰炸，毛岸英不幸光荣牺牲。当毛泽东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之中仍表现出坦然。他说：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反抗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儿女，前赴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岸英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名普通战士。不能因为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你们要记住，岸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当有人提议将毛岸英的遗体运回国时，毛泽东摇摇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不是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岸英应该和他们在一起。

一次，当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论起子女问题时，他们都认为毛泽东的子女要比普通人家的子女吃的苦多。但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他摇摇头说：这是因为你们给他们定了不同一般人家子女的标准。你们在说这个话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她们是共和国主席的女儿，这是"八旗"的标准，共产党决不能搞这种标准。

毛泽东正是以这种廉洁自律、严格要求自己亲友和子女的模范行为，为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出了榜样，使得新生的人民政权廉洁兴旺。今天，追忆毛泽东言传身教的廉政思想，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端正党风，反腐倡廉，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余　文）

中苏论战

邓小平舌战赫鲁晓夫

● 刘金田

赫鲁晓夫的名字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1894年出生于一个矿工之家的，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历任苏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斯大林逝世后，曾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被迫“辞职”。

赫鲁晓夫举止比较粗鲁，脾气暴躁，在外交场合常常莽撞失礼。但他头脑反应比较灵敏，善于思考，点子不少。他当政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曾先后访问苏联，赫鲁晓夫也曾三次访问中国。此间，他和邓小平有过多次接触。特别是中苏两党论战期间，两人有过面对面的交锋。

毛泽东把邓小平介绍给赫鲁晓夫

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副主席米高扬等乘专机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参加中国国庆典礼。9月30日，毛泽东率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主要领导人，会见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成员。

当时邓小平并没有引起赫鲁晓夫太多的注意。在赫鲁晓夫的印象里，他只是很多副总理中的一位，中苏友协名誉理事之一。

1957年11月，是伟大的十月革命40周年，苏联方面邀请中国领导人前往参加庆典。毛泽东率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等人前往莫斯科。

在苏共中央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私下交谈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赫鲁晓夫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半年前伏罗希洛夫已经带回了这个信息。他问道“谁来接班呢？有这样的人吗？”

“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说着，毛泽东就一个一个地点起了名：“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第二个是邓小平。”毛泽东扳了一下指头又继续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

赫鲁晓夫似乎颇有同感地连连点头：“这个人可厉害，我跟他打过交道，去年是他来了，你可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那是1956年的2月11日，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等到莫斯科，会同已在莫斯科的朱德一起准备出席苏共二十大。

2月1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公开报告中提出了三个理论性的问题:即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问题;存在着避免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通过议会争取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中国代表团在讨论这几个问题时,邓小平对“和平过渡”的提法是不同意的。

2月24日晚间,赫鲁晓夫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邓小平看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速记稿后,坚定地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

苏共二十大闭幕后,邓小平回国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对斯大林做了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指出“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这次毛泽东访苏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前重要的准备工作是由中苏双方讨论起草宣言。

中方首席代表是邓小平。

苏方首席代表是苏斯洛夫。

毛泽东在和赫鲁晓夫的交谈中谈到了中国党对“和平过渡”问题的看法。后毛泽东又写信给赫鲁晓夫说,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由邓小平同志和你们谈。

第二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会谈。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严肃地批评了苏共的“和平过渡”的片面提法和错误的危害,随后还向苏共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书面提纲。

邓小平的原则性确实给赫鲁晓夫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赫鲁晓夫这样回忆道:“唯一一个毛似乎赞许的同志是邓小平,我还记得毛曾经指着邓对我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我对这个邓小平一无所知。中国人民胜利以后,我曾几次听到有人提起他的名字,但在此以前则从未听说过他。”

邓小平前往莫斯科
赫鲁晓夫不敢怠慢

赫鲁晓夫真正领教邓小平的厉害,是在60年代中苏论战期间。

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并与苏共中央多次信件往来,在广泛听取了其他兄弟党的意见后,最后同意先由26国党起草委员会协商起草会议文件,而后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决定派出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

邓小平要面对的对手是赫鲁晓夫。

选择邓小平挂帅,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毛泽东预料到这是一次斗争,而且斗争会相当激烈。中共派人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既要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又要有理、有利、有节,从世界大局出发,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无疑,非邓小平领头不可。

行前,邓小平曾对代表团的全体成员说:“这次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我们要从世界大局出发,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要维护中苏友谊。但原则问题不能让步,一定要把主要问题上的实质分歧阐明,表明我们的观点,要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

在得悉邓小平将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赴莫斯科参加起草委员会后,赫鲁晓夫亲自在克里姆林宫里主持了好几次会议,与苏联的最高领导研究同邓小平谈什么问题。

会上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站起来说:“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一书记嘛……”

邓小平一行抵达莫斯科。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了高规格的欢迎宴会,在俄罗斯音乐旋律和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

和代表团的同志走进大厅后，与等候在大厅前的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一一握手，邓小平微笑的脸庞充满了自信。赫鲁晓夫等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依次而立，神情各异。

接待是高规格的，赫鲁晓夫可能是没有忘记毛泽东 1957 年访苏时同他说过的一句话："希望你们把他（指邓小平）像我一样来对待。"

赫鲁晓夫摊牌发难
邓小平从容以对

交锋，从欢迎的国宴上拉开了序幕。

赫鲁晓夫陪同邓小平来到主宾席前就坐。记者纷纷围上前去。邓小平显得从容大度，而赫鲁晓夫则始终显露出有点捉摸不透的微笑。

宴会一开始，赫鲁晓夫就不忘挑战。一端起酒杯就开口指责："阿尔巴尼亚对不起苏联共产党。"实际上他是指桑骂槐，借以攻击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非常清楚赫鲁晓夫的真实意图，便直率而又诚恳地对赫鲁晓夫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赫鲁晓夫多少有点激动，脸一下子涨红了。他大声说道："这不仅仅是苏共和阿共之间的分歧问题。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

听到这里，邓小平严肃地说："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控制和干涉。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

这番话，棉里藏针，令赫鲁晓夫一时语塞。

这番话的中心内涵赫鲁晓夫心里是明明白白的。

两年前赫鲁晓夫第二次来华访问，曾向毛泽东提出要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和与中国组建一个联合舰队，遭到了毛泽东的断然拒绝。赫鲁晓夫打的就是援助的名义，实际上是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而且赫鲁晓夫一再讲到苏联对中国是做出了许多援助的。毛泽东非常礼貌而又不失坚定地说："那是另一个问题。"

1960 年 7 月 16 日，苏联政府又撕毁了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几百个合同，并通知中国政府，自 1960 年 7 月 28 日到 9 月 1 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并终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规定应该派遣的数百名专家。他还命令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的关键部件的供应，使中国二百五十多个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今天赫鲁晓夫又重提旧话，总是把苏联对兄弟党的援助作为筹码，实在令邓小平反感。

赫鲁晓夫已经按捺不住了，他不再绕圈子，话题直接对着邓小平来了。

"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赫鲁晓夫说。

邓小平回答得很干脆："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

"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你们每逢'五一'、'十一'过节的时候，天安门总要摆斯大林的像，这就好像是一根刺，扎到我们的肉里面一样。"赫鲁晓夫接着说。

邓小平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怕斯大林？是不是斯大林的魂把你们迷住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要说清哟。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的态度。"说着，邓小平扭头看了一下坐在不远处的米高扬，"你问问米高扬，他到北京来时我们对他讲没讲？"这位苏联领导人目光有些不自然地与赫鲁晓夫对视了一下，忙移开目光，端起杯子到别处敬酒去了。"我们赞成反对人个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你一直认识不足。"

"因为我们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更深切，受害也最深。"赫鲁晓夫报怨道。

"要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信为由影射攻击其他兄弟党。"邓小平

直言道。

这时，赫鲁晓夫突然冒出一句："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高岗，就是对我们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的。"邓小平的语调既高又非常严厉。

赫鲁晓夫就是这样，说话常常是信口开河，不计后果。随后，他又轻率地说道："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荒唐！简直是无稽之谈。"邓小平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已经不屑与赫鲁晓夫多谈下去，说："高岗是我们党内的事情，莫洛托夫是你们党的事情，你在这个场合把这些拿出来干什么？"

在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都知道赫鲁晓夫又失控了，担心由于他的失控会给会谈带来极大的被动，纷纷打起圆场，互相敬酒，借此阻止赫鲁晓夫说话。

赫鲁晓夫也顺水推舟，借着碰杯，转移了话题。

赫鲁晓夫老羞成怒 邓小平坦然自若

两天后，苏共中央再次举行欢迎宴会，这次是为迎接 26 国兄弟党的代表团来莫斯科开会。

宴会上，赫鲁晓夫还是忘不了对中共代表团的攻击。

"现在我们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看法上，与中国同志有分歧。根据中国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来看，我们说，中国有许多错误的观点。"赫鲁晓夫一边说着，一边用眼角瞟了一下邓小平。

听到这里，邓小平不紧不慢地端着杯子走过来说："赫鲁晓夫同志，关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是当前各国兄弟党都面临的重要问题。各党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能以你划线。"

"这种观点我不能接受。"赫鲁晓夫显然又冲动起来了："你们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我方提出的意见，你们并不接受。"

邓小平说："可我们也从没有强迫或要求你们接受我们的观点呀！"

"邓小平同志，苏美戴维营会谈你们就唱了反调。"赫鲁晓夫坚持说。

那是 1958 年 9 月，赫鲁晓夫在参加苏美戴维营会谈后访问中国。他在和毛泽东的交谈中，兴致很高地介绍了苏美戴维营会谈的情况。他用肯定的口气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一些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势的倾向。我在和艾森豪威尔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的，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听后明确地说：你们和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的一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怎么可能呢？事实不是这样的么。

赫鲁晓夫对中国不赞成戴维营会谈中的一些观点早就心怀不满，今天终于发泄出来了，而且越说越激动，连脖子都涨红了。"为首为首，我们为首不是只能出面召集一下会议，这样的为首我们不当了。"

邓小平说："为首也不是老子党，可以随便发号施令，任意规定别的党怎么做。"话语坚定，总是戳在赫鲁晓夫的痛处。

26 国党的起草委员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在最后达成的协议中，终于删去了中共代表团坚持要求删去的关于"派别活动"、"和平过渡"、"斯大林问题"等章节。

最后，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再次对赫鲁晓夫说："对于文件中一些提法我们有保留意见，留待 11 月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再讨论解决吧，为了国际工运的团结，我们已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

此后，中苏分歧公开化、激烈化。

再次抵达莫斯科 舌战交锋凯旋归

1963 年 7 月 5 日上午 10 时 30 分，以邓小

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

苏共中央还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欢迎宴会。

当然，和前几次一样，宴会上的气氛也是紧张的，据当时的翻译李越然后来回忆：

赫鲁晓夫祝酒时说："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

邓小平神情庄重地表示："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希望消除分歧。"

赫鲁晓夫马上声明："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

意思很明确：消除分歧，实现团结，只能是你们接受我们的观点。

邓小平摇摇头说："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的分歧继续扩大到两国关系上。"

赫鲁晓夫有些急切，话讲得很快："至少应该做到互相在报刊上停止攻击。"

邓小平明确指出："你们发表了告全体党员书，你们片面地攻击我们，讲够了。我们不攻击！不用攻击性言词。但我们还没有表示态度呢，我们要表明态度，在适当的时机表明态度。"他微微一笑，重复一遍："我们将表明自己的态度，叫两党全体党员了解双方观点。"

赫鲁晓夫用餐刀敲响菜盘："要团结就必须停止相互论战！"

对小平接着说："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你们一直没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止这种攻击。我们该答复的总要做出答复。"

宴会上的交锋如此，正式会谈就更不用说了。

会谈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没有任何结果。下次再继续举行会谈，时间和地点由中苏两党另行商定。

但是，留给赫鲁晓夫的印象仍然是"这个小个子厉害，不好打交道"。

1963 年 7 月 21 日下午，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部到机场迎接邓小平和代表团的全体同志。在邓小平走下飞机后，毛泽东上前与他亲切握手问候……

据说毛泽东去机场迎接出访归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两次，这是其中一次。

二十多年后，邓小平回想起中苏分歧时说："从 1957 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 60 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

"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这些外国同志也说：正确的并不都是他们。这是过去争论的一个方面，意识形态分歧的方面。这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于面对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的发展，用新的思想、观点去认识，继承、发扬马列主义。"

"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

（责任编辑　余　人）

知过即改　方为马列

——纪念博古诞辰 90 周年

● 温济泽

一

博古，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07 年 6 月 24 日生。今年是他诞辰 90 周年。

他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是北宋著名词人秦观（少游）的后代。1925 年，五卅运动的怒潮席卷全国。秦邦宪 18 岁，在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读书，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学校的学生会会长和苏州学联领导人之一，积极推动了苏州、无锡各界对五卅惨案的声援活动。同年，考进上海大学，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被党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有了个俄文名字 погулеров，博古就是这个俄文名字前两个音节的译音。

1930 年 5 月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干事，编辑《劳动报》、《工人小报》。1931 年 1 月，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 4 月，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9 月，任中共中央常委。1934 年 1 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35 年 1 月，改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1937 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同年 6 月，参加国共两党庐山谈判，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1938 年后，历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长、南方局组织部长。1941 年，延安《解放日报》创刊后，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新华社社长。1945 年，中共七大选为中央委员。他是国共合作后历届国民参政会中共参政员之一。1946 年 2 月赴重庆，为政协宪草审议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之一。4 月 8 日，博古与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新四军军长叶挺偕夫人及男女公子、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等 13 人，乘飞机由重庆返延安，因飞机遇雾迷路，在晋西北兴县东南 80 里的黑茶山，撞山焚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博古时年 39 岁。

中共中央以极大的悲痛宣布这一噩耗后，全国震惊。延安各界三万多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祭文中说："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去了，你们突然地永远地离开我们而去了！但是我们全党的同志，我们全国的人民将永远记住你们"，"记得你们对于人民事业的伟大的贡献"，"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向你们保证：你们交给我们的火炬，一定会燃烧得更光明"！

二

博古是怎样由一个 24 岁的青年一下走上中共最高领导岗位的呢？

这同共产国际有关。

共产国际成立于 1919 年 3 月 6 日，在 1943 年 5 月 15 日解散。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在成立

后的二十多年中，路线的正确和错误，事业的成功和挫败，以至领导人的任用和更换，都是同共产国际的领导分不开的。

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正是联共中央发生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斗争的时候。1927 年 11 月，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斗争仍在继续。这个斗争对中山大学也发生影响，斯大林指令对中山大学中的托派活动进行清查。

中山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拉狄克因为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派，于 1927 年夏被解除校长职务。后来校长由副校长米夫接任。米夫是积极支持斯大林的，他以学校里的党组织——支部局为核心，形成一个小宗派领导这一斗争。王明和博古都是支部局的委员，特别是王明，当过米夫的翻译，深受米夫的器重。当时中山大学的反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造成混乱。

不幸，这种状况后来也影响到中国共产党。

1930 年 6 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曾被称为“立三路线)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7 月，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9 月下旬，他们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把李立三的错误问题基本 上解决了。不料，事情陡然起了变化。共产国际原来认为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10 月，又把它提高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的错误”。这个改变，共产国际还没有来得及正式通知中共中央，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就通过不正常的途径，让他所器重的王明、博古等先获知了改变的内容。王明等一些人就根据共产国际的“新的精神”，攻击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路线错误”，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后面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是什么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并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这造成当时党中央的一时混乱。

12 月中，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1931 年 1 月 7 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中央全会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在米夫的操纵下，通过了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议定的名单，宣布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名义上仍由向忠发担任，把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26 岁的王明，补选为中央委员并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让他实际上操纵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比李立三更“左”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领导机构内占统治地位长达四年之久。

博 古

1931 年 9 月，王明要到莫斯科去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原任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已被米夫、王明一伙赶下台)，周恩来也要调往中央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鉴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足半数，于是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商议结果，确定由博古、张闻天(洛甫)、陈云、康生、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六人中，除陈云、卢福坦外，原来都不是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

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推荐博古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4 月，被选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在 9 月确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后，由王明、周恩来和卢福坦找博古到一个小酒店开会，说明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成立由六人

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任中央常委，并指定由博古负总的责任。

博古就是这样走上了中共最高的领导岗位。

三

我们对博古走上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以后所犯的错误应怎样看待呢？

就这次错误路线的责任来说，毛泽东明确指出，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王明是这个路线理论的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等是执行者与发挥者。（《毛泽东传（1893—1949》第659页。）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的蛮干，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难于立足，不得不在1933年初迁入中央苏区。以后留在上海的中央局又遭受多次破坏，到1935年7月不得不停止活动。到这时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除少数外几乎破坏殆尽。

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以后，"左"的影响扩大到苏区。特别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博古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自己跟着他走，一反过去历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的宝贵经验，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不切实际的方针，采用"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错误的作战方式，结果节节败退，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最后不得不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使红军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大于十分之九。

这就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党造成的严重损失。

博古（秦邦宪）的名字，我是在1937年8月底被国民党释放出狱后才知道的（1931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附中读书时已是共青团员，任团支部书记，1932年7月在一次集会活动中被捕，后送国民党苏州军人监狱关押了五年多）。当时知道我们党派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个代表，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的谈判，提出五项要求，其中一项是"释放一切政治犯"。达成协议后，我们一大批关在各地监狱的同志才被释放出来。以后到延安，在整风运动中，才知道"王明路线"的错误，知道博古1931—1932年在上海、1933—1935年初在苏区追随王明犯过严重的错误。遵义会议上，许多同志对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上犯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严肃的批评。通过这次会议才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首先是军事上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召开的。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这转折的关头，博古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他也不是一下子就认识错误的。他面对红军失败的现实，又能听取和尊重不同的意见，有民主作风，能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虽然还有个别人支持他，背后叫他不要"交权"，但是他仍以大局为重，按中央决定办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高贵品格。中央仍保留他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的职务，并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他仍全心全意地努力做好工作。

在斯诺著的新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收入了《与毛泽东的进一步谈话》，作为对长征叙述结尾的一段附言。毛泽东将长征的成功归结为党的正确领导，接着列举了18位领导同志的名字，其中也有博古。

毛泽东对博古的评价是全面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

四

我认识博古，并在他领导下工作，是在1943年。

1943年1月，我从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学术秘书、研究员），调到解放日报社副刊部，当秘书和编辑。那时候，社长是博古。我报到的第一天，就见到他。他给我的印象是，身材高大，对人和蔼，在我已见过的党的领导人中是最年轻的（36岁）。当时他还兼新华通讯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这几个单位都分散在清凉山从西到东的几个山头上。博古的威望很高，正

如后来他遇难时，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余光生、艾思奇和新华通讯社副社长陈克寒联名写的悼念文章中所说："对于我们从事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的人们来说，是丧失了一个最有权威的指挥官和亲密的战友。"

博古工作很多很忙。他把重点放在《解放日报》，每天一大早就起床，急匆匆跑到新闻部办公室，同大家一起研究当天的重大新闻，研究怎样写成电讯稿和文章，往往忙到十点左右才回窑洞吃早饭。我们副刊部在另一间办公室，各个部的办公室都集中在东西相对的两排十几孔石窑洞里，我们是能常见到博古的。副刊部主任是艾思奇，副刊的清样由总编辑陆定一签字付印，每期出刊后，博古是天天看的。我有时在上下班的路上遇见他，他有时也会亲切地同我打招呼，说几句副刊上的哪篇文章好，哪篇有什么缺点。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对人非常和善。

《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1941 年 5 月 16 日创刊。在筹办时中央就任命博古为社长。在 1942 年 2 月整风运动开始时，毛泽东曾批评过《解放日报》是"不完全的党报"，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在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进行了改版。从 4 月 1 日发表社论《致读者》，到 1944 年 2 月 16 日发表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对于党的新闻工作的方针和基本原则，对于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基本理论和重大问题，都作了探讨和精辟的阐述。关于党报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要坚持党性原则，要坚持实事求是，新闻必须完全真实，要贯彻全党办报，要密切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要建立新的文风，这些原则都是在《解放日报》改版时期逐步确立的。博古从不诿过于人，也绝不揽功归已。毛泽东批评《解放日报》是"不完全的党报"时，博古主动承担责任。以后，博古遇有重大问题都及时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对毛泽东的指示及时传达研究，对毛泽东为报社写的文稿，毛泽东对送审文稿所作的修改和批示，都仔细研究并要同志们认真学习。

博古居住兼办公的窑洞的墙壁上，钉着全国的和世界的两张详细的大地图，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红白几种颜色的小旗子。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这些小旗子也随时移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架子，按国内、国际、政治、军事等分类，插满了他自己做的卡片。他每天在繁重的新闻工作之余，还挤出时间做翻译工作，《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四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普列汉诺夫著)等，都是他翻译的。他能抓紧时间读书，常对人说："教条主义反掉了，要更多读书。过去读书的方法不对头，不是书会害人。"他除去读政治理论书籍，也常在晚上睡觉前看点文艺书刊，他认为这不仅能拓宽眼界，增长知识，对提高写作技巧也有好处。他曾对记者说："要忠实地报道，精确地报道，主动地报道，迅速地报道。"他看到记者稿件中的一些陈词滥调之后叹气说："语不惊人辞不修。"他教导记者写稿不仅要注重内容，也要不断提高写作技巧。

当时新华社发文字广播，也管口头广播。作为我国人民广播事业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 1940 年 12 月 3 日开始播音。后因真空管漏气等技术原因，不得不中断了一段时间。

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宣布投降。这天晚上，新华社同志把一台收音机安上扩音喇叭，放在一个山坡上给大家听广播。我们听到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一改平常的节目，反反复得地播送以蒋中正名义发的"命令"，要八路军、新四军"就地待命"，叫伪军去"受降"和"维持治安"。蒋介石是要来抢夺人民胜利的果实了，大家议论纷纷。我急急忙忙跑到博古的窑洞里，向他报告了刚才听到的广播。他说，他刚和毛主席还有军委三局王诤局长通了电话，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预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正在准备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又说，毛主席已经同意，要他找王诤商量，尽快把我们自己的口头广播恢复起来。王诤已答应动员无线电技术人员立即把已改成发文字广播的那部发射机，再重行调整线路恢复口头广播。经过三局同志连续奋战几昼夜，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又从延安山沟上空向全国四面八方传播出去了。

博古在领导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五年多工作期间，呕心沥血，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团结两个社的人员一起，把解放区的新闻事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统一的有机的整体。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是党的新闻事业的神经中枢，各解放区各地的报社和新华分社（新华社有 9 个总分社，40 多个分社）以及部队报纸是它的躯干脉络，墙报、黑板报是它的基石。它培养和锻炼了大批新闻工作者，还有近三万业余通讯员。这是一支坚强的新闻大军，天天向解放区、全国和世界传播党的声音，报道国内外时局的动态，指明中国人民斗争的方向。

当年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的人员，在党中央和博古等同志的领导下，养成了共同的作风。这正如《解放日报》一篇社论所说："党报工作人员，对于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对于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仆'，应该有恭谨勤劳的态度。"（《党与党报》，《解放日报》1942 年 9 月 22 日）博古就是我们的"恭谨勤劳"的楷模。他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和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对业务的精益求精，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的。

五

博古同志待人处事的作风也是十分令人怀念的。他作风民主，尊重别人，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善于发挥每个人之所长，能团结大家，共同前进。他不仅在工作中能热心帮助同志，还很关心群众生活。在大生产运动中，把公家给他骑的马用于全社搞生产运输，自己步行。他经常关心大灶的伙食，常主动同管理员、炊事员商量改进伙食的办法。他还常拿出自己的稿费给俱乐部做文娱活动费用。俱乐部每星期六组织的跳舞和娱乐晚会，他常来参加。在一次舞会上，不知怎么把从他那里借来的唱片（这在延安是稀有的）中，有两张柴可夫斯基交响乐唱片被弄破了，俱乐部主任吴一铿不好意思去还，我那时是编辑部党支部书记，她要我陪她一起去，我到博古窑洞门口轻轻地叫他一声，说："我陪吴一铿还唱片来了，有两张唱片弄破了，她让我一起来还。"博古忙让我们进窑洞，用很和蔼的语调说："唱片坏了算什么呢？哪有用不坏的东西呀？"吴一铿的紧张情绪一下子就缓和了。编辑部的同志分散住在山上的三层窑洞，编辑部办公室和博古的窑洞在同一层（中间一层），副刊部美术编辑张谔也住在这一层，他在自己窑洞门口的平地上用大石块搭了一张桌子，又围着桌子用石块和砖头搭了几个凳子，每到夏秋天气，下班后常有些人聚在这里聊天。有一天，一个同志讲了他昨夜做的一个梦，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博古听了也忙赶来，要那个同志再讲一遍，博古也大笑起来，他的笑声特别响亮，几乎引得山鸣谷应。

近十几年，许多同志谈论"延安精神"，我觉得李维汉的论述比较全面精辟。他把"延安精神"概括为六条，其中一条是："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革命同志一律平等，亲如手足的精神。"我在延安好几个单位工作过，体会到延安处处确实如此，由于我在清凉山的时间比较长，因而体会也特别深。博古这种平等待人、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是感人至深的。

六

毛泽东 1962 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

>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26 页）。

博古到中央工作，正是在这里说的" 我们

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的后十来年，这个时候还是“带有很大盲目性的”。毛泽东的这段话，对于我们研究党史、研究和评价博古，十分重要。这可以理解为博古到中央工作时期的大背景和总情况。

博古在中央工作了十四年多。在前三年多的时间里，犯了很大的错误；在后十一年多的时间里，逐步改正了错误，并对党作出过不朽的贡献，成为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

对博古的错误，我们不能忘记。但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他这段错误，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找出历史的、社会的以及个人的原因，得出对后人有益的教训。

对博古的贡献和功绩，我们更不能忘记。应当学习他那种知过即改、认真改正的虚怀若谷的精神，学习他对党的工作极端负责、恭谨勤劳的“公仆”态度，学习他平等待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一个人，如果是金子，有谁能不经过“千淘万漉”的呢？一个人，从婴幼儿到成年，有谁能不摔多少次跤就学会走路的呢？一个人，如果有所成就，有谁能不经历几多曲折和几多坎坷的呢？在历史熔炉的冶炼中，有些人成为金子，有些人成了渣滓。就拿 1931 年被指定为中共临时中央成员的六个人来说，博古、张闻天、陈云，最后终于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都成了真金；康生后来成为党内的“大奸”，对党、对人民作尽了坏事，成了革命的渣滓，终于被开除出党；卢福坦和李竹声不久就被捕叛变，成为可耻的叛徒，在历史的长河中大浪淘沙似地被淘汰了。

博古诞辰 90 周年快到了，他殉党殉国也已过半个世纪了，我作为一个幸存者写下这些文字，寄托我对他的深切怀念，也作为我献给他的一瓣心香。

（责任编辑　方　实　王　恂）

法大，权大？一场艰难的诉讼

——奚弘状告《人民日报》侵权案审理始末

● 丁　文

一位工会女干部状告《人民日报》和曾坤、史林杰侵犯名誉权一案，是因该报刊登的、此二人合写的《喀什市建管局领导软弱无能，奚弘怠工乱告状成特殊公民》一文引起的。此案历时九年，终于在1997年1月2日，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调解结案。调解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自本院调解书送达之日起，《喀什市建管局领导软弱无能，奚弘怠工乱告状成特殊公民》一文，不得以任何形式发表全文和部分。

二、被告人民日报社以书面形式向原告奚弘致歉；被告曾坤、史林杰共同以书面形式向原告奚弘道歉。

三、被告人民日报社、曾坤、史林杰共同赔偿并补偿原告奚弘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人民币二十万元。

案件受理费三十元由被告曾坤、史林杰负担。

《人民日报》社"致歉函"的内容有："刊登此文不妥，负审查不严之责"，"谨向奚弘同志表示诚恳歉意，希望奚弘同志谅解，并赔偿和补偿奚弘同志一部分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曾、史二人合写的"道歉函"中，承认"是有过错的"，并"向奚弘同志表示诚恳的道歉"。

奚弘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字，但她却无法排解心中的激烈矛盾，在她送还法院调解书的回执上，写下了内心的不平和委屈。事后，她悲切地说，我同意在调解书上签字，这是为了顾全大局，但对我来说又是违心的。

这是一桩特殊的案件，以状告侵犯名誉权立案，却以回避侵权一词结案。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了侵权，全由奚弘和局外人从协议书的字里行间去理解。奚弘对报社的"致歉函"和曾、史的"道歉函"颇有微词，更令她难以理解的是这一案件正在审理期间，报社已将曾坤由乌鲁木齐调到北京，让其担任了《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副主任；以后又提升为记者部主任。

对朝阳区人民法院来说，审理和调解此案十分艰难。此案虽是一桩民事纠纷，但被告却是全国第一大报，法院为了动员说服《人民日报》社应诉，就花费了三年半的时间。尽管如此，

奚弘在北京

最终还是了结了此案，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在我国法制建设史上所隐含的分量，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远远超过了案件本身。

此案经历的道路漫长曲折，发人深思，要写出它的来龙去脉，必须从源头说起。

倾家荡产的所谓"告状专业户"

奚弘，新疆喀什市一名工会干部，一位无职无权的弱女子，只是为了伸张正义，反腐倡廉，一级一级向上反映她了解到的腐败和违法乱纪的情况，却被《人民日报》记者曾坤及新疆广播电台记者史林杰，在《人民日报》上著文，以乱告状、越级告状加以谴责，从此受到了多方面的刁难与欺凌。

她不屈服强权的压力，从自杀念头中醒悟过来，决心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正当的权益。从奚弘1988年8月23日离开新疆喀什，第一次进京告状算起，前后历时九年。其间所经坎坷曲折，难以尽述。

九年来，她失去了自己能得到的一切，七次自费进京，行程六万多公里，等于绕地球一圈

半。九年中，她给中央有关领导机关、中央领导同志写了控诉信七十多封；给各级法院、纪检和监察机关、各级工会和有关上级，共写控告信、上诉材料、呼吁书等等总共四百多份。

九年，为了一场官司，她舍去了个人的一切幸福，落得了一身疾病，耗尽了自己的一切财产，债台高筑，用下半生的工资也还不完。

假如她当时听了喀什某些当权者的劝告，唾面自干，放弃原则，本来可以活得轻松愉快些。但是，奚弘生性刚强，却选择了一条充满风雨泥泞的道路。她拖着沉重的脚步，踏着荆棘，艰苦跋涉。天山冷月，大漠风沙，京沪往返，食宿无常。这在她的额头眼角犁下了深深的皱纹。在压力面前，她没有低下高昂的头颅。她悲痛地说：我牺牲了这一切，就是要让老百姓明白，用法律维护公民正当的权益，不能胆小怕事。人人怕事，就人人没有安全保障；只有不怕牺牲，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才有一线希望。她说，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为民告官提供了法律依据，我愿做民告官的马前卒。

她告的什么状？

奚弘原是一名上海女青年。1964 年，当她刚刚上高中时，只因听了一位中央领导热情号召青年踊跃支边的报告，看了史诗般的《军垦战歌》纪录影片，全然被开发边疆的豪情感动了。她不顾父母阻拦，放弃了学业，离开了繁华的大上海，怀着一腔热血，志愿报名到万里之外的新疆，被分配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位于天山雪峰下的四团农场，披星戴月，一干就是十年。

奚弘于 1974 年结婚，先调到皮山县工作，后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1986 年下半年又调至南疆重镇喀什市建筑管理局工会当秘书。

奚弘到喀什不久，就碰到一件扎手的事。建管局所属第一建筑公司以工代干的人事干部黄世超，是连续四年的先进工作者，因他向上级反映了本单位的某些领导贪污、浪费问题，得罪了顶头上司，被无故调动，后又受到除名处分。黄世超不服，多次要求领导改变错误决定，均遭拒绝。在无门可找的情况下，他来到维护职工权益的机构——喀什市建管局工会，向奚弘哭诉了自己的艰难处境，悲愤之余，流露出他保管的仓库存放着枪支，若万般无奈，他将和一心害他的人同归于尽。

黄世超的遭遇引起了奚弘的震惊和同情。她想：身为工会干部，若不为职工主持公道，还要我干什么？她劝慰黄世超：要相信党、相信人民政府，千万不要自走绝路，如果你反映的情况属实，同级不能解决，我们一定向上级党政机关反映，相信事情总会得到解决。

受喀什市建管局工会指派，奚弘走访了黄世超所在单位以及有关各个建筑部门。在深入调查中，她发现喀什市建筑系统存在的违法乱纪和腐败问题，远比黄反映的严重。她决定一起向喀什市党政部门反映，请求市领导机关一并解决。

奚弘长期在农场劳动，虽然懂得了劳动的艰辛，但是毕竟社会阅历太浅，没有体验过生活的屈辱和磨难。在家里是父母的宠儿，在学校经常受到老师夸奖，在农场从来没有受过波折。她认为党号召大家反腐败，市领导机关理应替黄世超解决问题，惩处腐败和不正之风。

她那里能想到，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地方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的现象相当严重。当时喀什市有的领导就警告过奚弘，要她“规矩”些，不要插手黄世超的事件。奚弘据理反驳，领导进而又威胁说，再插手这件事，就将她调出建管局。

得不到市领导的支持，奚弘又向喀什地区的领导反映黄世超的遭遇和市建筑系统的腐败现象，也遭到了刁难。此时支持奚弘向上反映这些问题的市工会正、副主席，都被迫写了检查，调出市工会。奚弘从这些迹象中感到事态的严重，看来这个问题在喀什已无法得到解决。她自费买了飞机票，赶到三千里外的乌鲁木齐，将自己的遭遇和所了解的情况反映给自治区领导部门。

在乌鲁木齐上访期间，奚弘得到了自治区总工会等各方面的支持，自治区党委书记宋汉良还亲自听取了奚弘的汇报，当即给当时喀什地委书记徐效成打了电话，责成其查明情况，尽

速予以解决。

经过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干预，没隔多久，黄世超的问题果真解决了。奚弘因上访而被扣发的工资、奖金等也都给补发和报销了。事后，喀什地委领导机关给宋汉良写了一份正式报告，说明奚弘上访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承认地方当局办事不妥。至此，奚弘总算松了一口气。

她以“撒泼耍赖”、“告状不止”的丑名上了《人民日报》

1988 年 4 月，就在喀什地委给自治区党委草成黄、奚问题已经解决的报告时，不知喀什的哪些领导出于什么目的，专程从乌鲁木齐请来了《人民日报》驻新疆记者曾坤和新疆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史林杰。又不知道这两位记者听信了些什么，曾坤一到喀什后就扬言：奚弘是喀什的“地震台”、“不安定因素”，并约奚弘前来谈话。奚弘听到这种流言，尽管很不愉快，仍于 4 月 22 日，按曾坤所约在他下榻的喀什噶尔新宾馆，会见了曾坤。两人因看法不同，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结果不欢而散。

当时，陪同曾、史采访奚弘的喀什原地委副书记陈德敏，看到这种尴尬场面，事后再三提醒曾坤：奚、黄事件在喀什刚刚平息，切莫重新挑起争端，使问题再人为地复杂化。曾坤未听劝告，于是一篇题为《喀什市建管局领导软弱无能，奚弘怠工乱告状成特殊公民》的文章终于出手，刊登在 7 月 20 日的《人民日报》四版“社会一角”上。署名是曾坤和史林杰。文章说：

“好端端的新疆喀什市建筑管理局，一时是非难辩，人人憋气，人们说，原因一是奚弘搅和，二是领导患‘软骨病’。”

……

“奚弘由外县调入市区（指喀什市），除了那百十天班（说奚弘调来近两年只上了一百来天班），都干了什么呢？她专门告状。……告市委某领导包庇重用坏人，没告倒该领导又转告地委领导。总之，她看谁不顺眼就告谁，宣称‘生命不息，告状不止’。”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喀什不少领导对奚弘都有点怵，怵她强词夺理，怵她撒泼耍赖，更怵她越级上告。领导越胆怯，奚弘胆子越大。为什么对奚弘这样迁就？政纪为何对她失灵？喀什群众的质问和呼唤，却一直撑不起领导的腰杆。原因是：这一级动真了，上一级又会‘开渠放水’。群众又气愤起来：奚弘不归上边管，干什么都要瞅上边？党员党性何在？干部责任何在？还不是‘谁厉害谁不讲理谁得便宜’？”

……

出于《人民日报》的地位和影响，曾、史的文章一发表，即被多家报刊、电台转载、转播。

曾坤、史林杰仍嫌言犹未尽，将一篇言词更加尖刻的长文，送给《新疆日报》，刊于 7 月 29 日《新疆日报》头版头条上。

奚弘说，我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小干部，只是

奚弘（左）和她的诉讼律师边敬斋（右）、代理人郭军（中）在法庭上

为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了反对腐败，何以遭到如此公开指责、诽谤？无奈，她写信给中央一位领导陈述了事情的经过，在信中说："……你看看这些人都在干什么。我不甘心我们国家败在这些人手中，那样何以对得起九泉之下的革命烈士！"

《人民日报》文章变成"尚方宝剑"

这份刊有指责奚弘乱告状的《人民日报》邮到喀什后，奚弘所在的喀什市建管局及其所属单位，甚至喀什地、市的少数领导都如获"尚方宝剑"。首先是建管局及时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学习曾、史文章，围攻批判奚弘。为了表明领导并未患有软骨病，局领导说："我们现在硬起来了"，动员大家批判。霎时，会议室里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的气氛，质问声、警告声，接连不断。有些人连奚弘告状的详情也不知道，竟一起冲着奚弘吼道："奚弘必须交待告状的一切罪行！""勒令奚弘按时写出检查材料！""奚弘，这一回可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会议从下午三点半，一直开到傍晚七点半。奚弘严词拒绝检查。最后，领导振振有词地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奚弘工会干部的职务，改作收发工作"，"只许分发报纸和私人信件，不许接触任何公文、文件"。宣布毕，即拍着桌子喊："你给我滚出去！"

接着，喀什市委也组织干部学习曾、史文章，一则以表明"党性"，二则以"端正"不明真相者的态度。

就在这种风头上，仍有一些敢于直言的干部公开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一位并不认识奚弘的干部直接写信给《人民日报》，信中指出：曾、史文章是给那些想搞不正之风的领导，开了一付"硬骨速效丸"，使他们变成了"硬骨头"。信中还说明，曾、史所说的"好端端的喀什市建管局，实际上存在着许多贪污盗窃、行贿受贿问题，人人皆知"，并质问曾、史：喀什那么多的大案要案，记者不抓，"反而在一个女职工身上无事生非，大作文章，可见我们一些新闻工作者所站的立场"。

难以承受的迫害

曾、史文章发表后，奚弘似乎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怪物"。在机关，不少人以嘲笑、白眼对待她；走到街上，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在一旁指指点点；有些好事的年轻人，甚至挡住奚弘的去路，用好奇、蔑视的口气问"你就是奚弘！?"

当时，奚弘已经离婚，两个孩子由男方照管。那时大儿子 13 岁，小儿子才 11 岁，常常回到奚弘身边。奚弘一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两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一下子也变成了罪人。无论孩子去上学，还是在外边玩耍，总有人冲着孩子说长论短，有些人还用嘲笑的口气说："他们的妈妈就是那个'泼妇奚弘'！"孩子承受不了这种压力，一个个哭着对奚弘说："妈妈你再别告状了，省得咱们整天挨整受气。"奚弘柔肠寸断，忍不住涌出泪水，安慰着孩子……

喀什的冬季，充满了寒意。各方面对奚弘的迫害也步步紧逼。奚弘被清除出干部队伍后，她的办公桌被强行搬到楼道里，办公室的烤火炉子被拆除。她只好穿着大衣坐在楼道里，实在太冷了，就站起来搓搓手，活动活动。

在重重折磨下，奚弘病倒了。她去医院看病，经检查，发现她心肌缺血，神经极度衰弱，哮喘严重，支气管炎发作，并伴有其它疾病。好心的医生让她立即住院治疗，奚弘从机关会计手中领到了住院转帐支票。但是住院不久，有些头头脑脑知道了，一面在《喀什日报》上刊登启事，说奚弘失踪了，声明她所持的支票作废；一面到奚弘所住的医院交涉，硬把奚弘撵出医院大门。

这时的喀什已跨入了严冬。奚弘的处境常常使她无所适从。一天，她竟茫然地骑着自行车，泪水模糊地向东湖公园驶去。冬日的黄昏，公园静悄悄的。她放下挂着提包的自行车，绕湖走了半圈，顺便坐在一块冰冷的石头上发呆。此时此刻，奚弘思绪万千。她想着整天受不完的凌辱，想着作为一个母亲，实在是愧对自己的孩子。

这时，奚弘所在的单位又对她步步紧逼，扣发了她的工资、奖金、烤火费……为了生活下

去，奚弘已花完了存款，几乎变卖完了所有值一点钱的家具；就连亲人赠送的首饰，象样点的衣服，也变卖光了。奚弘已变得两手空空，债台高筑。她几乎被逼上了绝路，真想跳进东湖，以死作为最后的抗争。

天色渐渐暗了，暮寒袭人，冷风过处，树上的枯叶纷纷飘落在奚弘的头上、身上。她想，千百年来，世上的弱者，或者沉冤千载，或者抗争下去，无非两种命运。她的思想在激烈地翻腾着。脑海中又翻腾出张志新的形象。心想，刀子放在张志新的喉管上，她仍敢于坚持真理，至死不屈。我必须拚搏抗争，刀子还没有架到我的喉管上！正是这种女中豪杰的精神，支持她从死神身边醒了过来。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死了，对不起许多亲人！”她内心在说。

夜幕慢慢地降临了。泪流满面的奚弘环视着四周，抖落着身上的树叶。触景生情，她又想到，树叶枯黄飘落了，明春又会一树浓绿；湖面结冰了，天暖又会一湖汪洋春水。我为什么要采取下策自我毁灭呢？

想到这里，她毅然站起来，去推自行车。谁知，自行车和挂在上面的提包，早已被人偷走了。

告全国第一大报难
难于上青天

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奚弘决心诉诸法律。她先到乌鲁木齐，经过多方奔波，得到了自治区总工会法律顾问处和自治区一些主要领导干部的支持，前往北京，状告《人民日报》和曾坤、史林杰。

这是奚弘第一次来到伟大的首都。这时的奚弘一门心思要讨回个公道，一天到晚奔波于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高、中级人民法院之间。她还走访了中央和北京市的上访单位，法律咨询机构。因她是台属，还走访了全国政协和中共中央统战部。

奚弘有个舅舅，原在台湾作过少将，也为奚弘告状一事，给中央领导写过信。大意是：希望贵党解决奚弘告状一事。如果法院缺乏经费，不能去新疆调查，他可以代为解决，假如不够，他可以在台湾募捐。

虽然大家都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是，状告全国第一大报太难了。奚弘奔波呼吁，竟连一份起诉书也无人敢于接收。

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奚弘找到了当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陈秉权，要求全国总工会为她作主。她一见陈秉权，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委曲与悲愤，两行热泪顺着面颊滚落下来。她抽泣地诉说着：“我为维护工人的权益，反对腐败，工人的权益得到保护，我却遭到打击迫害。我的合法权益由谁保护？”陈秉权安慰她说：“你先坐下，不要哭，有话慢慢说。如果你反映的情况都是事实，全总会替自己的工会干部主持公道。”

在研究了奚弘写来的材料，又请来新疆自治区总工会的干部仔细汇报了奚弘的情况后，全国总工会领导决定：由所属法律工作部在进一步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帮助奚弘起诉。

几经周折，1988 年 10 月 5 日，朝阳区人民法院被指定接受了奚弘的起诉书。但告知奚弘，是否立案，何时立案，还请耐心等候通知。

于是，奚弘只好回到遥隔万里的喀什，一直等了五个多月。

1989 年 3 月 18 日，奚弘打长途电话，找朝阳区法院接待室的负责人杨彦军，询问是否立案？电话里传来对方的声音：“奚弘，经过再三研究，你的诉讼我院已经立案受理了。赶快汇来诉讼费人民币 30 元。”此时，奚弘贫困交加，只剩下十八元八角生活费。尽管如此，她还是兴奋地长长舒了一口气。立即从朋友处借来钱，飞快地跑到邮局，将钱电汇北京。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立案十天，朝阳区法院就给《人民日报》社寄出了奚弘起诉书的副本，要求《人民日报》社和曾坤、史林杰提交答辩书应诉。之后朝阳区人民法院又多次发公函、打电话，催促《人民日报》社应诉。

按照法律，被告接到通知应按时应诉，以示尊重法律。而朝阳区法院多次给《人民日报》社发出的催促电函，却象石沉大海，不见回音。朝阳区法院出于无奈，为促使《人民日报》社尊重法律，依法应诉，一天，副院长杨承启、民事审判庭副庭长曾体文、审判员王静波，亲自上门找《人民日报》社有关同志谈话，几经周折才进了大门，但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

朝阳区法院催不动《人民日报》社，又碍于大报的"威信"，不便依法拘传或缺席审判，只好向上级法院请示。此事又被搁浅起来。

1992 年 4 月，整整等待了三年多的奚弘，第四次从喀什赶到北京，催促法庭公开审理此案，她却被法院告知：由于被告一方的不合作态度，此案被迫中止。法院的这一通知，犹如千斤重锤击顶，奚弘几乎晕了过去。

奚弘强忍悲愤回到全总。全总法律工作部的许多干部得知此情莫不诧异，议论纷纷。他们认为，从法律观点分析，《人民日报》社拒不应诉不仅是违法的，而且有悖于报社所宣传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基本原则。有人让奚弘再找倪志福主席。听说全总的领导正在会议室开会，奚弘已顾不得请秘书通报，硬着头皮闯入会议室，向倪志福面陈了自己的困境，请求全国总工会为她作主。倪志福答应了她的请求。

以后，全国总工会又不断地找有关单位的领导，要求按法律程序审理此案。

律师、法官和中央有关单位分赴新疆调查

早在 1990 年 9 月，奚弘的诉讼代理人、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的律师郭军，就专程去乌鲁木齐和喀什调查。他历时四十多天，取证五十多份。许多被调查的对象以有力的证据证明，奚弘反映的情况属实，喀什的问题的确是严重的。就连慑于权势、不敢大胆揭发真相的人，在言谈和证词中也显示出对奚弘的同情。而那些证明奚弘是"乱告状"、"撒泼耍赖"的人，则言词含糊，或缺乏实在的内容。

然而，使郭军庆幸的是，深入调查的结果，终于查明了事件的真相，取得了有力的事实依据。回京后，郭军将调查材料通过组织全部转交给朝阳区人民法院。

1991 年 7 月，朝阳区法院派出了副院长杨承启、民庭副庭长康长庆和书记员马鹏旭，远到新疆调查取证。经核查，奚弘状告的案件共十一桩，事实绝大部分属实，只有三桩尚待完全落实，但无一属于诬告。有证据表明，此事两位记者在写稿前全知道。人们看到三位法官严肃负责的调查态度，他们每获得一份证词都视为"珍宝"，小心翼翼地装在公文袋中，去食堂吃饭时带在身边，外出调查时又提在手中，休息散步时也要抱在怀里。他们如此珍视调查材料，充分说明此案的复杂性与严重性，说明我国公检法人员更懂得"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重要性。

1993 年 4 月，中纪委和监察部联合组成调查组，前往新疆喀什，核查喀什地区原地委主要领导人的违纪问题。去前，他们并不知道有个奚弘。但是在两个月的调查中，不少被调查的职工不断反映：有个奚弘为了状告当地领导贪污腐化，受到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奚弘一直告状多年，至今还没有结案，谁还敢再说话。

了解到奚弘告状的原委，使中纪委和监察部调查组的三位同志对奚弘的正气深深钦佩。由调查组长杨益铭出面，经中纪委领导同意，专门写了一份"有关奚弘同志一些情况的反映"的信函，送交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给奚弘以道义上的支持。

这份材料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喀什地委原主要领导人利用新闻宣传工具大肆宣扬自己，并利用与个别新闻记者的关系，在一些报刊上打击迫害持不同意见者，如奚弘、邵海勋等人。

二、奚弘同志作为一个女同志，舍去家庭、亲人，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名誉，维护法律的尊严，进行了长期的、极其艰难的努力，这是十分值得学习的。

三、奚弘同志作为一名基层工会干部，敢于为职工利益说话，敢于向领导反映问题，这种精

神是应大力提倡的，因为现在这种精神太少见了。一些领导干部不喜欢听，或者听不得不同意见。奚弘同志坚持长期告状，这不能简单视为“告状专业户”，要看她反映的问题是不是事实？为什么她要长期坚持反映？由于现在有那么一些部门，一些领导干部不负责任，不讲党性原则，压制不同意见，对提不同意见的人或向上反映情况的人进行各种方式的打击报复，因而造成一些地方干群关系十分紧张，并且直接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威信。一个时期以来，“告状”的人少了，党、政纪以及法纪案件线索越来越少，可是群众对反腐败的呼声越来越高，腐败现象在一天天蔓延，呈上升趋势。这个反差说明了什么？不能不说上述情况是一个重要原因。

后盾——万千同情者、支持者

在旷日持久的诉讼过程中，许多正直的干部、群众向奚弘伸出了援助的手。这使她在难以支撑的困境中，挺起了胸膛。

最初，奚弘在受到围攻的时候，喀什各级工会同行们对她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就连喀什那些同情过、支持过奚弘的工会干部，后来虽然被迫写了检查，或被调离了原岗位，他们偶然见了奚弘，总是负疚地说：我们顶不住了，不如你。你可得顶住！请你理解我们的苦衷，我们的心是向着你的。奚弘的朋友张朵云夫妇看她十分孤寂，便花钱买了一台收录机送给奚弘解闷。

奚弘单位的合同医院是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合办的。这个师的政委得知奚弘被医院赶出后，生气地批评医院院长说：“我们对敌人尚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救死扶伤，奚弘是好同志，为什么这么对待她？出了问题你们负责！”而一些同情奚弘的医生，早已把药送到了奚弘手中。

在喀什地区一级领导中，也不乏同情支持奚弘的干部。在奚弘告状期间，他们自始至终都尽自己的所能，为奚弘提供诉讼的方便。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宋汉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郭刚，对于《人民日报》刊登曾、史文章表示不解，始终给予了奚弘道义上的支持。新疆总工会法律顾问处专门为她聘请律师，连她进京后的生活困难都尽量加以关照。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关心、支持、帮助奚弘呢？山西一位热爱法律工作的干部，看了有关奚弘案件的报道，写信给奚弘，赞扬她“为正义而顽强不息的抗争精神”，“您的官司打出了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志气！”

针锋相对的法庭辩论

本来，一张报纸天天发表新闻，难免会有失误。有了错误，大大方方加以更正，澄清事实，只会提高报纸的威信。可惜，当时的《人民日报》社在奚弘的问题上，并没有这么做。在此案立案三年之后，即 1992 年 9 月 8 日，《人民日报》社领导、法人代表才到朝阳区人民法院表示愿意接受批评，愿作检讨，也承担责任，希望化干戈为玉帛。法院称赞了报社领导尊重法律的态度。朝阳区法院立即为双方做调解工作，但调解尚未完结，不知何故，《人民日报》社领导忽又改变态度，要求开庭审理。于是，朝阳区人民法院在征求双方意见后，定于 1992 年 12 月 4 日开庭审理此案。

开庭当天，法庭上出现了严肃紧张的气氛。

原告奚弘宣读起诉书，陈述被告捏造事实，造谣中伤，侮辱人格，将自己反腐败的行为诬蔑为“乱告状”、“怠工”、“撒泼耍赖”、“特殊公民”。她读到这里，泪水堵塞了喉咙，泣不成声。法官见此情景，急令法警将奚弘搀扶下去，安定片刻，再继续陈述。奚弘接着陈述说，由于被告的严重侵权行为，给她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后果。她要求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要求被告公开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以消除影响，恢复她的名誉。

曾坤在发言中坚持说他报道的都是事实。他还请求法庭在审理此案时，能考虑到社会后果和当地党委的意见。他说，喀什地委书记徐效成讲，法院如果判奚弘胜诉，那我们的工作就不好做了……

辩论到这个份上，旁听席上传出了唏嘘声。

休庭时，一些听众议论说：这是法庭，不是官场，不要以权压法，难道徐效成无法工作，就该判奚弘败诉吗！？

12 月 4 日到 5 日，奚弘和她的诉讼律师边敬斋、代理人郭军，《人民日报》社全权委托代理人、律师方建平以及曾坤，双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至 5 日下午，法庭宣布双方结束辩论，各自作最后陈述，并说明在最后宣判前仍可以调解。然后宣布休庭。

休庭后，《人民日报》记者王标来到审判长杨承启的办公室，杨承启请王标给《人民日报》领导捎个话：希望《人民日报》能像对有关机关表示的那样，承认文章给奚弘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这个前提下，法院可以为双方进行调解，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前提，奚弘是不会接受调解的，法院的调解工作亦难进行。

全国总工会领导在休庭后接到《人民日报》领导的电话：请全总说服奚弘，让她撤诉。全总领导表示：我们应当尊重奚弘本人的意愿，撤诉不撤诉是由她自己决定的，我们决定不了。

从 12 月初开庭之后，又是上上下下，不断地公文旅行，又是方方面面，无休止地催促、磋商……

1994 年春得到的消息，原喀什地委书记徐效成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已被罢免，新任喀什地委书记张秀明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站在公理一边的
报纸、记者、作家

奚弘的这场官司是由两名新闻记者的报道引起的，被告曾坤、史林杰在采访原告奚弘时，由于双方对事实和是非的看法相左，发生争执。两名记者本应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核对事实，不料，曾坤竟当场声言要把奚弘捅到“大内参”上，登到《人民日报》上。

1992 年 12 月，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有多家新闻单位派人旁听。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的《人民日报》记者王标，奉报社之命也前往旁听。谁也不曾料到，正是报社自己派出的记者，听了两天法庭调查和辩论之后，首先站在了法律公正的一边。法庭一休庭，王标便约奚弘采访，奚弘听说王标是《人民日报》记者，如同“惊弓之鸟”，婉言拒绝。王标紧追不舍，第二天晚上迳直赶到全国总工会招待所，再三向奚弘说明来意，方消除顾忌，使奚弘原原本本谈了案情的经过。围绕此案，王标又进行了多方面的采访核对，掌握了更准确的情况。

此案该不该报道？能不能报道？使王标处于两难境地。他分明感到了一种威慑力量，同时又面临着一场不可回避的良知与胆识的考验。然而，他终于鼓起了“下地狱”的勇气，秉笔直书。一篇题为《还我清白——奚弘诉〈人民日报〉、曾坤、史林杰侵犯名誉权案实录之一》草成。由《北京青年报》摘要刊登在 12 月 22 日的新闻周刊试刊号头版头条位置上，标题改为《〈人民日报〉被告侵权案开庭》。

这篇独家新闻一经发表，有三十多家报刊、电台，纷纷予以报道，披露案情，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效应。

我国新闻界老前辈、八十高龄的冯英子老人，读了有关奚弘案件的报道后，从 1993 年 4 月到目前，陆续写了十多篇评点文章。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说奚弘同志真是一个‘告状专业户’，那么，正好显示了她敢作敢为、不屈不挠的立身处世的美德”。他认为“从这个事件的过程来说，我们看到了法制上升的火花，也深觉法制行动迟缓”。看来，这位历尽沧桑的老人心灵深处也受到了莫大的震动。

本案尚未审结，福建一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当今诉讼名案大观》，已将该案优选入册，并加了评语，阐述了此案在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难还难在背后的斡旋

自从 1992 年 12 月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之后，按法律程序，理应及时宣判。然而，却又一再延期。

1993 年 9 月初，奚弘接到了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发来的传票，通知她 9 月 20 日将开庭审判。奚弘已期盼了四年多了，她高兴了一场。临

到宣判，又落了空。一直等到 1994 年 1 月 11 日，宣判仍不能进行，又改为调解。

调解的前一天，《人民日报》社曾由负责干部等数人出面，找全总领导斡旋。依然是请求全总领导规劝奚弘撤诉，其他问题，都可以在法庭外协商解决。

接待他们的是全总副主席张国祥，他说：全总领导关注的焦点是法律。出于维护工人和工会干部的权益，我们一直认为，起诉还是撤诉，都是奚弘的公民权利。张国祥严正地说，奚弘一案，报社三年半不应诉，本身就是无视法律，蔑视法庭的表现，作为宣传法制的中央报纸，此事拖延数年之久，远比奚弘状告侵犯名誉权案更为严重。全总领导希望报社带头遵守法律，接受法院公正合理的判决。尊重法律这不仅不会降低、反而还会提高《人民日报》的威信。

报社法外斡旋再次失败。第二天，原告被告都来到朝阳区法院，由法院从中调解。这次调解，报社方面的态度有些缓和。过去几次，庭审也好，调解也好，报社一方始终持强硬态度，一直认为曾坤、史林杰文章无错，根本不存在侵犯名誉权的问题。这一次，有了婉转的说法，大意是：现在，从事后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看来，曾坤、史林杰的文章，在个别文字上、用语用词上有欠准确的地方，应该吸取教训。但又说，这个别用字、用语、用词欠准确，并未构成侵犯名誉权，只是给原告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或者说造成了一定麻烦。此事虽不属侵权，但有实际后果发生，报社愿以适当形式承担一定责任，给原告以经济赔偿，并由报社群工部或曾坤个人以被告身份，向原告奚弘表示某种歉意。但这一切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要请求法院约束原告不得到处散发材料，不要登报。

朝阳区法院对双方的每一个接近点都持欢迎态度。但认为报社要法院约束原告的要求，超出了法律应有的权限。

原告奚弘和她的诉讼代理人、律师也都认为被告的态度比过去有了一点点进步，但基本态度未变。因为本案诉讼的就是《人民日报》及曾坤、史林杰的文章侵犯了奚弘的名誉权。只有报社和曾、史承认了这个前提，决定公开为原告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给以经济赔偿，才具备了调解基础。如果报社连侵犯名誉这个事实都不承认，调解就无从谈起。

由于被告在侵权问题上始终没有和原告达成共识，因此法院前前后后一共公开调解了四次，均以失败告终。

调解失败后，奚弘从法院得到的消息是，要她留在北京，等候宣判。她望眼欲穿，一直等到除夕，朝阳区法院那边仍没有任何动静。眼看着首都人民家家户户都在欢欢喜喜准备过年，奚弘却孤苦伶仃地等待着法院的判决。她无法遏制心中的悲愤，直接上书最高法院院长、副院长，“恳请敦促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审结她起诉的《人民日报》及曾坤、史林杰侵犯名誉权一案”。

落款和署名是：“当万民合家欢乐、共度佳节之时，却是我孤苦伶仃、形影相吊之日。一个不让回家、也不能回家的人。奚弘 1994 年 2 月 8 日。”

这是一份带着泪水写给执法部门最高领导人的敦促信。奚弘想，若是再没有动静，也许告状一事从此便没有下文了。

但是，法院很快告知奚弘，还是“应当耐心等待”。一场官司既已立案，就会有审结的。等待的原因是：国家正忙于 1994 年的人大、政协两个会议，要她顾全大局。

“两会”结束以后，奚弘仍然没有等到宣判的消息。此时，奚弘却从可靠的途径得悉，《人民日报》社为了阻挠奚弘一案的正常审理，又在进行法外活动。这一次，报社是以上级组织的口气致函新疆喀什现任地委书记张秀明，要求喀什地委派干部来京，采取行政措施，把奚弘带回喀什，让奚弘撤诉，或者法外私了此案。并要求喀什地委向法院公开表态：喀什地委是支持奚弘，还是支持党报？现任喀什地委书记并没有接受这种超越法律权限的要求。奚弘从内心敬佩喀什地委尊重法律的态度，但却不明白，为什么《人民日报》社一再要求享有法外特权，企图借喀什地委一级组织的权力，来剥夺一个公民应该享有的宪法赋予的正当权利。为此，奚弘立即致函朝阳区法院，请求法院调查这种蔑视法律的行径。

奚弘按照法院希望她顾全大局的要求，一直耐心等待，但时间过了一年多，仍没有等出任何结果。1994 年 6 月初，奚弘又上书最高法院、北京市高级法院、朝阳区法院。信中提出：按照民法，此案 1992 年 12 月庭审完毕，理应在半年内审结，请问法律何在?!法律时效何在?!又说，法院一次次要求她顾全大局，她究竟要等到何时？她要求法院在 6 月 20 日前，给她一个何时审结此案的明确答复。否则，她只好通过正当的合法的途径向海内外报道有关事宜，并向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申诉。

信在结尾处写道："民（身）不可辱，民心不可欺，再次希望人民法院早日审结此案，还我以生存、工作、民主和名誉的权利"。

6 月 20 日的时间到了，奚弘收到了法院的通知，表示就要审结，仍望她等待。

1994 年，奚弘在等待中又熬过了一年。

不得已，她上书江主席

奚弘感到，等待似乎已成了敷衍塞责的代名词。她真不知道本案要拖到何年何月，"难道一定要把我活活拖死？这倒真是真正的杀手锏"。

1995 年初，这个在法律彼岸度津无门几乎绝望的人，一天，忽然听说江泽民主席和中央领导都在认真听法制课。这个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奚弘，她想了再想，终于拿起了笔上书江主席。

奚弘在调解书回执上签名，左为朝阳区法院民庭副庭长康长庆

信中，她以简洁的文字介绍自己，陈述案情，以及她要求讨个做人的权利的苦情。同时汇报了《人民日报》社三年半拒不应诉，搞法外特权，干扰法院独立审判。还汇报了法院奈其党报地位，竟违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此案一拖再拖，无视法律尊严，无视公民权益，无视海内外舆论的影响……

"公民犯法由法院来制裁，法院犯法由谁来管!?"她在绝望中发出呼喊。

期盼使她增强了信心，她再次致函三级法院，陈述自己备受的苦难，强烈要求法院结案。不然，她只好诉诸社会舆论，求助于人大代表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代会上立案审查。

很快，她收到朝阳区法院 2 月 21 日的来函。来函表示理解奚弘的"较多实际困难"，信中说，"此案问题复杂，涉及面广，在国内外都有较大影响，所以各级法院都很重视，现正在人认真研究之中，你应当耐心等待"。

5 月 19 日，北京高级法院和朝阳区法院主管民事的副院长，通过全总见了奚弘，答应一定要结案，要求她再等两个月。奚弘请求一个月内给个回答。一个月过去了，竟无一字回音。

最大的希望，一下子变成了最大的失望。奚弘含着热泪给两个孩子写了绝笔书。信中将告状以来所借债务，一笔一笔交代清楚。希望她的两个儿子在有能力之日，替她连本带息还清这笔冤枉债。

在希望和失望的不断折磨中，奚弘疲惫不堪，心力交瘁，只好拖着沉重带病的身躯，再一次回到上海，依靠老母养活自己，从中得到一点安慰。

她依然牵挂着：给江泽民主席的信，不知送上去了没有？

法的曙光终于显露

在母亲家中，奚弘每隔十天半月就给三级法院写信或打长途电话，催促审理结案。由于得不到明确

答复，一家人忧心忡忡，常常以泪洗面。

1996 年 2 月 8 日，江泽民主席发表了《以法治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讲话，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法律界都在认真学习。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三・八”前夕，最高法院、北京市高级法院、朝阳区法院，共同派人带上礼品飞往上海，向奚弘及其母亲表示慰问。法官捎来最高法院领导的口讯：法院要作些开庭前的准备，并说“两会”正在召开，再次希望奚弘耐心等待，还说法院愿在上海为奚弘联系工作等等。

据可靠消息：为了这桩案子，最高法院、北京市高级法院都曾邀请法律界的权威人士和专家，专门作过论证，绝大多数学者和专家都明确表示，这一案件构成侵权。这无疑也增强了法官们办案的信心。

但论证归论证，执法归执法，虽然论证结论相当明确，但执行中仍然碰到种种阻力。

奚弘举债度日，早已难以为继。她给朝阳区法院写信呼吁，要求解决困难。9 月 18 日朝阳区法院根据奚弘的申请，裁定被告《人民日报》社应先预支付奚弘五万元的经济补偿费，并劝告她继续等待。

由于《人民日报》社和曾、史对此案的态度逐渐有了变化，1996 年 10 月底，朝阳区法院通知奚弘前来北京，希望原告被告双方能通过协商了结此案。接到通知，奚弘又立即由上海赶到北京。在双方协商的过程中，原告被告的观点略有些接近，但争议仍然是明显的：被告一方只承认曾、史的文章有些内容不准确，有些用语不当，对奚弘的人格评价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不认为构成侵权，拒不在《人民日报》上为奚弘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这次调解实际上又是一种权与法的较量。在人们的心中，一个区区基层法院，怎么能说服如此强大的被告？但是，不管被告态度如何，法院还得规劝被告尊重法律，不能以权屈法；另一方面还要规劝奚弘顾全大局，向被告作出让步。频繁往来磋商，举步维艰。

法院说服不了《人民日报》社，又转过来规劝奚弘再作出让步，奚弘悲愤已极。于 1996 年 12 月 14 日，再次上书最高法院院长并三级法院。信中说，“再过几天就到 1997 年元旦了。我的案子将跨入第十个年头。十年审理一桩普通民事案而未能最后审结，这也是天下奇闻。”“多年来，我一直配合法院，顾全大局，委屈自己，希望能合情合理合法地尽快结案，还我公道，也给《人民日报》社下台阶，我已违心地同意让《人民日报》社法定代表人不在报上认错，已作了原则性让步，但侵权的《人民日报》至今不承认侵权，在关键的法律用语上绕道走……”她声明：“不再让步”，“必须按法律办”，“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封信，态度强硬，气势逼人。

面对奚弘的强硬态度，法院仍在耐心调解。道理千条万条，还是让奚弘顾全大局，从国情考虑接受调解，并表示奚弘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已经很不容易了。

1997 年元旦前后，被告《人民日报》社法定代表人、曾坤和原告奚弘，都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字。情况就是本文开头写的奚弘在法院调解协议书的回执上写上了自己的意见，对被告长期文过饰非的态度，出尔反尔干扰法院审判的行为提出了批评。也许是奚弘这位普通公民对“以法治国”的期望值过高。对此案是否属于侵权？谁胜、谁负？为什么奚弘说是“违心地签了字”？读者看完全文，自然会作出各自的公断。

但是，只要考虑到我国的国情，考虑到我国长期以来“人治大于法治”的不正常状况，相比之下，今天我国法律确已日趋完善。一个无职无权的小干部，状告全国第一大报，与之对簿公堂；而这个大报竟然能以被告身份屈尊向这个小干部写信致歉，并赔款补偿她名誉和身心的损害，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法制的巨大进步。一旦全社会公民，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能以身作则，崇尚宪法，尊重法律，维护法制形成风尚，则我国以法治国的步伐就会向前大大迈进，我国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将会更加巩固。

（作者注：由于此案历时九年，其间多有人事变更，为了历史的真实，文中涉及的人员职务，一律不作改动）

（责任编辑　方　实　王　恂）

关于『吴晗问题』性质的高层争论

● 苏双碧

北京为何不转载姚文

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出笼，给吴晗定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受到学术界、党政界以及正直人们的激烈反对。反映到党内，特别是反映到当时党的中央，就出现了一场“批吴”的性质之争，即政治性质与学术性质之争。前者是要把吴晗纳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人民的轨道，并以此作为掀起“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后者则想矫正这个轨道，把“批吴”纳入正常的学术讨论之中，以百家争鸣的方式，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学术。这场争论的是与非本来是了如指掌的。但由于代表人物拥有的权力不同，争论自然就朝着恶风逆浪的方向发展。但在“五·一六”通知发出以前，这场争论一直是在激烈地进行着。

1965 年 11 月 10 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之后，张春桥一面以“百家争鸣”为诱饵“引蛇出洞”；一面密切注意社会舆论，特别是新闻媒介的动向，尤其是北京的动向。为了扩大影响，制造声势，张春桥亲自拟了三十多个题目，不断在《文汇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评《海瑞罢官》的文章，目的是引起各省注意，让他们踏进批判《海瑞罢官》的行列。但是，北京却一直按兵不动。正如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所说的，“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张春桥为使北京的处境更加被动，立即奉命让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海瑞罢官》的单行本，并于 24 日由上海新华书店电北京新华书店征求订数。北京方面意想不到，有点措手不及，又不知出单行本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之一，就指示北京新华书店不作答复。上海来电话询问，北京书店也不表态。

与此同时，《解放日报》、《浙江日报》、《新华日报》等许多家报纸都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而张春桥等利用《文汇报》及时报道了各省的转载情况，给北京市委施加压力，迫使《北京日报》不得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北京和上海处于僵持的对立之中，直到 11 月 29 日北京市委决定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同时也指示新华书店征订单行本。

其实，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一篇蛮不讲理，扣大帽子的文章。所以，彭真对姚文元的文章颇不以为然，他在这前后发表过许多掷地有声的谈话。据康生主持编写的《1965 年 9 月到 1966 年 5 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下引此文只称“大事记”)说，1965 年 9 月至 10 月间，“毛主席早就觉察到吴晗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向

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问题。"于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只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这是姚文元文章发表前两个月的事。说明毛泽东早于此时就把批判吴晗纳入战略部署之中。毛主席之所以问彭真,意在告诉彭真要批判吴晗,彭真没有思想准备,回答当然也只能是搪塞之词。何况彭真此时并不知要批判《海瑞罢官》,更不会想到给吴晗加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所以才有随后9月23日在他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说的:"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管他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可以看出,彭真在听了毛泽东提出要批吴晗后,是做过一番调查研究的,他没有发现吴晗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至于吴晗的学术观点,以及吴晗的政治思想和为人他都是很清楚的。所以直到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十多天之后的1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会议上他听到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时,还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彭真的这些言论表明他对姚文元文章的不满,清醒地认识到姚文元文章不是真理。但他对由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引发的后果,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判断清楚的。作为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只能按照党性原则,来努力矫正党当时可能出现的歧途。这个信念,使此后反对把吴晗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彭真等人为一方,同坚决要批判吴晗并认为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江青、张春桥等另一方,进行了长时期的争论。

11月29日《北京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但彭真并没有放弃原则,特为转载文章加了一个按语,强调了毛泽东曾亲自提倡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并说:"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我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这个按语明显是对姚文元文章的批驳,只承认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有不同意见",并且指出这些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

1948年吴晗去解放区前,在
清华大学留影　(张友仁摄)

文章时也加了按语,强调:"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互相争论和互相批评。"并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应该说,《人民日报》的按语和《北京日报》的按语,基调是一致的,都是力图把《海瑞罢官》的性质向学术问题上拉。这自然会引起康生、张春桥之流的不满。只是由于《人民日报》的按语系周恩来定稿,他们对此不敢过于放肆,便指责《北京日报》的按语不仅不支持姚文元,反而强调对《海瑞罢官》有不同意见应展开讨论;对《人民日报》则只说按语"没有表示支持姚文元同志文章",但"按语最后一段,引用毛主席的话,指出对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进行斗争。这是周恩来同志加的。"说明周恩来对当时形势判断虽无所是,但出语谨慎,使康生之流不得不留下这一笔。不过,文章转载了,关于吴晗的性质并没有因此而结束,由于决定批判吴晗的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引而不发,甚至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都不知道毛泽东到底在想什么,更没有

确切信息说明姚文元文章和毛泽东要批吴晗到底有什么直接关系。他们似乎都没有认识到，姚文是毛泽东的重大战略部署之一。这就铸成正直的善良的人们和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围绕着吴晗问题性质的争论必然要继续下来，甚至有可能误入陷阱而走向灾难。

真与假之间

《北京日报》既然被迫转载了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就意味着北京市委也必须批判吴晗。果然，在转载姚文的第二天，北京市委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等高等学校以及北京市历史学会抽调了七八个人，成立了《海瑞罢官》问题讨论写作组，由邓拓担任组长，范瑾直接联系小组的日常工作，办公地点在《北京日报》办公大楼四楼。写作组成员报到的当天晚上，邓拓在他的办公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邓拓说："《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想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姚文元的文章不是结论，可以讨论。姚文元文章的引文和结论都有歪曲吴晗的原意之处。当然，吴晗这几年写的文章，也有可讨论之处。把你们找来，可以研究些问题，写些文章。写什么内容都可以，摆事实，讲道理，采取商榷的态度，不要扣帽子。"并说："我们不采取出题目做文章的办法，因此，不研究选题，也不集体写文章。以个人的名义写好。"邓拓的意思，是想在学术上做文章，或者在某些学术观点上对吴晗进行批评，按照《北京日报》按语的基调办事。当北京大学一位教师提出"姚文元引用史料，断章取义想写几篇文章逐条批驳"时，邓拓摇了摇头说："不能这样搞，这场讨论主要不是一二条史料的问题。"邓拓没有同意写批评姚文元的文章，不管是在观点上还是史料上。事实也正是如此，从 11 月到 1 月两个月的时间，写作组发表的五篇文章，都是批评吴晗和《海瑞罢官》的。当然，这个写作组不过是围绕吴晗问题性质争论的一个小小插曲，真正有影响的是当时双方都发表过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由于这些文章的作者背后都有一条线，或叫指使人，因此，这些文章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正是这些文章，把这场争论，逐步引向上层，使上层争论日趋白热化。

首先是邓拓化名向阳生，在 1965 年 12 月 12 日，即《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后的第 13 天，发表了《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与吴晗商榷》。邓拓除了批评吴晗的"道德继承论"之外，还认为《海瑞罢官》的"思想基础"是"道德继承论"。

但文章的行文却是富有针对性的，他写了这样一段开场白："最近许多报纸正在开展关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讨论，这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我看过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之后，重新翻阅了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吴晗同志 1960 年 11 月 13 日七稿、1961 年 8 月 8 日改写剧本，同时参看了从 1959 年到 1962 年这个期间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晚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所刊登的有关海瑞的其他文章和几种剧本，加以比较，反复探索吴晗同志研究海瑞和创作《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指导思想究竟是什么?"

这个开场白至少说明了这么几点：一，作者是看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才写这篇文章的。说明作者明白无误地表达他不同意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诬陷；二，作者对吴晗《海瑞罢官》及其成书过程是作过调查和研究的，找不到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痕迹，只找到了"道德继承论"这个思想基础；三，作者在调查吴晗写《海瑞罢官》的历史背景时，特地参阅了当时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并把当时有关海瑞的文章和几种剧本"加以比较"。这个开场白，表现了邓拓的骨气，表现了他的勇敢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这里的潜台词是：你上海不也有人写过许多有关海瑞的文章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吗?不也有过几种海瑞戏在上海上演过吗？这些有关的海瑞戏和海瑞文章难道和吴晗的海瑞戏和海瑞文章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邓拓从而针锋相对地提出，《海瑞罢官》的思想基础是"道德继承论"，而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除邓拓的文章外，1966 年 1 月 8 日《北京日报》还发表李琪化名李东石的《评吴晗同志

吴晗在作学术报告

的历史观》。李琪的文章是批评吴晗的自我批评一文的，文章仍称"吴晗同志"，三个标题分别为：一，吴晗同志的历史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二，夸大帝王将相在历史上的作用；三，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是根本错误的。这篇文章对吴晗的批评是严厉的，但也只限于批评吴晗的历史观。北京市委的这些努力，就当时而言，并不能说是假的，而是本着弄清思想、辨明是非的原则。吴晗在市委有关领导的示意下，先后在《北京日报》发表两篇自我批评，即 1965 年 12 月 30 日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和 1966 年 1 月 8 日的《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应该说，他的检讨是认真的、深刻的、态度是诚恳的。

吴晗很希望通过检讨，能得到谅解，说他假检讨真进攻，或者避重就轻，都不过是一种无端的指责。现在回过头来看，对于吴晗来说，检讨不检讨是一回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检讨可能比检讨更好些，更不会给人以口实。对于北京市委也一样，已经是内定的摧毁主要目标之一，他们无论怎样做都是无济于事的。就彭真而言，他确实是一条汉子。1965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并说："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第二天，即 12 月 22 日，彭真公开申明："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并说："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他明确告诉吴晗："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他实事求是的态度。吴晗、邓拓、李琪的文章都是在彭真的鼓励下写出来的。

毛泽东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但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点出《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这是针对着邓拓、吴晗等人的文章而发的，目的是进一步把批判吴晗引上政治轨道。说明毛泽东时刻都在关心这场争论，指挥这场争论，以及引导这场争论。在有关《海瑞罢官》讨论的初期，确实存在着一场较量，一方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抛文发难，诱人入网；另一方是彭真、陆定一等人，据理力争，希望这场讨论能引出一个较好的结果。在这期间，彭真的处境是被动的，但他的所作所为却是在为真理、为党的事业而斗争。

若论真与假，由张春桥、姚文元出面发动《海瑞罢官》的讨论，《文汇报》连续的按语、以及发表对立面文章等等，都是假的，是制造一种假象，引蛇出洞。而彭真他们的言论和所作的努力，包括让邓拓、吴晗写的文章，都是真诚的，按照党的最大利益来引导这场讨论，襟怀坦白，没

有半点虚假。

“方求”——
中宣部批判吴晗的样板

张春桥、姚文元挑起批判《海瑞罢官》，让“战火”四方蔓延，并把主要目标对准北京市委。他们气势汹汹，好像真的只是在抓吴晗的《海瑞罢官》。但潜在的意图和目的却始终没有袒露出来。既然这样，作为意识形态的主管部门中央宣传部，当然有责任领导起这场讨论。但上海并不是等闲之地，张春桥、姚文元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们背后有江青，有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柯庆施。何况早在姚文发表一个多月前，即1965年9月、10月间，毛泽东就提出要批吴晗。这一点作为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应该是清楚的。但是，姚文发表后，毛泽东并没有立即就这个问题向中宣部下达指示，说明意图。这样，中宣部就只有按常规办事，由副部长周扬出面，找了四位秀才，写一篇批评吴晗《海瑞罢官》的样板文章。

周扬当时的指导思想是，这么大的一场争论，中宣部应有个态度，他本人应有个态度。文章的基调是：吴晗有严重错误，但不是敌我矛盾。对这篇文章，1965年12月受到康生等人的指责，他们说：“《人民日报》发表中央宣传部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文章，题为《“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篇文章关于“清官”问题的观点是很错误的。”后来江青、张春桥把这篇文章定性为“假批判真包庇”。

引发中宣部写这篇文章的意图，是想摆脱中宣部的困境。很长一段时间，中宣部对《海瑞罢官》讨论的抵制和消极态度一直受到康生等的指责，这充斥在康生专为这场争论起草的《大事记》中。他在《大事记》中作了如下记述：一，9月23日，陆定一“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大反斯大林”；二，11月11日至28日“北京各报刊，在18天内，都未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同志和中宣部都不让转载”；三，11月28日“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有北京市委同志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等同志参加”；光明日报之所以迟了三天转载姚文，是因为“姚溱同志转达的彭真同志的意见，说不能同时转载，以免震动太大”；四，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文章，题为《〈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篇文章关于‘清官’的观点是很错误的”；五，1966年1月2日，“陆定一同志在会上攻击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没有同他打招呼。他还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他还在其他场合说，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指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就好了。陆定一同志的基本观点和彭真同志是一致的”；六，1月13日至17日“关锋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的两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的文章写成。这两篇文章都送给了中宣部，一直被他们压着”；4月2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戚本禹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这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同志压了两个半月”；4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的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也被彭真、许立群同志压了两个半月”。

从对立一方的指责可以看出：北京反对上海张、姚的力量基本上是由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组成的。中心议题是围绕着有关吴晗《海瑞罢官》的性质问题。据此我们可以认为，由中宣部组织的“方求”的文章，也是一篇力图说明自己对批吴晗问题性质的文章，并不是什么“假批判真包庇”。“方求”的文章着重批评吴晗关于“清官”海瑞论述的错误。作者首先认为把“清官”海瑞说成是农民“救星”是从根本上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显然，作者是想通过揭示“清官”的本质来指出把清官当作农民“救星”的错误。但是在文章的第二部分的第二个标题却用了“借古非今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这个提法是吴晗所不愿意接触到的。因为对于吴晗来说，反社会主义和他联系在一起简直是耻辱。当然，一

部作品代表着一种反动思潮，有时并不是作者的原意，而是由他的立场和世界观所决定的。然而，吴晗的《海瑞罢官》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和一种反社会主义思潮挂上钩。但是文章不得不这样写。因为这种对吴晗问题的无限上纲又恰恰是用来解救吴晗或替吴晗开脱的手段，并以此来对抗姚文元的诬陷。也就是说，平白无故的吴晗至少也得蒙上严重错误或立场问题了。当然，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对姚文的退让。因为当时争论的焦点是吴晗在政治上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下一个问题便是吴晗为什么敢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的后台是谁？这一点，彭真、陆定一、邓拓等同志显然是会意识到的，所以他们一方面组织写作班子，摆出要讨论《海瑞罢官》的架势，一方面指示向阳生、方求撰写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力图扭转《海瑞罢官》讨论的方向，以及转载姚文的时间、按语，以及后来写成的《二月提纲》，都是在和党内一种错误的势力作合法的斗争。但是，党内生活的不正常，以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集权的影响，使真理及其他任何权力都很难超越。彭真等人虽代表了党和国家利益，代表了真理的一方，但他们缺乏毛泽东的支持，在当时他们要靠正义一方结合起来的力量击败张、姚一伙是不可能的。党的中央宣传部也只好借助“方求”的“思潮”幌了一枪，文章不得不这样写，而实际上连“方求”诸位也不会真正认为《海瑞罢官》和反社会主义思潮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更不会认为处在饥寒交迫的死亡战线上的农民，为了活下去种点自留地会是什么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极左派力量的聚集

《海瑞罢官》讨论的深入，深层人物自然就要走上前台。以江青、林彪为一方和以彭真、陆定一为一方的较量，于2月间正面拉开。2月2日开始，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五人的座谈会，以“看电影、批黑线”为名，看了十多部电影和三台戏。又以个别交谈和集体讨论的形式，把江青自己的意图、观点灌输给与会者。实际上到会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并没有说多少话，也未必知道江青的意图。这个“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会后发的纪要冠名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特别加上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13个字，赫然昭告这个座谈会的前台人物就是林彪和江青。当然，林彪的出台并非如同张春桥出台一样——早有预谋，而是毛泽东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斗争的一种需要。正如江青后来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所说的，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是利用解放军的力量去“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其实，江青当时也不过是一个负有特殊身份的卒子而已，她是没有力量搬动林彪，更没有力量搬动军队的。座谈会纪要在经过陈伯达、康生以及毛泽东本人的多次修改之后，毛泽东在1966年3月17日作了批示：“此件用军委名义”。这就再清楚不过，江青是在执行毛的意图。这个座谈会是用来对付以彭真为组长的党中央正式任命的文化革命小组以及他们起草的“二月提纲”的。以批判吴晗为契机掀起一个大的运动，最终达到打击被称为刘邓司令部的一大批人，这批人就当时的实力而言远远超过江青、康生、张春桥这些人，这就是毛泽东必须起用林彪并动员一些被个人崇拜鼓动起来的不明真相的群众起来造反的原因。

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这一着，是毛泽东走向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步很重要的举措，可以说是力量的重大部署。除这之外，姚文元在上海发难之后，北京的一部分极左派也立即起而响应。《红旗》杂志的关锋、戚本禹等人商量：“要干起来，我们一定支持姚文元”，“若有人攻姚，我们就出来反攻”。戚本禹还认为，“历史学界一定要来个大风暴，否则就搬不动这些人。看来，学术界也面临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形势”。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到极左的力量正在汇合。但也可以看出，戚本禹等人当时也并不知道批吴晗的真实意图，他以他的极左思潮的立场，认为史学界必须来一个大的风暴。史学界这股极左的思潮在1964年康生发动学术批判中曾经有过一次大检阅，在批判李秀成的“晚节不终”时戚本禹曾经是唱主角的，并因此暴得

大名。所以，他以为这又是要发动一场规模更大的学术批判运动，遂着手写成《为革命研究历史》一文，不点名地批判了吴晗、翦伯赞。这篇文章制造一种表象，即把吴晗、翦伯赞等一类的学术权威说成是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准备复辟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应该用革命的风暴来袭扫他所谓的旧历史观的轨迹。那么，谁来清洗历史研究的旧场地呢?在戚本禹看来自然是他本人和姚文元一类的人了。

戚本禹的文章是北京、上海极左力量汇合的一个标记。毛泽东看到之后很高兴，在12月21日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人的谈话中说了这么一段：“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如果说，1965年9月毛泽东向彭真提出要批判吴晗的含义还不够清楚，而三个月后的这个谈话就比较清楚了。毛泽东是要从吴晗的《海瑞罢官》找出一个足以震撼政界的重大政治问题来。这就是吴晗歌颂了“要骂娘的”彭德怀，公然替彭德怀鸣不平，而吴晗是有后台的，在吴晗的后边有一条“黑线”。这个发现开通了通向“文化大革命”顺理成章的道路。这次谈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向，就是亮明旗号，公开表明要为姚文元、戚本禹等左派人物撑腰。从此，南北极左力量合流，共同为正在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

当然，仅仅这样还是不行的，历来主张搞革命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的毛泽东，便把林彪抬出来，搞了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并用“军委名义”发下这个座谈会的纪要。

《二月提纲》认为批判吴晗应是学术性质

1966年2月3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会议。会上研究有关《海瑞罢官》讨论的问题，并由列席会议的许立群、姚溱整理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为《二月提纲》。这个提纲共分六个部分，核心问题是第一部分，即“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其中诸如方针、队伍、组织领导等等都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来表述。而第四部分特

吴晗（右）和郭沫若（左）等访问埃及

地谈到“左派要互相帮助”，这里指的“左派”当然是包括吴晗在内的。彭真在姚文发表之后，曾经说过，“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期都是左派”。因此，吴晗假若果然有些错误，也属于帮助的问题，而不属于打倒。当然，这里指的左派也包括自称左派的姚文元、戚本禹等人。

《二月提纲》明确提出，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并说“左派学术工作者”要“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这些话明显是对着姚文元一伙的，当然也包括北京的关锋、戚本禹等人，这是一个和当时极左思潮大相径庭的提纲。然而这个提纲却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制订的，并得到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认可的。

《二月提纲》于2月4日拟成，第二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二月提纲》，并于2月7日发给在武汉的毛泽东。2月8日，彭真、陆定一等人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制订《二月提纲》的过程及其内容。毛泽东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于是，彭真就在武汉草拟了中央对《二月提纲》的批语，2月12日批语传给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他们传阅后以中央名义向全党发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这个汇报提纲。应当说，这是一个由党中央直接参与制订的提纲，内容也是正确的，如果按中央的这个精神开展对《海瑞罢官》的讨论，学术批判就会走上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但是，这个提纲却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大相径庭，思想脉络完全扭着，毛泽东是不会同意这个提纲的，他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并不等于他同意，而是不愿意打草惊蛇，先稳住对方的阵脚，然后伺机发动反击。

毛泽东批评《二月提纲》

果然如此，彭真以为《二月提纲》是中常委同意的，这场争论就已经划了句号。在上引“大事记”的2月12日至14日作了这样记述：“彭真同志对上海市委的同志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要跟你们谈了。上海市委的同志提出：‘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等还需要研究。13日，彭真同志指定胡绳同志与张春桥同志谈话。胡绳同志说，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庐山会议……。”2月18日又记下这样几句：“他们继续包庇吴晗，不准讲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不准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他们对抗毛主席的保护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继续打击左派，把锋芒针对着左派。”

这两段记述，说明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不管用，彭真以为中央有了正式文件，问题就都解决了。并按照常规派人向发难的上海方面打招呼。他一面布置在北京往下传达、讨论，一面自己跑到三线去视察工作。同时，又让吴晗到昌平去搞四清，化名李明光。一切迹象都是以问题已经解决了为前提。

然而，在这段时间，江青正在着力炮制所谓《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并由毛泽东亲自借用了部队的力量介入这场讨论。随后不久，毛泽东就把注意力对准《二月提纲》，他在3月17日至20日的常委扩大会上专门谈了这场学术讨论的性质：“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

这个讲话不点名地批了《二月提纲》，点了吴晗、翦伯赞的名，说他们“反共”，是国民党。这样一来。批判吴晗就不是一场什么学术讨论，而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了。对于这个问题，在3月28日至30日还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毛主席提出，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军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

放小鬼！'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9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这是一个充满着火药味的讲话，也是一个完全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讲话。诸如解散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号召地方起来造反，对于党和国家来说，都是天大的事，没有经过中央集体讨论，就向全党发布这些主张，说明党的正常生活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的讲话是异乎寻常的，它的第一个信号，就是导致撤销《二月提纲》，并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开始了对彭真的批判。

"五·一六"通知
为批判吴晗定了性

性质问题的争论，除了向阳生、方求和戚本禹、关锋为代表的几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之外，有强大政治力量做后盾的，自然是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和以彭真为首制订的《二月提纲》。如前所述，此时毛泽东已由后台走到前台，亲自指挥这场争论，不但分别在3月中旬和下旬点名批评了《二月提纲》，而且对《二月提纲》和彭真采取了组织措施，并亲自号召群众起来造彭真、陆定一的反。由于毛泽东的出面，彭真、陆定一所代表的北京的实力派便不击自垮了。因为《二月提纲》是刘少奇在北京主持通过的，撤销《二月提纲》从形式上来讲，也得由中央会议正式通过。当时，刘少奇不在北京，毛泽东便指示康生，通知正在陕西视察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立即回京，电文称："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既然是毛泽东的意见，而且从形式到内容都已规定好了的，邓小平当然只有照办。于是，在4月9日到12日的书记处会议上作出两项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根据会议决定起草了只有一句话的通知，即："中央于2月12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通知》送到毛泽东处，他阅后很不满地说："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销，应当重新起草。"对此，后来叶永烈在访问陈伯达之后有过这样一段记述："毛泽东还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毛泽东的话否定了那部分'技术性的'《通知》。毛泽东找'理论家'陈伯达，要他另行起草《通知》。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领会毛泽东所说的《通知》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那是要我写一篇大文章呀！'陈伯达当过多年的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颇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5月号）

但是，要把《通知》起草成后来的《五一六通知》那个样子，就连陈伯达也没有领会清楚。所以，当他奉命起草好的《通知》呈送毛泽东时，毛仍认为太简单，不满意，并敦促专门成立一个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为组长，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由于康生的提议，除写《通知》之外，还要起草一个《大事记》，作为附件和《通知》一起下发。这样，自姚文元文章炮制开始到《通知》公布止，这段时间的路线斗争就比较明了。经毛泽东同意，由陈伯达起草《通知》，由康生起草《大事记》。

4月16日，彭真被迫在《北京日报》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同一天，毛泽东就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并宣布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随后就停止了彭真的工作。这些措施加速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步骤。5月14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说明这次所谓学术批判运动，已经不是什么"学术批判"了，而是涉及到整个北京市委，宣传文化领域，以及部队、地

方，总之党政军都涉及其中了。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等人策划的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一天关锋化名何明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一文，两篇文章公开号召人们起来批判揭露北京市委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通知》的第一部分是宣布“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个《通知》颠倒黑白地指责彭真的《二月提纲》反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当时除了毛泽东本人之外，谁也不会想到毛泽东正在准备发动一场后来这样规模的文化大革命。《通知》说《二月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这当然不是事实。当时康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还有列席会议的许立群、胡绳、姚溱、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王力都在场。就算康生当时没有表态，也还有其他11人在场，况且还经过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的。而且还由彭真、康生、陆定一、许立群四人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过，这怎能说是彭真背着许多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呢。

《通知》在反驳《二月提纲》中关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之后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

这段话基本上为这个所谓学术批判运动定了性质，也为批判吴晗定了性。即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共产党和反共势力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也就是说这场斗争不仅涉及面很广，性质也很严重，是一种敌我矛盾，而不是普通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矛盾和斗争。这个认识其实就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基调，也是后来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一种估计，当然也是后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采取极端手段的根本原因。

《通知》再次明确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事实上，批判“学术权威”不过是这次运动的一角，显然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这些人，包括吴晗在内，都不是主要当权人物，要推倒他们只要动用一下组织手段就行了。而“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却就不太好对付了：一是他们手中有权，二是人们难于认同，三是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谁是谁非不好区分。所以毛泽东就必须把问题提到如此惊人的高度，目的是为了动员那些不了解内情的人起来作动力，打击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通知》确实是文化大革命的总动员，运动的方针、对象、规模、目的、性质都有了一个轮廓。如果没有后来疯狂的人身迫害，吴晗看了《通知》之后，也许会有点自我解脱之感，因为运动的斗争锋芒几乎是对着所有的知识分子，还有各级党的领导干部，自己的那个《海瑞罢官》又能算得了什么呢？《通知》为整个运动定了性，也为吴晗定了性，历时几个月有关“吴晗问题”性质的讨论，也就告结束了。代之而来的是一场急风暴雨的破坏性很大的运动，而吴晗也就从被思想批判转而被肉体摧残和残酷迫害了。

（作者系《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洛　松）

“满洲共党要案”与楚图南

● 魏亦青

1930年初冬，东北大地的政治气候，随着寒流的袭来，一日比一日严峻。吉林省军阀政府对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实施镇压。首先在吉林第五中学开刀：10月23日先逮捕了该校教务主任谢雨天，半夜又在寓所抓了英语教师郑效洵；次日，大批军警包围该校，逮捕了学生方秀春、卞楚樵；第三天扣押了学生黄受天，继而校长萧汝纶也被株连。不几日，在长春逮捕了伊通中学教师郑健；在黑龙江逮捕了当时任哈尔滨女中教师的楚图南。11月5日《盛京时报》曾以夸耀的口吻，渲染这一大逮捕的“战果”说：“三日晨，张作相接省急电，破坏共产党机关七处，逮捕主要首领郑某等十余人，凡吉林大学、省立第一师范、第二师范、第五中学、女子师范、伊通中学皆为共产党人根据地。”

这就是当时震惊东北三省，引起关内外舆论关注的所谓“满洲共党要案”。

受李大钊指派 楚图南赴东北

1925年冬，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形势的发展，李大钊和北方党组织考虑到东北工作的需要，将在云南工作的楚图南调回北平，一见面，李大钊就开门见山地对楚图南说：“满洲很需要人，你赶快去，到那里找吴丽石同志接头。”

吴丽石真名吴苓生，是1923年由李大钊派往东北开辟工作的。吴丽石与前后到达哈尔滨的杜继增、任国桢等同志一起建立了中共哈尔滨特区支部，吴丽石任书记。

1926年初，楚图南到达哈尔滨不久，在李大钊关怀下，经杜继增介绍，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转为共产党，并出席了组建中共北满地委的哈尔滨特支扩大会。

从此，楚图南这位来自南国的青年，在党的安排下，以教书为掩护，开始了祖国北疆的革命活动。他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女中、育才中学、长春二师等校任教，并经常在吉林毓文中学、吉林一中、五中等校授课或讲演，组织读书会、学习会、文艺会，举行演剧或体育活动等，同当地青年学生进行广泛的联系。其间，还曾参加《哈尔滨日报》副刊《灿星》的编辑工作，直到《灿星》因宣传“赤化”而被迫停刊。

1927年春，为适应北伐形势的发展，根据李大钊在东北建立党的新机构的指示，在哈尔滨建立了中共最早的满洲省委，吴丽石为书记，杜继增负责组织，楚图南负责宣传，任国桢负责哈尔滨市的工作。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

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北方党组织遭到破坏。楚图南等千方百计地把不适于在关内继续工作的李扶人、王复生、郑效洵、尚钺等，安排在东北各地中学任教，埋下了又一批革命的种子。

吉林学潮迭起
军阀政府惊恐不已

东北的学生运动，以吉林省最为活跃，其中的长春第二师范，是特别值得一提的。

楚图南在吉林省活动的公开身份是教员，他曾在长春二师工作，在这里结识了该校校长谢雨天。

谢雨天，吉林省舒兰县人，比楚大四岁，很有学识，且思想进步富正义感。早在其留学日本期间，即在著名反日爱国民主战士王希天的影响下，参加了“留日华工劳动同胞共济会”，为在日华工服务。1926年参加“东三省留日学生归国讨张（作霖）排日（本）团”，在天津和北平组织了持续两个月的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运动，成为当时北方反日爱国斗争的风云人物。

楚、谢二人一见如故，情投意合。楚图南又通过谢雨天结识了许多在东北颇有影响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如赵雨琴、何霭人、胡体乾、张乃仁等，这对楚在东北从事秘密工作十分有利。谢雨天对楚图南非常敬佩，不仅聘请他在二师任教，而且受他的推荐，把《狂飚》社的重要成员郑效洵介绍给吉林省立五中校长萧汝纶，安排了工作。谢雨天对楚图南之信赖，正如后来楚图南说的：“他大约也感觉到我的不公开身份，不过彼此心照不宣，不闻不问而已。”

二师的学运日益活跃：

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要修吉（林）会（宁）铁路，把吉（林）敦（化）铁路延长到朝鲜的会宁，为变东北为日本殖民地作战略准备。二师作为发起学校之一，发动长春学生二千余众，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反对强行修筑吉会铁路！”“打倒帝国主义！”“揪出卖国贼！”

同年，二师学生为揭露日本鼓励“东北自治”实则割据东北的阴谋，组织集会，发表演讲，力主南北统一。一些学生还化装成老百姓，晚上偷偷到街上去插“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后被警察发现，跟踪至二师门前，双方冲突起来，校长谢雨天挺身而出，保护学生，指斥警察无理。在广大学生一片驱赶声中，警察灰溜溜撤走。

在楚图南等地下党员积极活动下，马克思主义思想在长春二师有了广泛传播，革命的文艺活动蓬勃兴起。他们出版校刊《秋声》，成立秋声书店，组建学术研究团体秋声社和学生组织校友会。校刊《秋声》鼓吹民族自强，引导学生追求真理，公开称赞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誉列宁为先哲。楚图南给学生讲课，痛斥当时的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秋声书店与上海进步书店联系，赊购进步的文学作品和社会科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大纲》，创造社的刊物，鲁迅、郭沫若、高尔基的文学作品，在学生中广为流传。校友会的成立，更使学生紧密团结，行动一致。校长谢雨天热情支持校友会的活动，还特请楚图南代拟校友歌。楚图南欣然命笔，写下了如下的激昂文字：“前进的手紧相携，酬偿了历史的负累，将新生与自由付与新的人类，这责任要我们担负，新世界，大自由，全握在创造的我们的手里。”这一首后来被吉林军阀政府定为楚图南、谢雨天罪状之一的歌，当年曾响彻二师，响彻长春，激励过多少热血青年。

二师的学生骨干中有郑健、盛宝昌、黄受天、于克、傅昆元等等。曾为中共党员、参加过广州起义的郑健，是1928年5月揭阳战斗负伤后，潜回吉林在二师就读的。他积极参与进步学生活动，行动激进，在同学中教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工人歌等，甚至帮助初中班同学办的小报，取名便是楚图南办过的被军阀政府查封了的《灿星》。

1928年底，东北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党的主要负责人吴丽石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随后楚图南亦调往山东。由于党组织的遭受破坏，直接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宣传，但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统治、争取民主自由为口号的学生运动，从未停止过。抵制日货、反对增加“四书五经”课

程、反对撤换二师进步校长谢雨天等游行示威和请愿活动，一个接着一个。特别是由于伊通县教育局长杨培阁迫害伊通中学进步教师郑健、盛宝昌引发的所谓“特大学潮”，触动了官方、军方和警方。抓闹事学生怕引起众怒，便恶毒地捏造了“共党策划夺枪暴动”的罪名，从吉林五中下手，实施对所谓“满洲共党要案”原定案犯数十人的大搜捕。

罪名“莫须有”
楚图南等狱中抗争

吉林等地的大学潮所以连续发生，究其原因，“东北的青年学生是很热情爱国的，间或也许受到当时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更因为东北军阀政府对进步学生的压制”。这段话是事过五十余年后楚图南对这些事件的正确评说。

事件发生时，楚图南不在伊通，而是在哈尔滨第一女子中学任教。楚自 1928 年底调往山东后，先后在泰安、曲阜、济南等地以教师职业作掩护，从事革命工作。1930 年 5 月，因在学生中作《五四运动、十月革命对我们的影响》、《在中国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割据的任务》等演讲，楚又被山东省反动当局指控、通缉，被迫逃出山东，重返东北。

楚图南原本早已列入东北军阀政府的黑名单，伊通中学、吉林五中学潮后，从被捕的谢雨天、郑效洵等处又搜查到楚图南的一些信件，并得知其下落，于是在哈尔滨第一女子中学将楚逮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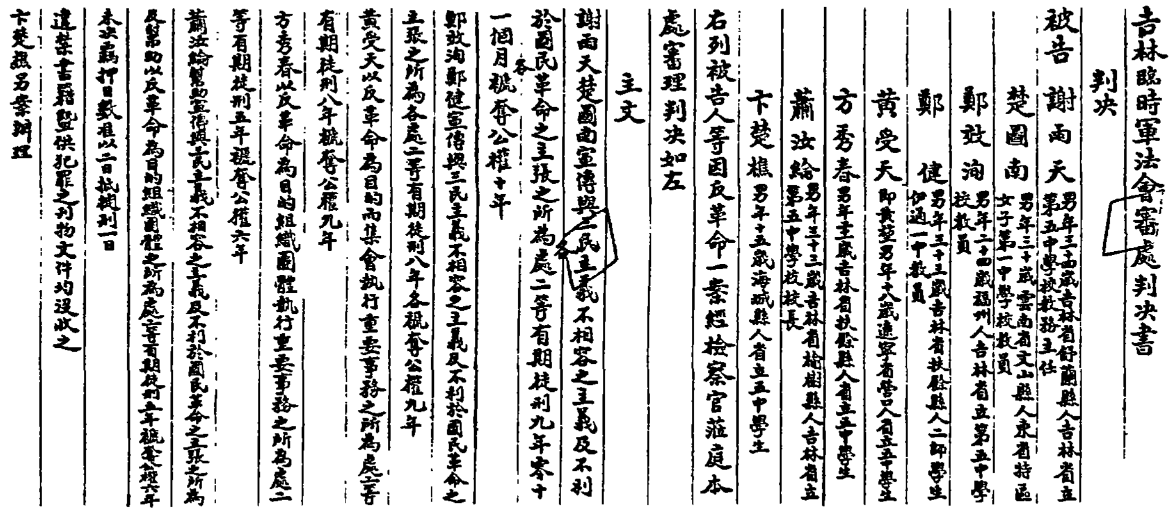
吉林省的报纸，对接连的逮捕，作了连续报道，于是群情激愤，舆论哗然。联名申请保释被捕师生者，不仅有吉林市大、中、小学校长，教育馆、图书馆的负责人，还有吉林社会团体，如农会、工会、商会、教育会。军阀政府迫于社会压力，才不敢再逮捕更多的人。

社会的声援，配合了狱中的斗争。

黄受天是中学生，并非共产党员。审讯时他就大声叫喊：“你们为什么抓学生？说我受共产党支使有什么凭据？我要是共产党，你们立刻拉出去枪毙！”

郑健是教师，且有他写的鼓吹阶级斗争的杂志、信件、诗歌在敌人手里，他回避不了“信仰”问题，但他一口咬定“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无宣传共产主义情事”。至于他曾参加共产党、参加广州起义的事，自然守口如瓶。

楚图南公开身份是教师，是著名的文化人，


吉林臨時軍法會審處判決書
判決
被告 謝雨天 男年三十四歲吉林省舒蘭縣人吉林省立第五中學校教務主任
楚圖南 男年三十歲雲南省文山縣人東省特區女子第一中學校教員
鄭效洵 男年二十四歲福州人吉林省立第五中學校教員
鄭　健 男年三十三歲吉林省扶餘縣人二師學生伊通一中教員
黄受天 即黄瑩 男年十八歲遼寧省營口人省立五中學生
方秀春 男年十七歲吉林省扶餘縣人省立五中學生
蕭汝綸 男年三十三歲吉林省樺樹縣人吉林省立第五中學校校長
卞楚樵 男年十五歲海城縣人省立五中學生
右列被告人等因反革命一案經檢察官蒞庭本
處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謝雨天楚圖南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及不利
於國民革命之主張之所為各處二等有期徒刑九年零十
一個月褫奪公權十年
鄭效洵鄭健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及不利於國民革命之
主張之所為各處二等有期徒刑八年各褫奪公權九年
黄受天以反革命為目的而集會執行重要事務之所為處二等
有期徒刑八年褫奪公權九年
方秀春以反革命為目的組織團體執行重要事務之所為處二
等有期徒刑五年褫奪公權六年
蕭汝綸幫助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及不利於國民革命之主張之所為
及幫助以反革命為目的組織團體之所為處三等有期徒刑三年褫奪公權六年
未決羈押日數准以二日抵徒刑一日
違禁書籍暨供犯罪之用物文件均沒收之
卞楚樵另案辦理

不了解旧社会，不懂得什么是政治迫害的人，不妨读一读这份来自敌伪档案的判决书。教师，“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以及宣传当局所认为的“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即以“反革命”治罪；学生，或组织社团，或举行集会，一旦被诬指为“以反革命为目的”，同样被打人“反革命”之列。真个应验了古人的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在军阀政府眼里则是满洲共党的重要人物。其行动、言论，虽诸多已被记录在案，但并未有共产党的真凭实据。此种情况下的楚图南，审时度势与反动当局巧作周旋。1930 年 11 月 10 日夜，他所写的《供状》表现了他的大智若愚。《供状》开始，他即剖白自己："窃南服务教育，七八年于兹。随时随地，俱以贯穿金石之血诚，含着热血热泪的至爱，扶导青年，修持自己。故其表现于思想行动方面，则为忠挚的研究学术，寻求真理的态度；热烈的迫切的对于艺术之爱好。此可检视南之信函及已刊出未刊出之诗歌文稿而知也。"在他不得不对自己诸多著述中诅咒旧社会、呼唤青年觉醒的激烈言辞作解释时，他机敏地推脱说："虽有时含痛含哀，言多悲沉；有时意气蓬勃，言多快意；以此间有不谨之言，出之口头，流于笔端，致社会上，友朋间，疑忌丛生，误会叠出。"写至此，他又为了党的利益断然申明："然实与任何团体、任何组织、任何党派，了无关系。南虽不敏，敢以生命作保证，天寒风紧，冰雪盟心，临池神凄，供状是实。"

反动当局没有获得"共党活动"的任何口供，没有抓到"共党活动"的任何证据，轰动东北的"满洲共党要案"中竟没有查实一个共产党员，又迫于社会对被捕师生的声援，最终才按所谓《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的罪名，由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判处：楚图南、谢雨天有期徒刑 9 年零 11 个月，郑效洵、郑健、黄受天有期徒刑 8 年，萧汝纶、方秀春有期徒刑 5 年，卞楚樵只是"言语激烈极带危险性"，又年仅 15 岁，判令家长监管，具保释放。

楚图南等七人在吉林省第一"模范"监狱服刑，同普通犯人关在一起，一个监房六、七人。监房年久失修，四壁和天棚都有透风处。数九寒天，按监狱规定每天取暖的四捆木柈，又常被狱吏狱卒克扣，冻饿而死的患病犯人屡见不鲜。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生活下去，坚持斗争，成为楚图南等考虑的首要问题：狱内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狱外发动声援和营救。

狱规很严，不准他们几个同案人说话，但他们始终在秘密地互通消息。最初，只要有机会相遇，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可以传达许多不同的丰富的内容。到后来，由于他们善于做周围人的工作，不论是狱卒还是狱吏，也不论是"新收"（刚入监犯人）还是"炕头"（久蹲监狱的犯人头儿），可以利用者利用，可以争取者争取。有一个被判十多年 徒刑的老犯人，通医道，在医务所服务。他与各级狱吏很熟，可随便出入监狱办公室。萧汝纶便以同为榆林人的乡情接近他，感化他，通过他打通关节，以获得狱中生活的诸多便利。

狱外的声援、营救也从未停止过。社会舆论，街谈巷议，对关押思想犯、设置文字狱的谴责不绝于耳。有些进步的上层人士也出面说项。如留日出身、颇有爱国思想的吉林省商会会长张洁涛（后被日本占领军杀害）与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相识，他多次劝说熙洽从吉林地方利益出发，珍惜人才，对被捕师生予以宽宥。

由于社会各界多方面的声援和营救，使萧汝纶、方秀春得以取保释放；对仍在狱中的楚图南、谢雨天等，看管也渐渐放宽。大约在 1931 年 5 月，楚图南等同案犯数人被准予搬进同一牢房。"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又趁狱吏人心惶惶管理混乱之机，以更强硬的态度争取搬进了"优待号"。

这不足三间房大的所谓"优待号"牢房，靠近医务室和病号室，与一般牢房相隔二百多米。为了健康地生活下去，为了充实自己服务于将来，他们在这里过起极为有规律的生活。清晨早起锻炼身体，早饭后，以参加医务室的服务为名，在同情进步师生的姓王的医务所所长关照下，开始读书和学习。伪满报纸不能满足他们获得外界消息的需要，谢雨天便订购了日文的《大阪新闻》和《改造》杂志；一个北大毕业的姓杨的犯人，家庭很富有，出于同情，还为他们通过丸善书店代订了伦敦出版的《泰晤士报》。

在郑效洵、谢雨天被具保释放后，楚图南每日除按时教黄受天英文，同郑健一起阅读英文版的社会科学著作外，更多的时间是将难友

们吸的一种“黄狮子”牌劣质烟的纸盒，拆开压平用来从事写作和翻译英文本的外国名著。在这里，他写下了反映自己思想情感的力作——中篇小说《钟馗和他的妹妹》(收入《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小说集)；翻译了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看哪这人》并写了译序。他交代译书的背景说：“我是扪着铁的严肃，在死的战栗，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译下了这东西。”“查拉斯图拉总算是有机会出版了，这令我有着将被折断了的一支钢箭，终于又投射出来了的那样欢喜。”(1931 年 5 月)监狱的围墙、铁丝网，隔断不了楚图南等与外界的联系。他们为日寇的暴行而愤懑，为伪满奴才们的丑闻而羞愧，为抗日军民的反抗而振奋，并把这种种感受，或公开或隐蔽地传递给狱友，传递给那些暴露了身份被判了重刑的共产党员同志们。

1934 年 3 月 1 日，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新京举行“登极”大典，并发表《恩赦诏书》。被关在监狱中的楚图南、郑健、黄受天等，无日不在咒骂日本侵略者，诅咒溥仪这个日本卵翼之下的傀儡。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的戏剧性的一幕拉开了：6 月里的一个星期天，楚图南等被带到法庭，一个姓李的法官，堂而皇之地向他们一一宣布了特赦状。大意说：军政部大臣呈请国务总理大臣，上奏皇上裁可，特赦反旧政权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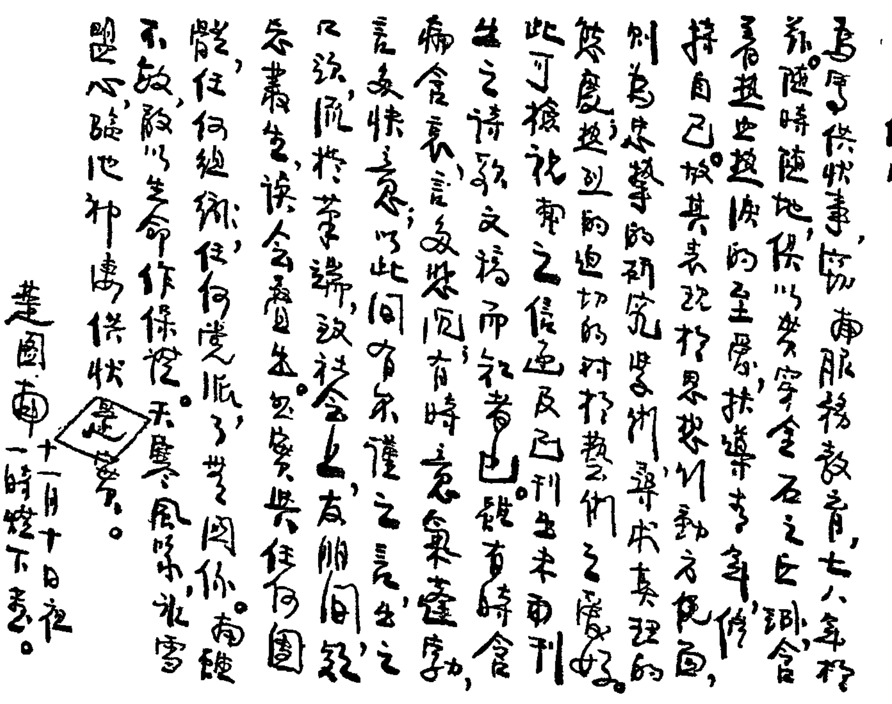
就这样，楚图南等终于被特赦了。

出狱后的楚图南，惟恐发生意外变故，第二天便在老朋友何霭人的帮助下，匆匆踏上了开往北平的火车。

难忘的黑土地 难忘的难友

楚图南匆忙离开东北返回关内，仍以教育和文化工作为掩护，在“与党组织的直接联系一度中断”的特殊情况下，凭着“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党为人民工作。他曾在河南开封北仓女中和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在云南从事抗日民主运动；全国解放后，长期负责对外文化交流，开展人民外交活动；“文革”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

他无论走到哪里，也无论在担任什么职务的时候，从没有忘记过东北的黑土地，说自己


供状

楚图南 十一月十日夜一时灯下书

这是楚图南 1930 年 11 月被捕后写下的《供状》。细读全文，让我们看到的是楚图南的大智若愚：他在共产党员身份没有暴露的情况下，韬光养晦，巧妙地为自己的言行辩解，遮敌耳目；又斩钉截铁，坚称自己的作为与他人无干，从而保护同志，保护组织。

有“对于白山黑水的几乎如同第二故乡一样的难忘的留恋”，说自己“生命的脚踵上还残留着八虎力河一带的泥垢风沙和灰土”（1947 年）。他也不忘东北共过患难的朋友，1986 年 6 月 27 日，87 岁高龄的楚图南在回忆起早年东北的活动时，深情地说：“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初，我在东北各地的活动，党在文化教育界，在青年学生中的部分工作，是得到过谢雨天等这样一些开明进步朋友的协助和掩护的。因此他们也受到各种苦难和折磨，并和我们一起被关进监狱，一起被判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间或有过曲折，甚至错误和缺点，但是在解放后，他们有的出于自觉，有的则得到党和政府以及进步朋友的帮助，都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但是他们当年和我们一起工作、斗争、患难与共的经历却鲜为人知。由于‘左’的错误的影响，他们当中一些同志和朋友还受到过误解，经历过得不到公正对待的时期。”“当年的进步学生中，有一些后来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后在东北各地担任负责工作，这是应该为他们庆幸和高兴的。但是对于那些在白色恐怖下和我们共过患难，但也有缺点、错误的朋友，更需要有人去理解他们，关心他们，

1934 年楚图南出狱后留影

帮助他们。”这几段话，不仅反映了年高德劭的楚老的念旧之情，更寄寓了这位正直的老一辈共产党人对于人们公正地看待历史、诚实地对待朋友的希冀。（责任编辑　方　实）

名人与自勉联

● 解玉泉

古今中外名人多有自勉联，用以自戒自励。

周恩来青年时代撰写过一首自勉联：“与有肝胆的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周恩来一直以此作为为人处世的准则。

著名诗人臧克家最喜欢郑板桥一副对联，他把它作自勉联，放在案头上：“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这是写为文作诗应有的负责态度。

著名史学家范文澜的自勉联，常常成为学术界的佳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后句是讲要联系实际，前句是讲搞学术研究要耐得寂寞，埋头苦干十年无人问也无所谓。

我国古代许多名人的自勉联也很精辟。禁烟名臣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时，善听不同意见，廉洁奉公，刚正不阿。他为自己拟了一副自勉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短短 16 个字，反映了林则徐的高风亮节和胸怀宽阔。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写过一副自勉联：“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该联阐明的读书和创业的各自意义不难理解，但要真正做到就必须终生不懈了。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五回写了一副对联，后人分析就是他的自勉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人事关系极为复杂的封建社会里，一个人只有注重人缘，办事才能左右逢源，否则就会吃尽苦头。曹公深知此理。

不仅我国古今革命家、文学家有自勉联，而且许多科学家、理论家、音乐家、舞蹈家等等也有自勉联。我们搜集这些自勉联，学习这些自勉联，对于我们为人、治学、创业一定会大有裨益。

我三次见到叶挺军长

● 邹健东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将军统率新组建的新四军驰骋扬子江两岸。1938年春，在长江南岸的新四军各支队奉命集结于皖南的岩寺。此时，我在彭冲领导的二支队的宣传队工作。不久，该队调到军部的战地服务团。在军部我曾三次见到叶挺军长。

一

我第一次见到叶军长是在安徽太平县野外，朱克靖团长陪同军长来到战地服务团与全体同志见面。朱团长简要介绍了军长的光荣历史：闻名中外的北伐名将。同志们刚刚听到这句话，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是广东人，是叶挺将军的老乡。我在少年时期，家乡的老百姓，谈起叶挺将军无不激起崇敬和骄傲的心情。

夏天，叶军长身着便装，肩上挂着莱卡相机。他向坐在草地上的服务团员说：服务团的同志都是有文化的学生，为抗日从四面八方来到新四军，我欢迎你们，你们在部队会起重大作用。你们也要向指战员学习，在作战中锻炼，你们的素质好、有文化、有理想、有朝气，在新四军可以锻炼成优秀的军政干部。国难中出人才。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们受到

叶挺军长既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又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他在戎马倥偬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图片。

左图为叶挺在1939年春拍摄的周恩来为新四军干部作报告的照片

军长的厚望和鼓励，以热烈的掌声表达对军长的敬意。军长讲话结束，一位女同志用军长的手杖指挥大家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其它抗战歌曲。高昂的歌声从小山上飘向太平县的天空。军长举起莱卡相机，拍下了团员们唱歌时的激情场面。

二

1939 年春，叶挺和周恩来从大后方重庆来到军部，在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的欢迎大会上，周恩来作国内外形势报告后，叶挺讲话说：我在革命征途中碰到不顺心的事和困难，离开了革命队伍，掉队了，没有和同志们一起前进。作为革命军人这是痛心的。但是近十年来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事。希望同志们在革命道路上遇到任何困难都要坚持下去。像爬山一样，不要在半山腰时折回来，要有坚持爬到山顶的勇气。军长讲话不长，都是坦诚之言，极其感人。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潮中，历史是非难于被人认识。叶挺作自我批评的背景，是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

1927 年 12 月 11 日凌晨广州起义，叶挺是总指挥，起义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领导起义的成员开紧急会议，研究面临的紧迫形势。叶挺认为敌人的援兵很快要包围攻打广州，敌人的兵力占绝对优势，对我们极为不利，要立即撤出广州，保存革命力量。起义部队撤退到海陆丰与当地红二十军汇合后，根据情况发展，再作新的行动。只有在战场上指挥部队打过仗的叶剑英等几个人同意叶挺的意见。多数同志认为，起义胜利了，但未考虑到面临的险恶形势。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不主张撤退，蛮横批评叶挺动摇，认为起义只能坚持和进攻。会上未能作出撤离广州的决议。敌人的援兵来得极其迅速，包围了起义军。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起义军英勇反击，战斗非常激烈，伤亡极大。一部分部队撤出广州，来不及撤出的全部壮烈牺牲。起义失败后，1928 年 1 月，广东省委在香港开会，李立三独断专行，实行惩办主义，对九位起义领导人进行组织处分，认为叶挺表现消极，给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叶挺不服，坚持自已的意见，认为在当时情况下，率领起义军从广州撤出是正确的。

叶挺所摄新四军军部的防空哨兵

1928 年 6 月，中共在莫斯科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叶挺应邀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与李立三的观点一致，认为广州起义总指挥叶挺“消极怠工、严重失职”，对叶挺极其冷淡，叶挺没有能够参加大会，无法对广州起义的情况进行说明和申辩。叶挺难于吞下这股冤气，在那时有国难投、有家难归的困境中，愤然离开莫斯科，去了德国。他认为那里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国土，是考察、学习、总结经验和研究军事很有利的地方。就这样，他在国外飘泊了将近十年。

三

我第三次见到叶挺军长是最难忘的一次。1939 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八点钟，军长来到我所在的军部摄影室。此时

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油然感到光荣和机会难得。他穿着随便，衬衣是浅黄色的，脚穿广东人喜欢的凉鞋，身材高大，脸神威严中显露和蔼，谈话节奏平缓，他说的是含有客家口音的普通话。

军长喜欢摄影，有标准镜头，在 30 年代这是高级的相机了。这次话题，谈的多是关于冲胶卷等问题。他说冲 135 胶卷必须用柯达 D76 配方，水温、冲片的时间都按它的标准，这样银粒细，放大的效果好。他还问了摄影室有没有显影罐。他说，不能用“72”配方，因为冲出来的银粒太粗。当时我悟到摄影室冲出来的胶卷他有不满意之处，他以教育代批评。他又谈了要多拍部队指战员的生活和作战情况、军民关系的照片，重要的合影、人像也要拍。照片是重要的历史资料，还要利用各种关系和办法，送到大后方各种报纸刊物发表。进步报刊是很喜欢报道在敌人后方作战的新四军的，因为部队在京、沪、杭和杨子江两岸地区很重要，军长对照片的作用理解深远。

在抗战期间，叶挺拍摄了许多部队平时训练、学习文化、医务人员工作、人民群众支援新四军及长江两岸风光和民情风俗的照片。军长拍摄的画面中凝聚着他的爱和恨、热血和烈火，反映了名将的情怀。从军长的下面三幅作品我们就可以得到深深的感受。

有一幅照片，屋顶没有片瓦，残墙上的一条标语是：“宁作沙场鬼勿做亡国奴”。被轰炸后极其醒目的这条标语和军长的感情紧紧地连在一起了。誓死抗日杀敌是军长和新四军的决心，也是中国人民的决心。他的镜头的光芒闪烁着军民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和伟大的时代精神。画面中反映的被轰炸后的村庄，令人触目惊心，激发了人民心里杀敌的怒火。现在看到这幅照片，仍使人心潮澎湃。

《防空哨兵》，拍摄的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的云岭罗里村的小山上，战士们用松树繁茂的枝叶搭起的小棚，挂着一座大钟，钟槌垂挂在旁边，青年战士雄纠纠地面对大钟，担负着军部防空安全的重任。1939 年 7 月的一天，日寇的飞机来轰炸驻在罗里村的军部，防空哨兵灵敏地听到远空飞机传来嗡嗡的声音，他急忙敲响钟声。正在工作的同志和人民群众迅速离开村庄，跑到山上隐蔽，军民无一伤亡。

军长拍摄的周恩来同志穿着灰布棉军衣，站在一张粗木板做的长形小桌旁，桌上放着日记本、资料和茶杯。这是 1939 年 3 月 10 日在陈家祠堂，也是当时的军部礼堂，向军直属队排以上干部作目前形势与新四军任务的政治报告。在这次报告中，周恩来提出了“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向南巩固”的战略方针，使全军指战员明确了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的目标。

叶挺将军的摄影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英勇战斗的伟大精神，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和高尚的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　赵友慈）

叶挺摄下的被日寇飞机轰炸的断墙残壁

1949年5月27日，我军解放上海。蒋介石逃到台湾，美国政府决定中止美蒋条约，不再援助。蒋介石为寻找政治出路，重新挽回美援，决定轰炸上海……作者根据当年上海防空军参谋长蒋天然的口述记录了此篇。

1950年：上海拉响空袭警报

●会军　汪洋

1950年的上海，虽然早已解放，但东南沿海岛屿尚有蒋介石三十万军队。

蒋介石在舟山设立空军前线司令部，在2月4日刚抢修完成的舟山机场集结了P—51战斗轰炸机48架，B—25轻轰炸机5架，P—38侦察机4架，还有从台北飞来参战的、二战最先进的B—24重型轰炸机4架。

从1950年2月6日开始的，敌机轰炸上海日夜不停，每天投弹60—80吨，一个月就达一千多吨至两千多吨。

吼叫的机群撕裂天空，呼啸的炸弹密如黑雨，一层层落下。

陈毅说："我们解放了上海，只解放了领土，还未解放领空，上海只能算是解放一半。"

我当时任中央军委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主任，属第三野战军建制，受军委周恩来副主席、陈毅、粟裕的双重领导。航空接管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接收国民党遗留的机场、航空设备，收容旧航空人员，同时组织修复航空工厂，尽早开工，加强机场管理，加速航空队伍建设。同时我还担任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长、华东军区空军航空处长。

1950年2月，蒋机轰炸上海。

没有掌握制空权的大上海，要想生存下去是不可能的。因此，快速完成上海防空基地的建设，创建一支防空军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为保卫大上海，火速组建我军第一支现代化领空作战部队——上海防空军，正兵团编制，直属中央军委建制。当时由周恩来同志分工主管。

2月，上海防空军组建完毕，陈毅兼任上海防空军司令员，我任参谋长。

同时又决定：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粟裕到上海，协助陈毅保卫大上海，进行上海防空战争。

上海成立了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委员为九兵团司令、上海警备司令宋时轮、七兵团司令王建安、华东海军司令张爱萍等，社会各界人士也参加了委员会。

委员会组织、动员全体军民保卫大上海，团结一致，实施战时法令、戒严封锁法规，组织民间各种防空支援队，街道成立了人民防空指挥组，实施人民防空的战略战术。

为了夺取上海领空权，必须防空保护大动脉京沪铁路。因此必须消灭敌舟山空军基地，解放舟山沿海岛屿。而上海防空基地遍及了几个省，抢修防空基地，又时间紧迫。因此必须以一个月来完成一年半的工作量。

这是十万火急，体系庞大的军事工程，所需人力、物力、财力、设备、运输量都是惊人的。

现代防空基地，都是长度3000米的钢筋水泥跑道，设置夜航设备，均为一级机场。

喷气式歼击机、轰炸机日夜都可使用。它是一门科学的综合配套工程。每一机场必须是铁路、公路、水、电、营房、生活供应、后勤保障、油库、机库、指挥系统等全套工程同时建成，方可使用。

周副主席亲自组织，调拨东北、华北、中南地区大批物资。

1950 年 2 月，天寒地冻，数十万上海军民揭开了建设的序幕。仅一个多月，建成了 5 个防空基地。江湾、大场、虹桥、龙华、大校场、九里山、笕桥、青岛八个一级机场，还有十个机场正在施工。徐州铁路中心站也建成，成为南下防空武器装备及战争物资运转中心。

在保卫大上海中，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援助。1950 年斯大林派出支援上海的防空部队三千多人，由参加过莫斯科保卫战、空战经验丰富的莫斯科防空司令巴吉斯基上将率领，同时抵达的还有参谋长尹尔托夫将军、军长契留沙洛夫中将和三个师长。

巴吉斯基说：我奉斯大林命令来给陈司令当助手，支援上海防空，负责训练新中国上海防空部队，一切服从陈司令员指挥。

陈老总说："按照中国话来说，我们是一切俱备，就欠东风。师傅带徒弟，协同作战。"

在教育方法上，师傅教徒弟，一个教一个，采用战斗中训练，训练中战斗，战争中学会战争，培养新生的上海防空部队。

当时教官也从苏联赶到上海，米格—15 飞机也有了，这种飞机最高时速 1050 公里，最大飞行高度 1.5 万米，机上装有 37 毫米机关炮一门，23 毫米机关炮二门，战斗力很强。但是没有教练机，苏联教官一愁莫展。

"直上米格—15！"中国飞行员一飞惊人，成功了！连骄傲的苏联人也刮目相看。

空军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成立。这是新中国年轻空军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

上海防空以莫斯科防空为样板。由于上海濒临大海，敌人以舟山为基地，作战区域小，因此制定出因地制宜，金蝉脱壳的战术，采用了空中埋伏、低空迂回、两面夹击、诱敌就范的战术，大量击落敌机，地面镇压敌特，争取主动权。

1950 年 5 月下旬，陆海空协同作战，解放舟山群岛，标志着上海防空战的全面胜利。

5 月底，在金门饭店召开庆祝大会，潘汉年副市长、宋时轮司令等各界人士数百人出席。我代表陈司令员作总结报告：上海防空战历时 4 个月。我军飞机出动 370 批次，大约一万六千架次，共击落敌机 29 架，我歼击机损失一架，伤一架，轰炸机损失一架。

上海防空戒严令从 6 月 1 日起解除。

经过战争锻炼成长起来的上海防空军，掌握了基本作战技能，打击了美蒋空军，挫败了其阴谋，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没过多久，他们又雄纠纠飞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再一次创造中外空军史上的奇迹，再创辉煌。

（责任编辑　仲　文）

1950 年任上海防空军参谋长的蒋天然离休之后

毛泽东书赠傅斯年的是《焚书坑》

● 王戎笙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与褚辅成、冷遹、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六位国民参政员从重庆飞延安，与中国共产党商谈国共团结，共建国内和平问题。由于毛泽东与傅斯年早年在北大相识，所以毛泽东特地安排一个晚上和傅斯年单独交谈。傅斯年离开延安时，毛泽东还曾亲书条幅相赠。

关于这段佳话，最近几年不少文章提到。比如岳玉玺写的《国民参政会期间的两件事》(载《傅斯年》一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第167页)中说："握别之际，毛泽东将亲笔墨迹一帧面赠傅斯年，那上面的题词是北宋诗人钱惟演的两句诗：'不将寸土分君子，刘项原来是匹夫。'"傅哲清、傅强合写的《傅斯年与毛泽东》(载《炎黄春秋》，1995年10月号，第68页)中说"7月5日，毛泽东驱车到机场送行，握别之际，交给傅斯年一件亲手所书条幅。傅斯年等登机后展看，原来上面所写的是北宋诗人钱惟演的两句诗：'不将寸土分君子，刘项原来是匹夫。'"我在《论傅斯年》一文中也说："毛泽东书写了两句古诗在机场握别时面赠傅斯年。"(载《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第16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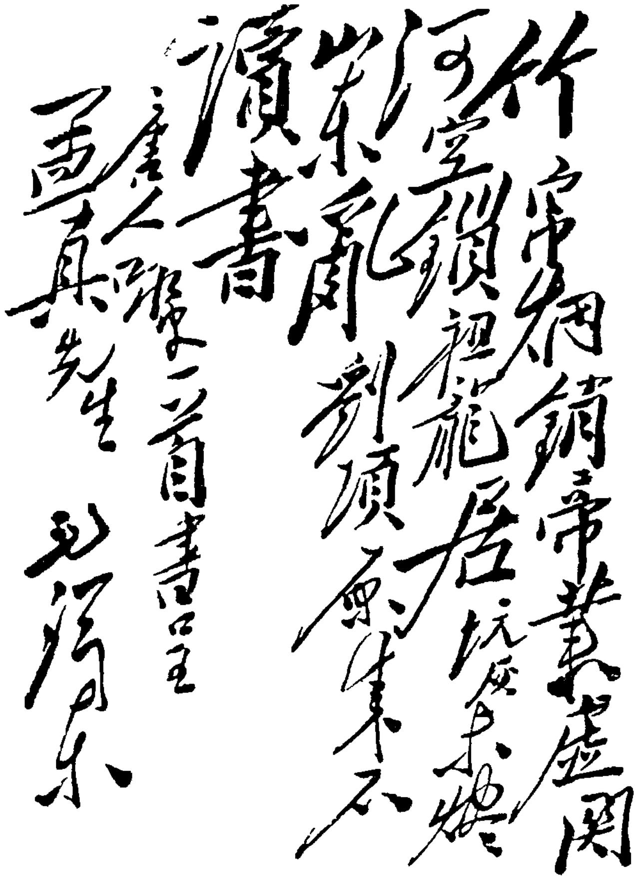
其实，这些记述，不仅语焉不详，且有许多地方弄错了。

1996年，台北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影印出版了王汎森、杜正胜主编的《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其中公布了1945年傅斯年访问延安时保存下来的毛泽东所书条幅、亲笔信和信封，毛泽东宴请时的请柬和照片，交际处安排的访问活动日程表，还有傅斯年访问延安时的笔记。

这些由傅斯年当年带回重庆，后带到南京，1948年又带到台湾，如今保存在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的珍贵文物，纠正了我们过去记述中的几个明显的错误：

第一、从信封上看，不是在机场握别时亲手交傅斯年的，而是由王世英同志转交的。有毛主席亲笔所书信封为证。从傅斯年保存的交际处拟订的傅斯年"逐日会见者名单"看，王世英同志是当时交际处接待工作人员之一。信封上写着：

早上　送交际处
　王世英同志交
　傅孟真先生
　　　　毛缄



第二、条幅的内容不是传闻中的北宋诗人钱惟演的两句诗，而是晚唐诗人章碣的一首《焚书坑》：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第三、从毛泽东给傅斯年的亲笔信看，毛泽东与傅斯年的单独会见应该是在7月5日凌晨，交谈时谈到了陈胜、吴广、项羽、刘邦，条幅是应傅斯年的要求写的，毛泽东以章碣的诗作为交谈的延续，所谓“述唐人语以广之”。原信如下：

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

敬颂
旅安

毛泽东上
七月五日

以讹传讹的原因也很清楚，当时毛泽东写好后便派人送交际处，由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而且是限时送到的急件。可以想见，有机会看到原件的人一定很少，即使有机会看过一遍，也只能保留一个模糊的记忆——一首吟咏秦末刘、项、陈、吴的古诗。于是把晚唐诗人章碣的一首七绝《焚书坑》，错成北宋诗人钱惟演的两句诗。吟咏的虽然同是秦末的人和事，但诗的意境却大不相同。如果不是傅斯年先生精心珍藏，毛泽东的手迹得以重见天日，以讹传讹将会继续下去，无法得到更正。弄清历史真相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洛　松）

莫再把彭述之照片错当陈独秀

● 唐宝林

本文这张双人照，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彭述之（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但是，谁是陈独秀，谁是彭述之？几十年来被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少人搞错。以讹传讹，直至今日。

1982年2月，中国学术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载有四百余幅珍贵历史照片的大型精装本著作《斯诺眼中的中国》第68页，把右边半张照片单独列出，说其是“陈独秀”。我当时正收集有关陈独秀的资料，一对照，发现错了，这是彭述之，左边的才是陈独秀。此错事出有因，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陈独秀因主编《热潮》杂志，发表猛烈抨击日本侵华及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的文章、宣言和传单，在1932年10月15日，与彭述之等人一起，被国民党政府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及“危害民国”的罪名，在上海被逮捕。接着被押解到南京，暂押在江宁地方法院候审室。此事轰动全国，国民党报纸以“悬偿万金缉拿”的“共党首领陈独秀被捕获”，大肆宣传（其实，早在1929年11月，陈独秀因与托派相结合而被开除党籍，1931年5月当选为托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书记处书记）。10月30日，天津《大公报》第四版上，就登出了这张双人照片，旁边用明白的文字写道：

“共党陈独秀彭述之解送江宁地方法院，在候审室摄影。左为陈独秀，右为彭述之。时陈彭态度，均颇从容，二人皆着灰色棉布长袍，黄皮鞋，棕色布裤，头戴青灰色半旧呢帽。陈面容憔悴，两鬓已斑。彭双目赤红，眼疾颇重。……”

请看，“左为陈独秀，右为彭述之”；“彭双目赤红，眼疾颇重”，而陈则双目炯炯有神，咧嘴在笑，是很清楚的。

此后，11月14日出版的《国闻周报》，在《时人汇志》专栏中，正确的截取了左边半张照片，介绍了陈独秀的简历。可是，国民党社会调查科（中统局前身）办的《社会新闻》杂志，不知出于工作上的疏忽，还是故意要丑化陈的形象，却截取了右边半张照片，作为“陈独秀”刊出，介绍说“囹圄中之共产党取消派领袖陈独秀仲甫氏”（《社会新闻》第1卷第12期，1932年11月6日出版）。

于是，彭述之的照片，就作为“陈独秀”的照片讹传下来。1965年，台湾中共党史专家王健民先生，在他的巨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编编首的照片“中共第一次大会代表之一部”及“中共之五代首领”中，当年《社会新闻》截取的这张照片，又两次作为“陈独秀”，赫然列出。

1977年5月，台湾最大的近现代史资料及研究杂志《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封里刊登的陈独秀各

个时期的照片中，也出现了这张弄错的照片。

情况更为严重的是，1991 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时，中共中央组织部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大型电视片《中流砥柱》第 6 集，也把这张照片作为"陈独秀"介绍给观众。我当即写信指出错误。中央组织部很重视，特别派人到我处索取资料，第二次放映时，进行了修改。

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十年来那半张一直被埋没的真正的陈独秀照片，到出现时，却又被当作为"彭述之"，刊登在当时为纪念中共成立 70 年由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巨型豪华本《中国共产党 70 年图集》第 164 页上。

陈独秀　　　　彭述之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1997 年《炎黄春秋》第 1 期，刊登辛平写的《陈独秀秘书谈大革命前夜的陈独秀》一文时，又一次把这张彭述之的照片错当陈独秀的照片放大刊出。我作为一名中共党史研究人员，从 1982 年开始注意这张照片的辨识。为了慎重起见，还曾翻拍下这张照片，寄给陈的儿子陈松年和当年曾与陈相处的郑超麟辨认。他们都指出"左边咧嘴笑的是陈独秀"。后来，我又先后得到香港版以及日本版的《彭述之选集》，对照上面的彭的照片，更证实"右为彭述之"。

我写这篇小文章给《炎黄春秋》发表，是希望各界注意，以后不再传讹。（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责任编辑　洛松）

上海荷兰国际函授中心使您在家轻轻松松学习！

上海荷兰国际函授中心的函授教育为什么如此受欢迎？

· 上海荷兰国际函授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函授学校-欧洲函授学校(ESCC)创办的。数以万计的学员通过参加欧洲函授学校的学习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你也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请赶快报名参加函授中心的学习。

· 高质量的函授教材　每个月你将收到寄至函授中心的高质量的函授教材以及作业(外国语课程还配有录音磁带)。

· 三十分钟　每天你只要花费三十分钟的时间学习是欧洲函授学校五十年来独特的教学方法所证明的。另外，你可以自选进度和程度。

(021) 62600066 星期一至星期五

· 专职教师和结业证书　函授中心的每位学员都有专职教师批改作业、回答问题。学习结束后将由函授中心和欧洲函授学校联合颁发结业证书。

· 特别提供　你只要打电话或来信，函授中心马上向你提供一套免费资料，使你有机会熟悉函授中心新颖独特的学习方法。请别再犹豫，填写下列标签，剪下贴在信封背面，或照标签样子直接写在信封背面寄给我们。

一次性支付《初级英语》全部费用可享受 9 折优惠

上海荷兰国际函授中心 SHiCC

目前函授中心已开设：

- □ 《初级英语》(每册 48 元，共 16 册，配有磁带)
- □ 《中级英语》(每册 53 元，共 16 册，配有磁带)
- ■ 《少儿英语》(每册 53 元，共 9 册，配有磁带) 新！
- ■ 《市场营销》(每册 40 元，共 12 册) 新！
- ■ 《财务会计》(每册 40 元，共 12 册) 新！

P519　请选择下列一项课程的免费资料：

姓　名：______　邮　编：______　□ 初级英语

□ 中级英语

地　址：______　□ 少儿英语

□ 市场营销

______。□ 财务会计

请寄往：上海市邮政信箱 063-303　邮编：200063

从越南来的洪水将军

● 洪峰　范硕　韩守文

洪水、陈剑戈夫妇抗战时期在延安

1908 年 10 月 1 日，洪水出生于越南首都河内，1922 年入河内北圻师范学校学习，中途，曾赴法国考察学习。当时胡志明在巴黎已组织了“各殖民地民族联合会”，年仅 15 岁的洪水，到达巴黎后很快就结识了胡志明。他虽和胡志明在巴黎接触短暂，却从胡志明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洪水返回越南后，继续在北圻师范学校学习，并在河内附近的南定省南定市按胡志明的教导从事革命活动。

1924 年 12 月，34 岁的胡志明从苏联来到广州。他化名胡光，一方面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一方面研究和关注越南国内的革命运动。

胡志明在广州，一方面把旅居中国的越南革命者组织起来，参加中国的革命斗争，一方面派人和写信回越南，动员同情革命的越南革命者到中国接受革命的教育和锻炼，还为成立越南工人阶级的新型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积极进行准备。胡志明派回国的人按照胡志明的指示在南定市找到了洪水。洪水立即响应胡志明的号召，首先组织和动员了几批南定市及其周围地区的热血青年来到中国。1925 年底，他抛弃了富裕安逸的家庭生活，几经辗转，于 1926 年 1 月，到达当时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广州。

16 岁的洪水到广州后不久，正赶上广东革命政府第一次东征开始，胡志明把洪水留在身边，联络越南革命者，或协助胡志明举办越南革命青年特别政治训练班。

1926年9月，由李富春、蔡畅等同志推荐，洪水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

1927年12月11日，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洪水与在黄埔军校学习、工作的三十多名越南同志一起，跟随第二方面军第四军教导团参加了起义。

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一起攻占公安局后，敌人出动一个团的兵力进行反扑，叶剑英指挥教导团阻击敌人。洪水和战友们一起冒着枪林弹雨，把米袋搬来当沙包作掩体，然后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枪战，终于击退了敌人。接着，他们同工人赤卫队相配合，重新夺回了观音山这个重要的制高点。

广州起义失败后，洪水随叶剑英、聂荣臻等起义领导人撤到香港。为了保护这批革命的有生力量，叶剑英、聂荣臻同意洪水在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的安排下，离开香港到泰国，在旅泰越侨中间从事革命活动。

1928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两广省委，为了支援坚持在井冈山进行武装斗争的红四军，给他们输送军事干部，通知洪水再次到中国参加武装革命斗争。经胡志明同意，洪水第二次来到中国，先在香港从事工人运动，接着便参加工农红军，先后在广东东江，福建闽西转战，并于1932年10月调到中央苏区。

洪水到瑞金后，先在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叶剑英是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洪水见到了熟悉、敬爱的首长，心里十分高兴。叶剑英见到了广州起义时的越南亲密战友，也是喜出望外。

洪水学习一个多月后，便留在红军学校任宣传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以后又从事根据地文化宣传工作，参与创建了我国人民军队的第一个剧社——瑞金工农剧社，任党团书记、社长。

1935年6月17日，在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红色干部团并入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随红军总司令部行动。洪水被安排在红军学校任教员，也随朱德、刘伯承，到红四方面军去工作。

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南下，洪水再一次经受了爬雪山、过草地的磨难。后来，在一次战斗中，洪水所在部队被打散，洪水只身北上，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追赶右路军，此时右路军已改为陕甘支队，经过艰苦跋涉，到达延安。

到达延安后，洪水进入红军大学一科学习，1937年8月，跟随八路军一一五师，八路军政治部民运部离开延安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洪水离开延安一年后，胡志明来到延安。叶剑英向胡志明介绍了洪水参加长征，在红军大学学习以及现在在晋察冀前线的情况。叶赞扬洪水头脑清晰、能征善战、多才多艺。胡志明表示，希望洪水继续留在抗日前线接受锻炼，一旦时机成熟，能回国为越南革命效力。

1943年4月，决定洪水回国参加抗法战争。临回国前，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特意与洪水、黄正光、阮庭炳三个越南同志连续开了三天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商讨两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有关战略和发展道路的问题，两国革命斗争相互支援和支持的问题，以及洪水他们回到越南后如何与国内同志团结合作，在胡志明领导下推进越南革命的问题等。

在这几天的会上，毛泽东当着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和越南同志的面，戏谑地说："洪水可是匹爱尥蹶子的马，使用得好，是匹骏马，使用不好，他是会踢人的。"大家听了都笑起来。毛泽东又对洪水说："越南现在的条件十分艰苦，你回去后要准备吃苦。我们了解你，你是个好同志。回到越南后，你一定要尊重胡光同志的领导，同越南国内坚持斗争的同志搞好团结。"周恩来也语重心长地说："现在，中国的革命形势一天天好起来了，越南的条件仍然十分艰苦。从国外回到越南的干部有两种，一是从欧洲苏联回去的干部，二是穿过草鞋的从中国回去的干部。这两部分干部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你们回去后要注意团结，注意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切不可麻痹大意。"朱德亲切地说："日本鬼子的寿命不会太长久了。目前，中国和亚洲抗日斗争的形势很好。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斗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是没有问题的。小洪有斗争经验，政策观念又强，你要结合越南国情发

1945 年至 1949 年在越南中部地区任第四、五战区司令兼政委时的洪水

挥自己的特长,在胡光同志领导下把工作做好。我对小洪很了解,他会做好的。"

8 月初,洪水一行乘飞机离开延安前往重庆,准备从重庆到昆明、经云南、广西回国。

洪水到达重庆不几天,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8 月 11 日,印度支那的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

时值国共谈判即将开始,洪水精通法语、英语、汉语、越语,正适合这方面工作。洪水接到延安的通知,要他暂时不要离开重庆。8 月 28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到达重庆,洪水也开始了为谈判服务的紧张工作。

8 月 19 日,越南首都河内的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几天后,在顺化、西贡和越南许多地方的武装起义也取得了胜利。这就是越南著名的八月革命。9 月 2 日,洪水得知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

洪水在重庆听到国内革命胜利的消息后十分高兴,回国的心情更加急迫。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后,毛泽东离开重庆后不几天,洪水也乘飞机前往昆明,时而坐车,时而步行,从广西靖西县水口关进入越南。终于于 11 月 4 日回到了他阔别 20 年的祖国首都河内。

刚刚回到越南的洪水(这时已取名阮山)被越南党中央派往越南南方,任南方军政委员主席兼第五、第六战区司令员和政委,在第一线具体领导越南南方人民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武装斗争。

1948 年,越南人民军实行军衔制,40 岁的洪水被授予少将军衔。授衔后,胡志明赠洪水 12 字格言:胆欲大,心欲细,智欲圆,行欲方。字里行间寄托了对他的无限期望。

新中国建立后,胡志明率团来华访问。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胡志明会谈时提出:为了加强中越两党、两国的联络,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打算派洪水回中国担任此项工作。

1950 年 7 月,洪水来到北京,他便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统战部二处工作,担任越南组负责人和二处的支部书记。处长是连贯,副处长是李启新。

不久,洪水被安排进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一期一班学习。1954 年夏,洪水以优异成绩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央军委条令局工作,任副局长。

年底,中央军委条令局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洪水被分配到该部的《战斗训练》杂志社任社长兼总编辑。

1955 年 9 月 2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盛大的授勋典礼。周恩来给洪水授予少将军衔和勋章。

这年 11 月,我军在辽东半岛进行了新中国建立以后规模最大的反登陆军事演习。由叶剑英担任演习的总导演,洪水在叶剑英领导下也参加了此项工作。洪水兢兢业业,认真负责,总结摸索了在使用原子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情况下作战的组织、指挥等方面的知识。

1956 年初,洪水经常咳嗽不止,经诊断:发现他的肺动脉上长了一个肿瘤,需要动手术。叶剑英十分关心和焦急,他亲自在听取关于洪水病情的汇报,多次研究洪水治病的问题;他还亲自向周恩来汇报洪水的病情,向卫生部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要请最好的医生给他做手术。

洪水被送到解放军 309 医院,由最著名的外科专家吴英恺和张大为教授为他做手术。在

当时的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下，长在肺主动脉上的鸡蛋大的恶性肿瘤是无法切除的。洪水的胸腔被打开后只好又缝上了。洪水便出院休养。

夏天，洪水感到自己的病情日益加重，便提出了回国的要求。越南党中央和胡志明很快就同意了洪水的要求。

9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政协礼堂会议室会见了洪水。毛泽东一见虚弱的洪水，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迎上去，久久握着洪水的手说："小洪，去年我在大连见你的时候，你的身体还挺好，挺结实的，怎么现在倒出毛病了，我们没照顾好你，没照顾好你。"洪水连忙说："主席和党中央一直非常关心我，对我照顾得很周到了。我和彭总、黄总长常见面。彭总还到我家探望过。叶帅是我的老领导，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他和部里的领导对我都十分关心。"接着，毛泽东、周恩来详细询问了洪水的病情，家庭情况，连孩子怎么安排都问到了。叶剑英说："我们提议由秘书韩守文一直把洪水同志送到河内，胡主席也同意了这个方案。"毛泽东对这样的安排很满意，嘱咐他好好养病。周恩来也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都欢迎。"洪水心里很清楚，这就是永别了，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在座的领导也都含泪与他告别。

1956年9月26日，洪水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规格，乘公务车离开北京。临行前，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萧克、叶楚屏、孙毅等二百多位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和外交部、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到前门北京火车站为洪水送行。叶剑英和洪水紧紧握手并拥抱。三十多年前，他们在广州相识时，洪水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年轻、活泼、机灵。叶剑英比洪水大11岁，完全把洪水当成一个小弟弟关心爱护。三十多年来，在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他们出生入死，并肩战斗，今天却要永远告别了。想到此，两个人不禁又流下了眼泪。

1956年9月30日，洪水回到自己祖国的首都河内。10月1日，在河内渡过了48岁的生日。他和家属被安排住在离主席府不远的一座法式小楼里。他带着韩秘书去主席府看望胡志明。胡志明看着消瘦、虚弱的洪水，想起几十年来，他们一起经历过的战斗历程和革命生涯，两个人不胜感慨，一起哭了一场，并用中文交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又用越语交谈起来……

1955年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时的洪水

10月22日，越南的报纸和电台传出噩耗：10月21日下午3点30分，阮山（即洪水）因病医治无效，在河内苏联红十字医院不幸逝世。10月23日，越南各大报纸刊登了洪水的悼词，并在河内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胡志明、长征、范文同、武元甲等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国驻越南大使罗贵波及使馆工作人员参加了追悼会，献了花圈。河内为洪水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洪峰：中国名字陈寒枫，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范硕：叶剑英传记撰稿人；韩守文：原洪水将军秘书）

（责任编辑　仲　文）

毛泽东蒋介石座上客 根据地国统区穿梭人

胡仁奎传奇

● 何　奇

30年代的胡仁奎

编者按： 胡仁奎是中共老党员，抗日战争初，任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因为胡仁奎夫妇经历的革命斗争，艰难曲折，扑朔迷离，长期流传着胡仁奎叛变，其妻子李伦是国民党派遣特务的传说。"文革"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有关胡仁奎夫妇的所有误传澄清了事实；又对所有错误论断与处分，予以平反。但详细情况大家并不清楚。本刊特请对胡仁奎夫妇情况有研究的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原副会长何奇同志撰写了此文，以飨读者。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期间，不仅广泛会见了各界民主人士，而且会见了国民党右派要人，如陈立夫、朱家骅。毛泽东拜访陈立夫、朱家骅并赴宴，联络人是谁呢？他就是颇具传奇色彩的毛泽东、蒋介石的座上客胡仁奎。

从一首顺口溜说起

"胡仁奎朝总裁，带回美人来；大洋两千块、电台。"这首颇带讽刺味的顺口溜，说的是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仁奎被蒋介石收买了，蒋介石送给他一位年青美貌的女郎，还给了大洋两千元，带着特务、电台回到了边区。到了"文化大革命"，胡仁奎更是在劫难逃，被康生、江青诬陷为"叛徒"、"特务"，于1966年12月29日含冤而死，他爱人李伦也被"四人帮"关进秦城监狱一蹲8年。

直到粉碎"四人帮"，中组部为胡仁奎和李伦作出结论。1979年1月12日，在胡仁奎骨灰安葬仪式上，国家林业总局副局长苟昌武致悼词说："胡仁奎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受党的派遣，长期打入敌人营垒中，不管情况如何复杂，不顾个人安危，勇敢、机智地同敌人进行斗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做出了贡献。"胡仁奎究竟是怎么回事？

"十年幽灵未远离，今朝得机魂复归"

胡仁奎，字梅亭，1901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蒋村一个小商业资本兼小地主的家庭。1919年中学毕业后，在本县第二高小任教。其间，他联络十几个同学，成

立“共勉学社”，从上海购买新书，彼此传阅。假期，有在北京上大学的进步学生返乡，对他大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给他带来《共产党宣言》等书。他开始接触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192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第二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暑假，胡仁奎返乡省亲。不料阎奉军阀开战，交通阻断，待到1928年夏返回北京大学时，领导他的同志已不知去向，从此与组织失掉联系。可他一天也没有停止革命工作。他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教联”、“左联”等活动，尽可能利用合法身份，对中共党员作掩护、救济等工作。比如，薄一波、胡锡奎、安子文等被捕后，他千方设法给他们送饭送钱。

1936年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出狱，他喜出望外。但是，当他向时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的安子文，提出恢复组织关系的要求时，安子文却说：“你现在的工作面很广，对党帮助很大，如果恢复了组织关系，你自己也会慎行少交，反而会把工作面缩小。你暂时留在党外，对党更有好处。”

“七七事变”后，胡仁奎回到太原，参加了公开的抗日救国活动。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1937年8月20日左右，中共情报系统设在太原的特科负责人胡熙庵转来党的通知，要他写个自传，几天之后，彭真同志便通知他恢复了组织关系。他十分高兴，曾以“十年幽灵未远离，今朝得机魂复归”的话，形容当时的心情。

成立晋察冀边区划良策
蒋介石电令加入国民党

1937年9月，胡仁奎随薄一波领导的决死一纵队上了五台山，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面对日军沿同(大同)蒲(蒲州)铁路线进逼太原的严峻形势，阎锡山也只有暂时依靠不怕死的共产党员和牺盟会员先稳住阵脚。1937年10月9日，阎锡山的山西省政府委任胡仁奎为盂县县长，宋劭文为五台县县长。10月下旬，省政府又委任宋劭文为第一行政区(晋东北)政治主任，胡仁奎为第一行政区行政指导员，负责指导盂县、平定、寿阳、榆次、昔阳五县的抗日工作。

这时，国民党大批部队溃退南逃，挺进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则活跃于晋东北和冀西广大地区。胡仁奎于11月中旬致函宋劭文，建议把正(定)太(原)铁路北、平(北平)汉(汉口)铁路西、同蒲铁路东的晋冀两省(因当时他不知道察哈尔的情况，所以未提察)，各县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政府，并请宋劭文与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商量。过了几天，宋劭文告他，晋察冀边区政府筹委会已经组成，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宋劭文还说，他曾给阎锡山发过几次电报，说明成立边区政府对坚持抗战有利，要求批准。阎回电说，河北省境内不管哪里的县长离职了，宋可径自委派县长，但对成立边区政府一事却只字不提。说明阎锡山既想乘机扩展地盘，又怕共产党掌握政权。胡仁奎对宋劭文说：“不是边区政府委员中将有三个牺盟会员吗，你可以告知阎锡山，并说此外还有刘奠基(国民党员)、胡仁奎，都是山西人，九个委员中靠在他这一边的可以有五人，而宋劭文是主任，能够掌握得住。这样，恐怕他就会热心起来。”于是，宋劭文又给阎锡山打了电报。不久，便得了阎锡山的同意。1938年1月10日至15日，在阜平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

胡仁奎分管民政处，兼银行监督。3月20日晋察冀边区银行在五台山的普济寺成立，当天发行了钞票。经过一段努力，使边币成为一种通用钞票，对稳定群众情绪和金融秩序起了很好的作用。

胡仁奎正在一心一意地开展工作时，1938年9月11日，阎锡山打来电报说：“兹奉蒋委员长鄂齐办四电，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副主任委员，应加入本党。”胡仁奎想：天下真有怪事，还有下命令强人入党的，国民党自己无能来敌后，却阴谋挖人墙脚。但中共晋察冀分局认为，不管怎样离奇，就当时的形势看，国民党是不能不加入的。于是，胡仁奎挂上了国民党党员的牌子。

蒋介石称兄道弟电邀赴重庆
朱家骅给胡挂上中统特务牌子

在蒋介石电令胡仁奎参加国民党以前，1938年7、8月间，阎锡山还打来个电报，要宋劭文去向他汇报工作。中共晋察冀分局研究决定，让胡仁奎代替宋劭文去汇报。经阎锡山同意后，胡仁奎于1939年1月31日到达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同行的还有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员刘奠基。

到了秋林，阎锡山又让胡仁奎出席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会议期间，阎锡山驻重庆的首席代表赵丕廉听到晋察冀边区军民敌后抗战的许多惊人业绩，提前返重庆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让赵丕廉给阎锡山打来电报，邀刘奠基、胡仁奎赴重庆汇报，胡仁奎当即与薄一波分析，晋察冀边区几十个县在八路军手里，蒋介石于1938年11月委任鹿钟麟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妄图向边区政府夺权。在这个时候，蒋介石邀请他们去重庆，肯定有阴谋。他们还分析了阎锡山的心理：阎的反共本质不会变，而且正阴谋向新军夺权；但对胡仁奎、刘奠基直接与蒋介石发生联系，心里也不乐意。

胡仁奎见了阎锡山说：“我是来向阎司令长官述职.

的，没有接受去重庆的任务，长官讲过，蒋委员长要取消边区，是长官硬着头皮顶住的，如果委员长要我们回前方取消边区，我将如何见长官和边区人民呢？"阎锡山说："那你是不想去吧！可是如何向委员长交代呢？"胡仁奎说："我们立刻上路回边区，你就说我们已经走了。"阎锡山听了很高兴，说："好，好，如何回复委员长，我想办法吧！不去，就是不去。"

第二天早晨，胡仁奎和刘奠基正要动身回边区，一个电话把他们召到阎锡山处。阎锡山把蒋介石打来的电报给他们看。电报说："关于冀省政权问题，可否请刘定庵（即刘奠基）、胡仁奎两兄来渝一走。"阎锡山说："这是委员长的手启电报，称兄道弟，你们不能不去了，请你们安排行装，不日动身，我派化之（梁化之，阎的表侄、亲信）同你们一块去。"胡仁奎再次提出昨天的难题。阎锡山说："如果委员长提出取消边区，你把它推到我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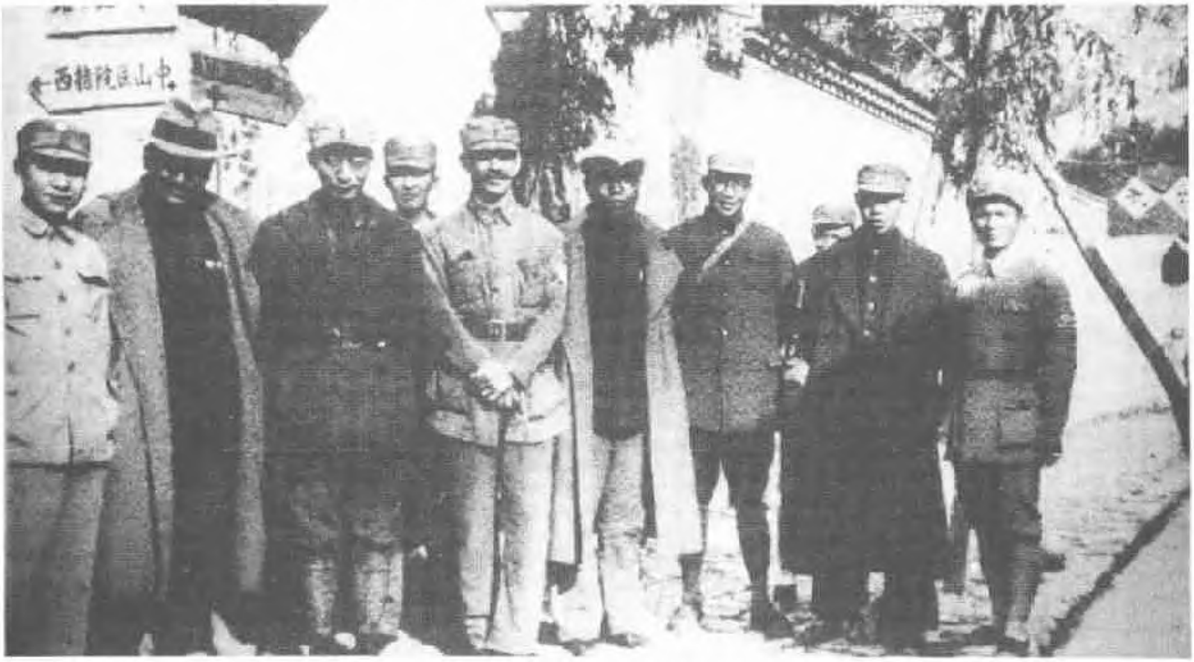
胡仁奎和薄一波商量，都感到不能不去了。

至 5 月下旬，胡仁奎、刘奠基、梁化之等人已抵重庆。第三天，蒋介石请他们吃饭。蒋介石说："你们前方办了很多训练班，办得很好，我这里也办了一个，请你们去看看。"梁化之心领神会，说："我们这次来，就是要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于是，他们三人进了中央训练团。

一天，三人到曾家岩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拜访。当时，周恩来回了延安，办事处由董必武、叶剑英负责。刚坐下没说几句话，拉起了防空警报，他们一齐向防空洞走去。叶剑英走在后边，胡仁奎也有意跟着在后边走，叶剑英拍了拍胡仁奎的肩膀，低声说："我们已接到中央（指中共中央）电报，中央已告知谁是同志，谁不是同志。"胡仁奎听了非常高兴。身在虎穴，与党取得联系，深感温暖。

在中央训练团期间，蒋介石两次召见，有一次是要他们提出个改进河北省党政的方案来。难题果然出现在面前。回到山西驻渝办事处后，刘奠基先起草了个方案，建议把冀中几十个县改属河北省政府（指国民党任命的省政府）管辖。胡仁奎看了说："把冀中区交给河北省政府，这是你我能解决的问题吗？"接着提议找梁化之商量。他对梁化之说："你看怎么办，这个问题应在抗日胜利后解决，应征求阎司令长官的意见。"梁化之表示同意，随即提了个抗战胜利后解决的方案，把这件事敷衍了过去。

一个难题刚过，又出了更大的难题。一天晚上，刘奠基对胡仁奎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要刘担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员兼晋东北党务指导员；要胡仁奎担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委员兼冀西党务指导员，并说还要派几个特务带两部电台，分别跟他们一起回到边区。这可把胡仁奎难坏了。他推脱说："我是个新党员，是个教书匠，怎么能做党部委员？"刘奠基说："我说你也搞不了，可朱先生一定要你干呢！"这天夜里，胡仁奎辗转反侧，不能成寐。第二天，他便去西南联大找老朋友、共产党员张友渔，让他赶快到"里边"（指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请示。两三天后，张友渔转告了叶剑英同志的话：现在国民党暗地已经派特务到边区，与其暗派，不如明带，这个职务你一定要承担下来，给你什么官，你就接受什么官，让你带电台，你就带。



胡仁奎（左 2）与聂荣臻（左 3）、白求恩（前排左 4）、宋劭文（前排左 5）等合影于晋察冀边区

于是，当刘奠基再跟胡仁奎谈这个问题时，胡说："我干不了，不过朱先生一定要我干，我有什么办法呢！"就这样，胡仁奎又挂上了"国民党特务"的牌子。

8月中旬，他们离重庆返晋察冀边区时，蒋介石派人送行，送给每人大洋两千多元。

返边区途中与李伦结伴侣
为革命不向爱妻暴露身份

胡仁奎等路经成都，住在成都饭店，受到中苏文化协会副会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车耀先的热情接待。在青年会举行的报告会上，胡仁奎介绍了敌后与日伪进行的经济斗争，讲得生动感人。晚上又在"努力餐馆"就餐，边吃边谈。就在这个场合，胡仁奎与一位天真热情的女青年邂逅，这就是以后跟他结为伴侣的李伦同志。

李伦，又名李东生，1917年10月生，湖南省郴州县曲江村人。在湖南衡阳女子师范上学时，因参加抗日活动被学校开除。1938年3月，经中共湘西特委书记王涛介绍赴延安。路经武汉办事处时，办事处让她与毛慎之（毛主席的侄儿）以姐弟相称一起走。到延安后，毛泽东高兴地对李伦说："好，好，你就做我侄女吧！"把她和毛慎之一块介绍到陕北公学学习。不久，报上宣传"保卫大武汉"，学校有人组织南方来的同学回南方打游击。年轻幼稚的李伦觉着在北方住窑洞，吃小米，生活艰苦，还不如回到山青水秀的南方打游击，便报名回南方。当她找毛主席，请毛主席给当时在长沙的徐特立写封介绍信时，毛主席说："啊，你刚来就走？"毛主席见她回南方的思想已定，也就答应了她的请求。

她和徐特立的儿子、儿媳一块回到长沙后，徐老也很生气，质问儿子："谁叫你们回来的？"让李伦回郴州再去找王涛。王涛见了对她也不高兴。李伦后来看到一本《新疆纪行》，又萌发了先到新疆后到苏联留学，再回来革命的想法。湘南特委的一位同志却主张她再去延安。李伦又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回信说："李伦同学，接到你的信了，你要去新疆，要来延安……由你自己决定，不过，总要吃得苦，耐得劳，方能有成就。"

李伦带着毛主席的信，于1939年7月到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办事处同志安排她到了成都，住在中苏文化协会。

一天，听了胡仁奎的报告，晚上又参加了聚餐会，她对晋察冀边区军民英勇抗敌的事迹十分向往，把胡仁奎当作抗日英雄。以后几次到饭店拜访胡仁奎。有一次，她听胡仁奎对别人讲，说他妻子去世了，留下四个孩子无人照料。李伦不免又产生了同情心。李伦给胡仁奎看了毛主席给她的信，并表达了随他到边区参加抗战的意愿；胡仁奎也想：如果与这样一位政治上能和自己走一条路的女子结为伴侣，也是一件幸事。但是，由于时间仓促，彼此没有深谈，未能同行。

过了几天，胡仁奎从绵阳寄给李伦一信，信中说："伦：无以为称，请示我最好的称呼。三日的过从引为知交，人生亦称庆矣！唯因国是，焉敢惜别，只是他日相会则不知又在何时？只有梦中告我西安可会，也许你已乘机北飞先我到秦，若然，真今天之巧事矣！"通过书信来往，他们约订在西安或秋林见面。1939年10月他们在秋林结为伴侣。也就从这个时候起，党内有些人怀疑李伦是国民党派遣特务，并向党中央发了电报。

12月中旬，胡李夫妇准备动身返晋察冀边区，在收拾行装时，李伦发现胡仁奎有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的结业证，孔祥熙、陈诚等国民党要人的讲话材料，还有蒋介石请吃饭的请柬等。她惊呆了，说："这是怎么搞的，你给我讲讲清楚！"李伦急得直哭，胡仁奎又不便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只是说："我是个教书匠，因为抗战才参加了国民党。"又说："你和延安的领导有来往，这次路过延安你可把情况讲清楚，你要求进步，我绝不拉你的后腿。"

李伦在苦恼中随胡仁奎到了陕北洛川，同国民党从西安派来的特务会合。胡仁奎告诉李伦："他们都是国民党特务，还带了电台。"李伦更生气了。进红区时，胡仁奎有意走在前头，把名片交给放哨的，目的是请他们尽快报告延安。下午一点多到延安，没有人接。他跟刘奠基商量，是住延安，还是继续走。刘说延安没有人接待，怎么好住。于是继续走。晚上住宿后，李伦与胡仁奎吵了起来，说要骑马返延安向毛主席汇报。胡仁奎怕被别人听见，耐心解释。李伦也无可奈何。当走到绥德，住在三五九旅司令部时，李伦把这些情况全部告诉了王震同志，请他转告毛主席。

回边区苦心思索行事
朱家骅电邀再赴重庆

1940年3月，胡仁奎一回到边区，就向中共晋察冀分局汇报情况，并请示如何对待国民党给的任务。分局决定要搞下去，并指出两条原则：一是打给重庆的电报，既不能泄露机密，又要有点东西；二是胡仁奎的言行一般要比刘奠基右一点。以争取国民党的信任。分局还派来宋启明与小陈协助。胡仁奎让宋启明担任组织干事，负责与中共北岳区党委直接联系；让小陈担任机要秘书，负责与带来的两个特务交往，掌握情报。

1941年秋，朱家骅来电报，要胡仁奎赴重庆述职。经请示聂荣臻后，复电朱家骅借故推脱。事隔一年后朱家骅又来电报，经中共分局研究让胡仁奎再赴重庆。

胡仁奎和李伦夫妇迂回曲折地绕道晋绥边区到延安，已是1942年11月下旬了。在延安，他们拜访了毛泽

东。李伦向毛泽东汇报了与胡仁奎相识经过。叶剑英、彭真、贺龙、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又分别会见并宴请。最后，叶剑英代表第十八集团总部、派汽车把他们送到秋林。以后，胡仁奎一再说："党中央如此盛举，都是为了抬高我的地位，以利于我在国民党方面的工作。"

他们在秋林逗留期间，胡熙庵对李伦说："梅亭这次去重庆，使命很重，你要很好配合，梅亭是1926年的老党员了。"李伦听了又高兴、又埋怨。她问胡仁奎。胡仁奎说："我是1926年的党员，但后来失掉组织关系了。"对于恢复组织关系的事仍只字未提。

胡仁奎到重庆，已是1943年3月。朱家骅说，总裁很器重你，我已签呈总裁，请他"召见"。果然，一日接蒋介石侍从室通知："总裁召见，谈话五分钟"。五分钟能谈什么，这次"召见"只是表示器重而已。

胡仁奎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汇报完工作后，对朱家骅说：在边区几十个县的国民党部，开支是向边区政府借的，希望朱家骅拨付。朱家骅答应后，他又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设法把钱汇到前方。

1943年10月10日，他们离开重庆，绕道秋林，回到延安已是1944年4月初了。根据情况变化，党中央决定胡仁奎不回晋察冀边区，而是作为客人住在延安交际处。为了提高胡仁奎的身份，开了欢迎会，宴请胡仁奎，《解放日报》还发了消息。毛泽东来交际处看望。

有一天，毛泽东把胡仁奎接到他那里深谈。毛泽东问到李伦的情况，胡仁奎说："很好。"毛泽东说："1938年她来延安时，我见过，我看她是一个天真活泼的青年。你就开门见山地告诉她你的真实身份。为什么叫一个青年那么痛苦呢！"

胡仁奎从毛泽东那里出来，路经中共中央党校，把毛泽东的话告诉彭真。彭真为了慎重起见，说："还是不告为好。"胡仁奎是个组织观念很强的同志，仍没有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李伦。

留遗嘱三赴重庆长期埋伏
胡仁奎告李伦"我是外白内红"

1945年2月底，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打来电报，调胡仁奎到重庆工作。胡仁奎想：一下重庆，是事情逼在那里，不得不去；二下重庆，是朱家骅一再电约，要应付一下；这次若是长期留在重庆，就更难办了。他把电报交给彭真，表示不想再去。为此，3月20日左右，周恩来还约彭真、聂荣臻、刘澜涛等在杨家岭开会。胡仁奎说："前两次去重庆是临时的，还比较好应付，这次去是长期的，我是个教书匠，干不了这个。"刘澜涛说："蒋介石只要你去，没有要别人去，无法调换呀！"彭真也说："你还是去吧！"周恩来说："这个戏还得你去唱"，并说，

胡仁奎夫妇及其子女

去了，一要广交朋友；二要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三要搞些情报。胡仁奎说："既然党需要我去，我就去吧！不过，我留下个遗嘱：我如果牺牲了，请登报或竖块碑，说胡仁奎是中国共产党员。别的我也没有什么要求。"那时，李伦正准备生孩子，胡仁奎有些不放心。但为了党的工作，只准备了两天就动身了。

1945年4月3日，胡仁奎抵达重庆。为了便于在上层工作，他首先拜见了陈立夫、朱家骅、郭紫峻、张道藩、潘公展等国民党要人。为了做中下层的工作，又广交朋友，凡有需金钱帮助者，他慷慨解囊，反正手里有到重庆后，刚领取的1944年以来国民党冀西党部的经费。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跟他接触的人，都感到他是位教书匠出身，有钱不吝、慷慨好施的忠厚人士。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8月20日，胡仁奎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对陈立夫说："毛先生来了，我要去看看，你有什么嘱咐吗？"陈立夫说："是的，你应该去。"并说："毛先生也许会来看我。"9月4日，胡仁奎到桂园，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作了如实汇报。毛泽东说，咱既跟他和，就是要和它这个党和，国民党是右派掌权，解决问题不能光找左派，还要找右派，我要会他们去，你可做桥梁，跟陈

立夫、朱家骅约一下。

经过胡仁奎相约，9 月 18 日午后一时许，毛泽东派人来请胡仁奎到桂园，晚上 6 点多，他陪毛泽东、王若飞到教育部拜访朱家骅。

9 月 20 日下午 2 时 50 分，他陪毛泽东等到国府路高庐陈公馆访陈立夫。10 月 1 日晚，赴朱家骅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宴。10 月 13 日又赴陈立夫之宴。

1946 年春节，李伦和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对李伦说："你也到重庆吧！"过了半个月，安子文安排她去重庆找王若飞。3 月 8 日，李伦到重庆。3 月 29 日，胡仁奎带她去曾家岩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看王若飞时，王对李伦说："你就跟胡仁奎同志在一起，他领导你的工作。"回家后，胡仁奎对她说："为了我的问题，你多年心里很痛苦，今天我告诉你，我是外白内红，是 1926 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我这些年做的工作，都是党批准的。"李伦听了恍然大悟，非常高兴。从此，她就和胡仁奎一起为党做秘密工作了。

叶秀峰：
胡仁奎的情报，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胡仁奎：
灵魂我们有，既不批发，也不零售

1946 年 5 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胡仁奎和李伦也于 7 月抵南京，国民党党部给他安排了个中央党部设计委员。中统局局长叶秀峰对胡仁奎说："国共谈判，正面是张治中、邵力子，你可以从侧面常到梅园新村走走。"胡仁奎想，这是让摘情报哩！8 月 1 日，胡仁奎和李伦向周恩来、董必武汇报了叶秀峰的话。周恩来说："那你就来。"这样，每半个月左右，他们就去梅园新村一次。

可是，每次从梅园新村回来，总得向叶秀峰写个报告。这是件很伤脑子的事。因为在梅园新村周围有许多便衣特务监视，他什么时候去梅园新村，中统局都知道。胡仁奎采取的原则是，能看得见的外表行动如实地写，对于政治问题，在不暴露党的机密的前提下，根据外表行动字斟名酌地精心塑造，使中统局看了，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又找不出什么漏洞。比如，1946 年 10 月 11 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国民党官员兴高彩烈，以为梅园新村的人一定垂头丧气了。叶秀峰要胡仁奎到梅园新村摸摸气候。16 日，胡仁奎去梅园新村。周恩来正在会见张君励和左舜生。他先和王炳南叙谈。待张、左走后，周恩来为他分析了各民主党派的动向，讲了党的方针。他回来后写报告，如实地写了张、左正在周室，以及自己先会王后会周的过程，说周恩来先生的态度潇洒自若，一如既往，讲了人民热爱和平，国共两党应该团结合作，巩固和平，否则，有负民望。从 1946 年 9 月至 1947 年 2 月，他共写过 12 次报告。有一天，中统局副局长郭紫峻对胡仁奎说：你写的报告，叶秀峰都看过了，评论是："你说有内容吧！实在没有什么；你说什么也没有吧！好像也有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胡仁奎对李伦说："他们要收买我的灵魂，灵魂我们有，但既不批发，也不零售，怎么能让他们食之有味呢！"

1946 年 11 月，国民党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周恩来、邓颖超返延安。1947 年 3 月 7 日，蒋介石把董必武等中共代表强制送回延安。胡仁奎又与党失掉联系。他们焦急地等待，五六个月过去了，不见党中央派人来联系。胡仁奎对李伦说："在南京找不到党的关系，我是北方人，在北平熟人多，我们设法去北平吧！"他找了个借口，于 11 月 8 日到北平。12 月 23 日，胡仁奎的老乡，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韩俊德来家。胡仁奎请他向中共党组织汇报，要求派一"交通"引他们回晋察冀边区。1948 年 5 月，韩俊德告诉他，地方党组织请示了党中央，中央指示："还是请你在外边，不要回去。"12 月底，中共地下党员崔月犁来家说："中央知道你来北平了，北平马上就要解放，刘仁同志说你不要回去。现在敌人捕人很厉害，你要注意一点。"

1949 年 1 月，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第二天，胡仁奎就找到了彭真同志。从此，胡仁奎从地下回到地上，在外贸战线为新中国建设出力。他先后任国家对外贸易管理局副局长、中央外贸部办公厅主任，海关总署副署长，北京林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　杜晋　洛松）

在胡仁奎骨灰安放仪式上罗玉川致悼词

奔向延安热士

● 朱鸿召

聚集在延安抗大的热血青年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国内政治形势紧张。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帮助下，诗人艾青让妻子随办事处的车子先行一步，踏上去延安的路。艾青和东北籍画家张仃、作家罗峰一道稍后启程。张仃和罗峰是国民党江苏反省院狱中的难友。“九·一八”事变后，失去家园的张仃到处流亡，曾于1938年以抗日艺术队队长的身份去过陕北，由毛泽东亲自介绍到延安鲁艺工作，不久又被派回大后方工作。这一行三人是利用张仃原来的关系，搞到一张绥蒙自治指导委员会长官公署高级参谋的身份证。将身份证上的“一”人改为“三”人后，身材稍高，气质高雅的艾青乔扮为高级参谋，熟悉陕北绥蒙情况的张仃充任秘书，罗峰自告奋勇地担当勤务兵，每到一处便忙着搬行李，打洗脸水，假戏真做。临行前周恩来送来一千元盘缠，叮嘱他们要冠冕堂皇地走大路，以免引起怀疑。万一遇到国民党特务阻挠，立即电告郭沫若以便营救。

他们混上国民党中央政府盐务局的汽车，由重庆一路颠簸到宝鸡。遇上正在这里筹款去延安的作家严辰、逯斐夫妇，又将证件上的三人巧妙地更改为五人，大家结伴同行。他们先坐火车到耀县，然后转乘毛驴车。到耀县城外，天已擦黑。国民党军警开箱检查，用手电筒照着他们一个个验明正身，才许进城。刚在旅店睡下，又有国民党警察来查证件，声称要由局长审阅后才能发还。五人一夜无眠，四更天便起身套好驴车，以赶路为由去警察局催要证件。罗峰口气严厉：“一个证件审了一夜，办事如此拖沓！我们长官发脾气了，要向上司汇报。”警察不知来头，慌了，只好实情相告：“局长搓了一夜麻将，我有啥办法？”赶紧将证件退还我们。驴车驮着五颗急切的心，迎着曙色继续北行。一路上他们历经了74次盘查，才到达洛川、富县之间的国共交界处。见那平川上立着一个碉堡，再往前，就是陕甘宁边区了。他们驻足凝视着那个路碑似的碉堡，追寻几十年的叛逆者与逃亡者们，来到人生的分界线上，心中升起了庄严和崇敬。全体下车步行，最后一次交验过证件，便大步跨进了“自

己的”土地。不久，看见了手执红缨枪的妇女儿童。张仃忍不住扑在黄土地上打几个滚，高唱起《国际歌》。

当时进入延安的知识青年，仅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途中，就要通过咸阳、草滩、三原、耀县、铜官(川)、宜君、中部(黄陵)、洛川、鄜县(富县)等九个国民党设置的特务据点或军警关卡。而到西安之前，更要经过重重关卡和种种的冒险。

1940年12月底，六个上海青年学生偷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并通过地下党组织了解到抗日革命根据地办起了鲁迅艺术学院(鲁艺)、抗日军政大学(抗大)等学校，欢迎知识青年去学习、工作的消息后，筹划着离家出走。“大家感到最伤脑筋的是如何瞒过家庭出走”。最后他们决定，借学校放寒假之际，乘家中忙于准备过年的机会，溜之大吉。

他们六人中，宗政文和小同学梁国基，都是职员家庭出身，生活小康，穿长棉袍，携带柳条箱，到“外婆家探病”。朱因毅和姓熊的两人扮成表姐妹，朱的父亲是淮南一个煤矿公司的大股东，她长发披肩，穿时髦旗袍，携带皮箱“回乡探亲”。另两位姓沈的是亲兄弟，父亲是家大书局的老板，他俩西装革履，也做回乡探亲状。

为了筹措路费，他们事先都早已将零花钱积攒藏好。只有朱因毅来不及准备，她就暂时挪用了学校为难民募捐由她保管的捐款。等买好船票待到出发时，各人才把事先写好的信邮寄家中。朱因毅给家里的信则特别加上一句：定要如数归还挪用学校的募捐款。

傍晚上船，船行夜间受到日军检查。次日黎明船到张黄港登岸，通过敌人据点的岗哨搜查，然后坐独轮车走十里地到芦港，不等天黑就到了新四军地界了！他们再经海安到达了盐城的鲁艺华中分院。两年后，他们又从这里转去延安或别的抗日根据地。

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不断接待着从沦陷区、大后方和海外各地来此要求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曾发生过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1939年4月的一天，一位叫熊道柄的青年教师，带着三个学生到办事处，要求介绍他们去延安。办事处告诉他们，抗大、陕公(陕北公学)等学校已经停止招生；再说，去延安的路上，国民党特务设立了层层关卡，盘查很严，很不安全，一时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接待人员的话音未落，其中最小的一个学生只有14岁，他一面哭一面说：“我们从四川万县来，路上卖光了行李，沿路讨饭吃才到的西安，就是为了到延安上学，打日本，救中国。沿路盘查我们不怕，只要叫我们去，就是爬我们也要爬到延安！”其他几个人也都表示了同样的决心。接待人员为之动容。经研究决定，给以特殊照顾，送他们去了延安。

有一位叫吴醒柏的来自东南亚的知识青年

据1994年6月延安大学教育处统计该校及所属各分校学员情况：

学员来源统计

学员来源＼院别	行政学院	鲁艺	自然科学院	母亲班
大后方	71	178	51	69
陕甘宁边区	735	18	1	5
其他根据地	43	94	5	5
敌占区	6	15	2	0

学员家庭成分及本人出身统计

家庭成份	人数	本人出身	人数
工人	30	工人	73
雇农	9	雇农	8
贫农	163	学徒	21
中农	303	店员	4
富农	153	农民	48
地主	270	职员	22
资本家	26	自由职业者	38
小有产者	330	教员	37
贵族	1	学生	974
官僚	17	军人	40
		商人	20
		家庭妇女	17
总计	1302	总计	1302

侨胞，他决心回国抗日，不顾家庭阻挠，先偷跑到香港。其父乘飞机追到香港，答应这个独生子一切条件，要他回去。最后他还是坚持到了西安，经办事处介绍，和五、六十个青年一起步行到延安。

一位从桂林经武汉、郑州到西安的经历者记录了此行：

从西安步行到延安，记得在路上走了十一天，除了下雨天不能走路之外，每天差不多要走 90 华里到 110 里的路程，……

陕北民谚称：宁肯往南移一丈，不愿向北挪一步。黄土高坡，沟深塬高，连绵起伏，人可对面而歌，行却半天不即。西安到延安之间，直线距离不过三百余公里，步行路程，迂回崎岖，竟有八百多华里。

中共中央对到延安的文人，还订下“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

如此行程如此路，深深触动一代读书人的心灵。他们以叛逆的态度离开了原来的家庭和社会，只有延安是归途。他们的精神是神圣的。

可看出，学员主要来自大后方、敌占区。他们绝大多数是要步行到延安的。他们家庭成份在中农以上的占总数的 84.5%。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青年，有文化知识，更富有理想。为了理想，他们历经艰险，奔向延安，把最好的热情和青春给予了延安。艰难险阻的路程，考验了他们的意志和决心，更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和热情。那些不能成行的大后方的青年致信延安大学学生说：

我们是在两个天地下读着书，你们在民主的新鲜空气中，自由地思想，自由地学习。你们的学习紧紧地联系着实际，你们和群众亲密地携着手，立刻就要献身到直接抗战和边区人民的建设事业。我们却和你们相反，几年来一直在极度的高压下生存……

一批上海知识青年历时 13 个月，走了一万多里的路程才到达延安。“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他们走到南十里铺，当哨兵告诉他们从这里开始算到了延安时，有人就跪到地上，双手捧起路上的土，紧紧贴在胸口上，无限深情地说：“祖国啊，就剩下这块干净的土地了！”

一位四川来的教师，激动地伏到地上亲吻泥土，兴奋地喊着：“啊，自由的土地，我来了！我属于你了！”

压抑太长，追求太艰，一朝梦想成真了。

陈荒煤说：“我刚到鲁艺的第三天，正是旧历年的晚上，我第一次听见人群庄严地唱着《国际歌》，第一次看见了红五角星的灯，光辉地照耀着一群欢笑的脸，我的心激动得很厉害，……”延安鲁艺所在地的桥儿沟天主教堂，在他眼中“这座教堂就是我底天堂”！能在贫瘠的黄土地上找寻到“天堂”的一代人，是辛酸的，也是幸福的。

马加家在辽宁。抗战爆发后，由北方左联组织安排参加到晋西北游击队工作。他怀里揣着组织的介绍信，只身从雁门关外出发，跋涉一千多里，风餐露宿，身边只带着一支钢笔和一个指南针。1938 年 5 月底，当他跨过了延河，看见了宝塔山时，他像回到了家，心中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希望。

1937 年 11 月柯仲平到延安时，“觉得延安什么都是圣洁的，每条河水与山谷，都可以写成圣洁的诗”。他站在延安街头，大声朗诵着：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饭，/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

陈学昭第二次到延安后，她更一门心思地投向延安的怀抱。

我们像逃犯一样的，/奔向自由的土地，/呼唤自由的空气；……/分给我们荒地，/借给我们工具，/让我们耕种；/八路军的留守部队，/怕我们人力不够，/还帮我们开荒，锄草……

随同冼星海奔赴延安，在路途结为夫妻的钱韵玲女士回忆：

这里的天是碧蓝蓝的，地是金灿灿的，红光满面的青年，吃着香喷喷的小米，伴着清粼粼的延河，学习革命的真理，研讨解放的道路。

延安的空气，是“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何其芳以其“诚实的语言”描述着延安的景象。

（责任编辑　仲　文）

研究泰山历史的年轻学者周郢

● 王兆麟

在近年的一些报刊上，不断有关于年仅二十几岁的年轻学者周郢的学术文章刊出：

——曹雪芹家族败落原因何在？红学家论争迭起。周郢从泰安地方志中发现新史料，揭示曹雪芹之父骚扰驿站获罪真相；

——元代农学家王祯的资料散佚，生平难详。周郢从研究碑刻史料中获得大量珍贵的[illegible]料，补其空白。元史专家邱树森教授撰文称，这是“王[illegible]生平事迹的重要发现”；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唐宋玉册产于何地？周郢对此进行了考证，并撰文在台湾《故宫文物月刊》上发表，与台岛学人展开讨论；

——近年来召开的诸葛亮研究、蜀道研究、泰山研究、中原文化研究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均有周郢的论文发表，他的一些学术观点，引起与会中外学者的重视。

……

许多专家学者读了周郢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之后，以为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当知道这些宏篇著论竟出自一个今年才二十几岁的青年人之手，引起人们的惊奇与赞叹。正如日本著名汉学家、学习院大学文学院长小仓芳彦教授所说：“在这样小的年纪，如何获得如此广博的知识，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谜。”

1993年秋，第四届蜀道及石门石刻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陕西汉中举行，当周郢的论文《外国学者笔下的汉中古道》在会上宣读时，不禁引起与会的十多位日本学者的惊叹。他们没有想到在台上这位稚气未脱的年轻人，竟把清代时日本学者来华考察古栈道的情况研究得如此透彻。日本古代道路研究会干事长武部健一更为兴奋，会后，他找到周郢几次晤谈，并把周郢的论文带回日本，把自己写的有关文章寄给周郢，和他进行学术交流。这一老一少的异国同行竟成了“忘年之交”。

周郢为什么能在史学的学术研究上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辉煌成果，这要从他青少年时代所处的家庭环境和他个人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谈起。

周郢（笔名舟子），70年代初生于山东泰安，父母都在陕西汉中工作。父亲周竟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陕西省政协委员，母亲钱传簪出身书香门第，从事戏剧工作，舅舅也是一位古典文学爱好者。周郢受书香家庭的熏陶，自幼便喜爱上文学和历史。虽然他读书启蒙的时代正好碰上对文化摧残最烈的文革时期，但周郢的父母并未放松对他的教育，不但千方百计搜罗文革前出版的各种有关历史的连环画和故事书给他看，还购一些浅显的文学、历史、戏剧等方面的读物，辅导他广猎知识。在父母的谆谆教导下，周郢在上小学时，就可以一口气背诵从三皇五帝到清末的历史沿革，举凡朝代兴替、重大史事本末，均能说得大致不差。他还遍览《三国》、《水浒》、《红楼梦》等古典名著以及文学史、戏剧史之类的学术专著，积累了深厚的历史知识、文学功底。

周郢读书并非囫囵吞枣、食古不化，而是勤于思考，光小时候记录的读书卡片就有一小箱子。由于读书的诱发，周郢的脑海中竟产生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我将来也要写一部大书，作一个练恕（清代少年史学家）那样的文史学者。

这一念之动，遂使周郢走上了一条漫长而又崎岖的治学之路。

周郢11岁那年，在阅读了许多戏剧论著后，发现了一个戏曲史方面的小问题，试写了一篇300字的文章，《脸谱形式不是从兰陵王开始》，投寄给北京《戏曲艺术》杂志，没想到这篇短文竟得到编辑的欣赏，很快加“编者按”予以刊出。这件事对周郢鼓舞很大，从此更加认真的博览群书并勤奋地写作。但由于他全身心地沉缅于文史之中，对数理化不感兴趣，初中毕业后，在家人的支持下，便放弃升学，走上一条自学之路。开始他系统地自学文史，并将研究重点放置在乏人问津的地方史领域（主要为泰山、汉中两地历史）。16岁时，周郢就被山东《泰山志》编辑室聘为特约编撰，数年间他除了撰写志稿，还撰写发表了各类研究文章百余篇，有5部著述出版。其中《泰山历史纪年》为第一部编年体泰山简史，而《泰山文史丛考》则集中体现了其对泰山研究的新见，书中发掘了的一批鲜为人知的文史资料并钩沉探赜，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台湾《故宫文物月刊》108期在介绍“泰山文化与泰山学”时，专门引述了此书中的观点。

除了学术研究之外，周郢还撰写、刊出一些旧体诗、散文、剧作以及日本文献译介等等，反映了他多方面的才能。1989年12月26日《中国青年报》曾以《十九岁的学者》为题，介绍了他自学成才的事迹。

周郢在学术上取径较宽，但最能体现他治学成就的，当推其对于泰山地方史的研究。泰山为五岳之首，历史悠久，曾被郭沫若誉为“中华文化史的一个局部缩影”。周郢自小便生活在泰安姥姥家中，深深被泰山古老的历史文化所吸引，常常攀危峰，探幽壑，寻觅古迹遗址，过访乡贤后人，对泰山历史文化展开深入的研讨。

兰州大学青年学者王传明副教授在为《泰山文史丛考》所撰序言中指出，周郢之治岱宗文史，有三个特点：一是注重挖掘新资料，二是勇于提出新观点，三是致力开辟新领域。周郢认为史料乃“治史之第一事”，应予高度重视，他集资料，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征于道里，一些珍贵文物文献，如宋刘概诗碑、秦篆卷轴、清相赵国麟日记、捻军石刻，都在他的查访下重新面世。而他对泰山历代专著的搜集和著录，尤为引人注目。周郢研究问题时，还不拘成说，多提出独到见解。如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现今岱庙大殿即宋代天贶殿，周郢却查证宋代史籍，考出宋天贶殿应在灵液亭北，与岱庙无关。宋岱庙大殿实为嘉宁殿，从而纠正了百年讹说。这一新说得到国内一些宋史专家的肯定。又如岱庙大殿的壁画《泰山神启跸回銮图》一直传为宋画。后来周郢发现壁画表现的典章制度及艺术风格都与宋代不合，通过三年调查他终于从岱庙康熙重修碑及泰安《刘氏族谱》中找到证据，论定壁画创作于清初，作者为刘志学等泰安民间艺人。

周郢的研究不仅“在山言山”，而是视野宽阔，对泰山进行多角度、多学科、多方位的研究。他在汉中考察中，发现古褒斜道石门十三品石刻之一的《石门铭》，记载了北魏梁秦刺史羊祉重开褒斜、复通石门的事迹，而这位羊祉，便是泰山人。于是周郢便开始在泰山文献中留意羊祉的材料，结果查到新泰近年出土的《羊祉基志》等新资料，考证出《魏书·羊祉传》不写羊祉重开石门之功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施使的隐善扬恶之曲笔。1988 年 4 月，时年 18 岁的周郢在汉中参加石门国际学术讨论会宣读此论文，引起中外专家的震惊。

1993 年 4 月周郢出版了《泰山文史丛考》，集中表现了他对泰山研究的新见。

周郢还撰写了《泰山历史纪年》，参加了大型方志《泰山志》的编纂，与人联合编注、点校了《泰山历代小说选》、《泰山道里记》、《新泰风物史话》等书，均已出版。他主持编辑的《泰山丛书续编》已刊出，可谓岱宗千秋，尽入史卷。

周郢的学术成就，引起社会注目，许多专家、学者纷纷致函、撰文对他的研究表示鼓励和赞赏。上海师大宋史专家顾吉辰看了《泰山文史丛考》后，非常兴奋，当即写信给他，指出：“这样一部著作，出自一位 22 岁青年之手，令人惊叹。考论精当，观点新颖，征引广博，是大著特色，更令人学习。”黄山学者洪静渊在展读《泰山历史纪年》后，赋诗相赠：“泰岱录奇章《纪年》，旁征博引见鸿篇；才兼文史弥钦佩，妙笔精描泰岱妍。”

周郢在阅读琼瑶写的长篇小说《几度夕阳红》时，对书中所引的“几度夕阳红”这首词说是罗贯中所作（刊《三国演义》卷首）进行考证。他在掌握了确凿史料后，认为这首词是明代著名诗人杨慎所作，于 1991 年初致函琼瑶进行商榷。琼瑶在复信中对周郢的考证表示赞同，说“先生研习历史、文学，必然造诣深厚，并能探索细微，殊能洞察谬误，予以指正，除将再版时更正错误外，谨以深致谢忱”。

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副主席毛铸伦先生，偶然读到周郢研究其曾祖、清代泰安知县毛澂的文章十分感动。他在信中说：“无法表达毛家子孙由衷的感激！”1992 年 7 月，他在出席香港“海峡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研讨会后，专程北上泰安会晤周郢，并遵父命向泰山区政府捐款表示感谢。

由于周郢只有初中的学历，而且后来基本上都是在家自学，因此长期没有工作单位，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治学、生活的要求，经历的种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周郢依然整日钻在古籍报纸之中，仍奋进不止，对个人生活、前途很少考虑。他在一篇《自题室铭》中表达了他的心志：“安于淡泊，不慕浮名。读不望成，惟怡心境。学以修身，俭以励行……”兰州大学王傅明教授读到这篇室铭后，在一篇文章中称赞周郢“意志坚强，身处困境而不沉沦。”

1992 年 8 月初，到汉中地区行署工作不久的杨吉荣专员，看到周郢的事迹材料和他写的部分文章，十分赞赏，认为人才难得，特别是年轻人埋头搞文史，刻苦攻关而又有成就者更是凤毛麟角。他批示有关部门研究解决周郢的工作问题。随后不久，他就安排到略阳县文化馆工作。

“安于淡泊”的周郢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山城后，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一方面顽强地自学日语，并继续钻研文史，已写出好几篇学术论文。最近，他应出版社之约正埋头一部数十万字的学术著述。为了表达他攀登学术高峰之志，他在他写的一首《日观希望海》七律中这样写道：“泰岱峰头荡莽日，茫茫一色极天东。翁云气起驰万马，金紫霞来鞭天龙。足下九瀛津似碗，袖中三尺剑如虹。欲浮显沼朝秦帝，堪笑甘朗不英雄。”诗末借《后汉书》甘英使大秦（罗马帝国）之典，抒发了其欲乘风破浪，在学术上争取有所建树的远大理想。读诗至此，作者不由想起王传明先生在《泰山文史丛考序》中的一段话：周郢君不仅学识卓越，而且有较好的人品修养，现在他赶上这样一个好时代，相信他会继续在这条崎岖泥泞的科研冷路上跋涉下去，并向更高的学术山峰攀登。

（责任编辑　方　徨）

乐坛英才郑律成

● 申　春

郑律成同志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正当打倒"四人帮"之际，我们祖国刚刚开始复苏之时，1976年12月7日，郑律成不幸英年早逝，时年58岁。他虽然离去了，但留下那些昂扬动听的、永远不朽的歌声，时时激起人们感情的波澜，引起对他深深的怀念之情。

郑律成，1918年8月13日出生在朝鲜南罗道光州杨林町一个贫苦的家庭。幼年即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压迫，民族仇恨象烈火燃烧着他那幼小的心灵。父亲郑海业，是个极富爱国思想的贫农。他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仁济，早年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郑律成幼年就受到父兄的影响，革命的志向时刻激励着他。

1933年，他随一批朝鲜进步青年来到中国。他从上海到南京后，进入在华朝鲜抗日团体创办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学习。翌年毕业后，就在南京参加抗日救国活动。郑律成为求得在音乐事业上的发展，他师从著名外籍教授克利诺娃学习声乐，由于他对音乐执着的追求，加上他自己有一定的音乐天赋，深得教授的喜爱和赞赏。不久，郑律成在上海通过姐夫朴建雄，认识了上海妇女救国会领导人杜君慧，杜和她的爱人金奎光都是中共党员，左联盟员。在他们的影响下，郑律成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启蒙，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他和许多进步青年一起，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36年春，郑律成在南京经罗青介绍，加入进步文艺团体"五月文艺社"，在社团成立大会那天，负责人邹趣涛欢迎郑律成弹一曲随身带来的乐器曼陀铃，他纵情弹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大会结束时，他自告奋勇唱了朝鲜著名的民歌《阿里郎》。他用激昂的声调唱道：

我现在已远离了故乡，横渡鸭绿江，那三千里江山已不在望。阿里郎，阿里郎，噢，阿里郎！我正跨过阿里郎的山岗。

他从聂耳、冼星海的歌曲产生的巨大作用，深刻认识到音乐是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有力武器，他决心尽快掌握运用音乐这个武器。

不久，"五月文艺社"的创建人邹趣涛写了一首诗："五月榴花艳艳天，中华碧血更鲜妍，民族国耻凭谁雪，时代青年勇向前。"郑律成看后如获至宝，他以饱满的激情为这首

青年时期的郑律成

诗谱了曲，经广大社员传唱后受到大家欢迎，并正式确定为"五月文艺社"社歌。这首歌是郑律成涉足我国乐坛的第一首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掀起了全民抗战的热潮，在强烈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声浪中，关押在苏州监狱的救国会"七君子"和罗青获释出狱。郑律成旋即赶到南京中央饭店见到了罗青，经罗青介绍结识了音乐家冼星海，从此，郑律成在音乐事业上喜逢了一位志同道合的知音。年方19岁的郑律成，被冼星海刚刚谱完曲的《救国军歌》那雄浑激越的音调所感染，他当即以嘹亮的歌喉高唱了这支歌，冼星海听后赞叹不已。他很喜爱郑律成的音乐才华，约他到上海长期合作，努力创作反映民族心声的作品。

郑律成到上海后，以虚心好学

的态度和热情开朗的性格，在文艺界广交朋友，并寻觅好的歌词。他结识了才华出众的女诗人关露，并很快为她写的歌词《战斗妇女歌》谱曲：

起来，快用我们的血，洗尽民族的羞，不让敌人的旗帜，遮羞我们的头。妇女们，为着自由不怕生死的决斗，现在，正是生死存亡之秋……

这歌声，代表了广大妇女战斗的心声，成为上海各界妇女投身抗日洪流的号角。郑律成去上海，是他音乐生涯的初创时期，他开始运用音乐这一武器为抗战服务。他在上海先后还创作了《发动游击战》、《战时妇女歌》等歌曲。

1937年9月，上海战事危急，在全面撤退中，郑律成和姐姐、姐夫、杜君慧等一起到达南京，经商定去向时，郑律成毅然决定去延安。但由于路费困难，由杜君慧引荐，见到了李公朴先生，李为资助郑律成慨然拿出30块银元作路费，并写了一封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主任的介绍信。郑律成背着他心爱的小提琴和曼陀铃离开南京，于10月间到达延安。他很快进入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又转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在那里，与时任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重逢后，他便进入了一个施展音乐才华的新天地。边区抗日军民沸腾的生活，炎黄子孙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促使他的创作激情更加旺盛，著名的《延安颂》就是这期间写成的。

1938年底，郑律成在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音乐指导时，他和诗人公木像亲兄弟一样和睦相处，他从公木的诗篇中寻觅创作题材，很快为《子夜岗兵颂》谱了曲。翌年初，郑律成在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关怀下，在音乐创作上，也进入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旺盛时期。

同年夏，他和公木商议，合作创作《八路军大合唱》，公木首先写出了《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歌词，继而又写出了《骑兵歌》和《炮兵歌》。郑律成于10月间将这些歌词谱完曲后，很快在陕甘宁边区军民中传唱。郑律成作为抗大的音乐教员，经常活跃在抗大各个大队，他热情地、不知疲倦地教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他自己谱曲的《延安颂》等革命歌曲。特别是他创作的《八路军大合唱》中的《八路军进行曲》，气势磅礴，旋律雄壮，生动地刻划了人民子弟兵的英雄形象，表现出八路军勇往直前、无坚不摧、克敌制胜的英雄气概，深受广大军民的喜爱。在那血与火的战争年代，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指战员，就是高唱着"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敌人的后方"的战歌，英勇杀敌，前仆后继，取得一个又一个战斗的胜利，在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解放祖国大地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支歌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建国后，又被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郑律成在延安还先后创作了抒情独唱曲《新山歌》、《延水谣》，群众歌曲《发动游击战》、合唱曲《准备反攻》，大合唱《抗日骑兵队》等三十余首歌曲。延安时期是他音乐生涯的旺盛时期，这与他的世界观和艺术观的根本转变和日臻成熟是分不开的。

1942年5月，郑律成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为实践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文艺是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理论，他不顾身患肺结核病的情况，毅然向党组织提出到战火纷飞的敌后战场的请求。党组织批准了他的请求。离开延安前夕，他深情地对刚结婚不久的丁雪松说："病魔不能动摇我抗日的决心，就是死，我也要死在战场上"。不久，他背起行装，跟随武亭等同志来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当时，正是日寇大举向太行山"扫荡"，战斗异常频繁，生活极端艰苦，他日夜随军爬山涉水，在太行崇山峻岭、险峰隘关和清漳河畔，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歌声。他无论在八路军总部或一二九师，走到哪里，战士们就欢迎他唱《延安颂》和《八路军进行曲》，前方的抗日将士为能目睹这位年轻的朝鲜籍音乐家而欢欣鼓舞。郑律成在烽火弥漫的敌后战场，积累了丰厚的创作素材。

1943年，郑律成曾一度参加过武工队的战斗生活，转战在河北元

1951年郑律成在朝鲜前线某阵地

氏、赞皇一带。他曾冒着生命危险，机敏地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进入敌占区，用石灰在墙上写抗日标语，教儿童唱抗日歌曲。生活极端困苦，吃的是玉米黑豆掺野菜，没有食盐，也没有油，什么困难也吓不倒他。直到1944年，他才从前方回到延安。

抗战胜利后，郑律成和在延安的许多朝鲜同志一道，要回到朝鲜从事建设事业。1945年9月初，他同爱人丁雪松和两岁女儿郑小提，披星戴月，昼夜兼程，离开延安，东渡黄河，途径晋西北、张家口、承德抵达沈阳，于12月间才回到朝鲜平壤。郑律成在长途跋涉中不顾劳累，酝酿着《朝鲜解放进行曲》和《三·一进行曲》等歌词的旋律，作为献给自己祖国的礼物。他到朝鲜后，更加勤奋创作，以歌颂祖国解放、歌颂军队为红线的歌，很快响彻朝鲜大地，深受朝鲜军民的喜爱。

郑律成曾任黄海道委宣传部长。1947年，又出任过平壤朝鲜人民军俱乐部部长等职，他还亲手筹建了人民军协奏团，并亲自兼任团长，经常到各地巡回演出。由于他在音乐事业上的突出贡献，曾多次荣获"模范劳动者"光荣称号和奖励。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9月，丁雪松奉调回到中国。正当平壤撤退之际，在中国驻朝使馆关照下，郑律成送八十高龄母亲于10月间来到北京。11月，郑律成便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创作组奔赴朝鲜前线，同刘白羽、魏巍、华山、李庄等，从平壤抵达汉江前线，先后深入到志愿军第五十军和三十八军战地采访，为讴歌志愿军将士的英雄事迹，他先后为刘白羽作词的《歌唱白云山》、欧阳山尊作词的《志愿军十赞》和凌子风作词的《汉江小唱》等谱曲，这些旋律明快、音调昂扬、节奏轻捷、充满战斗激情的歌，成为激励志愿军指战员克敌制胜的精神力量。1951年，郑律成在朝鲜前线坑道里的一张照片背面，记有一句话："听着响得很近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音乐家就是在敌人枪炮声的伴奏下，写出了这些不朽的旋律。

建国后，他始终坚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广收博取，吸取创作养料，先后写出了各种形式和多种体裁的音乐作品二百余首(部)，这些活泼、清新、充满生活气息的歌，至今仍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这一时期，他还由歌曲转向大型歌剧创作，对我国新歌剧的发展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1957年，他为完成歌剧《望夫云》的创作，曾多次奔赴云南，深入到白族人民中采集民歌民谣和曲调，终于把《望夫云》搬上舞合，受到各界好评。1961年，郑律成对流传在我国民间孟姜女的故事发生浓厚的兴趣，他约路工一起三下江南，到苏州民间去体验生活，当路工赶写出《孟姜女》脚本后，又深入到民间去听民歌，听评弹，看苏剧。但后来由于"左"倾错误干扰，而未能完成这部歌剧作品。

郑律成生命最后的10年，是在"四人帮"横行的灾难中度过的，他曾无辜涉嫌"特务"，受到不公正对待而心情压抑。当时，就连他在延安创作的《延安颂》、《八路军军歌》等，也被批判和禁唱。但郑律成不悲怆，不屈服，埋头为毛主席的诗词谱曲。这充分反映他作为一个对党无限忠诚的共产党员在身处逆境中坚定的立场和信念，以及他乐观、豁达的精神境界。当"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他十分高兴和激动，立即着手谱曲讴歌这一伟大胜利。正当他准备创作怀念敬爱的周总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等作品时，他突患脑溢血症，于1976年12月7日在北京逝世。

郑律成同志是一位伟大的忠诚的国际主义战士，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杰出的音乐家。他40年音乐生涯如一日，创作了各种题材音乐作品三百余首，为我国音乐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对党忠心耿耿，无私无畏，无论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在革命圣地延安，在烽火连天的太行山，他都经住了严峻的考验，始终坚持创作，特别是他在延安时期的突出贡献，奠定了他在我国音乐史上的地位。

(**作者附记**：本文已经丁雪松同志审阅。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责任编辑　凌　辰)

满江红

香港回归祖国

● 马尚武

步岳飞《满江红》词韵，将其征战环境和悲切的情调，改为胜利祥和的环境、欢快奋进的情调。

璀灿珠冠，翘首处、归堂移歇。
喜展眼，南天欢啸，中华英烈。
几代生民蒙垢土，
万千百姓圆新月。
岂等闲，举布浪潮头，情何切？

割让耻，今已雪；
弱国恨，终未灭。
敢图强突破、须臾难缺。
手携华裔亲骨肉，
心融鼎沸炎黄血。
昂龙头，飞舞跨银河，游天阙！

一支拙笔歌昌世 三副长联颂伟人

● 刘　利

在神州震动、举国同悲的日子里，为深切缅怀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又见多家报纸首刊或重登500字拙作《广安邓小平旧居联》。从而，引起更多的人对这副长联的广泛关注，先后几家报社来电采访，问我何时引发起给小平同志恭撰长联的，以及创作经过和此时此刻的悲痛心情。我作为小平同志的同乡，要回答这些提问，还得从小平同志的广安旧居谈起。

邓小平同志旧居，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镇牌坊村，距县城北五公里。这是一座倒“凹”字形农家小院。穿斗房架，青瓦屋面，白粉墙壁，石板院坝，鸳鸯花台，雌雄铁树，两行芭蕉，对排塔柏，百本嘉卉，千竿秀竹，给人一种古朴、典雅、凝重、恬静之感。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就出生在这里，并度过16个春秋，于1919年离家投奔革命。旧居早已修饰一新，并从川鄂公路西侧，专筑车道直通，以便中外游人参观。

我第一次敬谒小平同志旧居，是在1984年冬。旧居对外开放还不久，展品也不多，显得空荡荡的；庭院少花草，门楹无对联。于是我萌发了定为小平同志旧居恭撰一副对联的强烈愿望，以表达我对小平同志的崇仰之情。

随即着手搜集资料，进行创作。当时，由于象我这种半辈子和砖瓦墙材打交道，处于“寻常百姓家”的特定环境，竟要对领袖人物，尤其是象邓小平这位在政治生涯中三落三起的领袖人物，他那几十年传奇般的战斗经历与革命业绩，进行较全面的搜集和凝括，确实难度较大。随着资料的不断积累与丰富，联稿也随之一改、二改、三改，直到1987年1月，始定初稿，只有478字。翌年3月，长联荣获全国老同志言志征联大赛一等奖第一名。

长联得奖的消息传到了我的家乡广安，县里金刚砂布厂王德森、孙晓为两位厂长早有筹议，拟将长联镂板展挂于小平同志旧居。于是当时议定：由广安人撰联、广安人书写、广安人雕刻、广安人赠送，以充分表达广安乡亲对小平同志的敬仰深情。几经筹措，长联采用500字第二稿刻板，于中国共产党72周年华诞前夕（1993年6月30日下午），在旧居院坝举行了由县政协主持的、县有关部门数十人参加的赠联展挂仪式。

在长联展挂的同时，由广安县金刚砂布厂出资，第一次就印成彩色《便览》5万份，被列为旧居旅游精品，广为传扬。翌年，先后有多家报刊上转载，但所录联文偶出谬误，最多的竟错15字，实难一一勘误。缘于斯，特征诸卓识，反复吟审，欲臻尽善，遂于1994年6月30日，将二稿略酌小改，字数不变，敲定三稿。近期，所见多家报纸刊登此联，用二稿检对，但仍有个别异文，多的竟错11字。鉴于此，为力求精工与统一勘误，现将拙文投寄《炎黄春秋》杂志，举凡今后引用斯联者，概请以此三稿为准。其联曰：

小事宏观，大事微观，成事纵横观，败事主客观，牢树英雄宇宙观。隆焉壮也！深谋善断，手理万机，争朝夕，筹议维新。忆曩昔峥嵘岁月：旅法留苏，备尝艰险话长征；中原逐鹿，桂岭打狼，淮海缚龙，巴川捉鳖。为解放鸿基，殊勋屡建。抗群魔，枉重灾，竟落得抄家削籍，乐抱初衷无悔；耿耿兮，怀萦积愤，笃行马列志弥坚。十年浩劫，几度沉浮，不减英雄本色。九州思治，回挽狂澜，净扫红羊甘受命。昭雪顺民情，错冤假案全甄；洗余污，消余悖，废虚拨乱，弘扬务实精神。倏闻鼙鼓乍喧，仰赖才通韬略，军威赫赫滇陲震，还我金瓯。推贤荐智，古崇尧禅

舜谦；惩佞诛奸，近斥江欺林篡。高风亮节，彪炳千秋，举世尊称当代伟人。堂堂仪貌，秩秩德音，岱岳登峰天下小。

平时剑气，战时勇气，穷时傲骨气，达时豪迈气，素标俊彦凌霄气。卓尔康哉！灼见真知，身兼数任，辨是非，指挥若定。看今辰锦绣河山：翔鸾集凤，犹记忧欢图永固；厂矿扩权，农渔包产，税盈同课，党政分工。对共和绪业，构想常抒。统一国，存两制，已会签复港收濠，喜传夙愿将酬；拳拳者，腹置专诚，早合台澎心更切。廿纪嘉猷，双番增殖，倍钦俊彦襟灵。亿户脱贫，振兴华夏，紧催赤骥欲腾空。律科孚众望，残陋陈规尽破；开自锢，启自封，肃弊纠偏，控占攻尖领域。漫谓特区刚辟，敢蒙计盖研桑，捷报频频琼岛彰，琢斯玉璞。引技融资，外促欧交美贸；择优蕴粹，内襄体改枢移。裕庶强邦，晖荣百族，环球盛赞亚洲奇迹。奕奕神功，皇皇正道，乾元转斗泰阶平。

这副500字长联，得到不少方家的赏评：联作以精当的文字，流畅的笔触，典雅的格调，敬仰的激情，热忱颂扬邓小平的革命生涯和历史功绩。上联侧重于历史性的政治风云和武装斗争；下联侧重于现实性的经济建设和远景构想。全联立意拓新，遣辞协律，引史焕彩，化典生辉，堪称当今联坛宏篇佳制。同时采用“双钩格”于上下联起收处，重嵌“小平”两字，真是匠心独运，更显作者文学素质的造诣与功底。面对这些溢美过誉之辞，深感汗颜，多谢鼓励。

由于联作要正式选编入书和镂板展挂，必须截期止事，尽快敲定。1990年底，虽对长联初稿进行了增改，形成二稿，增为500字，但也只写到1989年11月9日，即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最后一个领导职务时。1992年初，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进一步激励了全国人民改革开放的锐气和雄心，在政治领域、思想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中，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剧变。小平同志这次南行所阐述的哲理与一年来的诸多胜事，都未写入500字长联中。于是又新拟了一副《〈南方谈话〉周年纪胜联》，作为前联的续篇。其联曰：

胜语四邻惊：顿解姓资姓社。赞宏纲继举，一中心、两基点，肯定百年不动摇。善筹衣食住行，万全拓肆；广集工农商学，百业向荣。审时展逸才：公营、自营、联营、独营。确论拳拳宜省识，有利三言：利民、利国、利生产。最信赖，八旬健者导航，兴市场经济，率亿庶小康，改革再奔千里马。

风流三代领：殷期图富图强。庆盛会隆开，七常委、六书记，诚教万众齐钦仰。喜看湘淮渭汉，百舸争流；欣闻厂店城乡，万车转轨。因地扬优势：海贸、边贸、路贸、江贸。大潮滚滚莫迟疑，欲求四化：求速、求成、求创新。且欢歌，五颗红星闪耀，揽科技菁华，挑十桩重任，奋飞更上九层霄。

这副212字的长联，作于1993年春。上联侧重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下联侧重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庶绩。两轴同位处，嵌“一”至“亿”20个实数词，同数同位，难度颇大。

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爱国忧民，为人民的解放伟业、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和精神支柱。正如《邓小平》电视片中所提示，当他第二次在江西处于逆境时，日复一日地在通往拖拉机厂的“邓小平小道”上，就开始对中国严峻的势态进行深刻的思考。这位总设计师明确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场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对这第二次革命的新长征，我又拟了一副颂联。其联曰：

小能见大，振奋攀星入海精神：月游蟾窟，溟闯骊宫，九州兴废仰公筹。高瞻远瞩，强邦路线重开：导航转轨；肃弊倡廉。贤哉！慧眼识真才，拓展始嫌天地小。

平可出奇，弘扬破雾凌云气概：身居牛棚，志冲骥枥，半纪春秋跟党走。实干笃行，裕庶方针另拟：包产扩权，招商引技。卓尔！雄心张正道，回归终赞陆台平。

全联118字。同样采用“双钩格”重嵌“小平”两字。

我也是广安人，虽与小平同志无一面之缘，却一直景仰我们的总设计师。

小平同志走了，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作为小平家乡人，我谨以三副长联敬献当代伟人。

（责任编辑　凌　辰）

明末忠良杨继盛冒死斗奸佞

●春　晓

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公元 1555 年）十一月的一天，京师（今北京）大地，北风凛冽，寒气逼人。在通往京西的刑场路上，一个披带刑枷的中年汉子，面对佞臣奸贼的屠刀，大义凛然，昂首走向刑场。他以悲壮的音调，朗诵着那首感人肺腑的诗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沿途为他送行的人们无不掩面痛哭。他，就是敢于揭露奸党卖国丑行，惨遭杀害的杨继盛。

寒窗苦读　才华初露

杨继盛，字仲芳，别号椒山（1516—1555 年），今河北省容城县西河照村人。幼年家贫，七岁丧母，继母对他管教严格。他每天趁放牛时，把牛赶到乡里私塾旁，听那些幼童琅琅的读书声。他回家对哥哥说："为何不叫我去读书？"他父亲知道后，答应让他一边放牛，一边读书。由于他日不释卷，博闻强记，深受塾师和他父亲的喜爱。13 岁那年，杨继盛就师于定兴县江村永传寺庙内私塾，他熟读了《诗经》、《春秋左传》、《礼记》、《礼仪》等传统经典，加上名师指教，学业精进，成绩名列前茅。

一次，私塾新来了一个年纪很大的学生，老师问他为何这么大年纪才上学，便有意出了一个含有嘲讽意味的对子考他："老学生"。话音刚落，坐在一旁的杨继盛脱口答道"小进士"。老师感到惊奇，伸出拇指连声称赞他聪慧过人，将来定是国家有用的人才。

又一次，老师外出了，同学们三五成群在一起做游戏。当玩兴正浓时，老师回来了，同学们慌忙躲藏。老师一见发怒，责问为何不读书，并一个个拉出来罚跪，然后出了一个对子："藏形匿影"，老师说，"谁能对出，免于罚跪"。只见杨继盛第一个站起来答道："显姓扬名"。老师一听拍手称赞："真乃绝对也。"杨继盛经过十年寒窗苦读，能诗善文，他成了老师心目中最优秀的门生。

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 1547 年），时年 31 岁的杨继盛，到京师以优异成绩考取进士。不久，朝廷命他做了南京吏部主事，稍后，又提升为兵部员外郎。

杨继盛名联拓片

首弹仇鸾　反遭贬谪

杨继盛在南京任上，忠于职守，清廉自律。当时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嘉靖年间，皇帝昏庸无能，军政大权被奸党严嵩和仇鸾一伙把持着，蒙古贵族乘机累次举兵进犯中原。公元 1550 年，俺答统兵长驱直入，打到北京城下，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而身为丞相的严嵩和总兵仇鸾，不但不举兵抵抗外侮，却极力主张卑躬乞和，卖国求荣，妄图通过所谓"互市市马"来满足俺答的侵略野心。杨继盛知道后怒不可遏，坚决反对这伙卖国贼推行的不抵抗政策，他说"划出领土作交易，有损国家尊严"。他连夜奋笔疾书，在奏疏中鲜明地提出"十不可"和"五谬"：

曾下诏北伐，天下知晓圣意，日夜征缮，助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于天下，不可也。

堂堂中国，与之互市，冠履倒置，不可也。

海内豪杰，争磨砺待试，一旦委置无用，异时号召，谁复兴起，不可也。

……

杨继盛面对外侮，心急如焚，陈述自己爱国之心，恳

请朝廷举兵抗敌，把侵略者驱逐到国门之外。仇鸾指责杨继盛不懂国家军政大事，不仅不采纳他的主张，还在世宗皇帝面前诬蔑他有意“阻扰边计”，破坏朝廷既定的所谓“边疆战略”。于是下诏将杨继盛关进监狱，不久，又把他放出来，贬谪到甘肃省狄县去做县官。

狄县，是个少数民族杂居之地，那里气候恶劣，黄尘敝日，地瘠民贫，百姓不堪赋役之苦，纷纷外逃。杨继盛在任期间，为狄县老百姓办了许多实事、好事。例如，他亲自深入到乡间去体察民情，安抚贫民；广招人才，发展教育，发展畜牧业；采取措施，减轻赋役；并力矫时弊，肃清污吏；社会秩序好转，老百姓生活有了改善。杨继盛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自己粗茶淡饭，十分廉洁。被当地老百姓称赞为“杨父”。杨继盛死后，百姓曾在狄县境内修建了“杨忠愍公祠堂”，祠堂门两侧，悬挂着联额，即杨继盛的名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勇弹严嵩　惨遭杀害

严嵩和仇鸾相互勾结，推行的“互市”政策没有多久，俺答又举兵进犯，一直打到今河北蓟县一带。世宗皇帝悔悟当初没有采纳杨继盛的卫国方略，把他从甘肃召回内地，先让他在山东诸城当县令。一个月后，又调任南京户部主事，不几天，又改任刑部员外郎。严嵩见杨继盛复出心怀恶意，千方百计打击陷害他。严嵩这个精通权术的佞臣，先是想用提拔的手段拉拢他，提升杨继盛为兵部选司员外郎。生性刚直的杨继盛，一眼就看出严嵩不怀好意。他认定严嵩是国家衰败的根子，是祸国殃民之首恶，“严嵩不除，国无宁日”。杨继盛复出不久，即发出忧国忧民的感慨。他终于下定为国除奸、忠心报国的决心，勇敢上疏弹劾严嵩的“十大罪”和“五大奸宄”。他在疏中坦诚直言道：“陛下奈何爱一贼臣，而忍百万苍生陷于涂炭哉？”“若以臣言不实，可召景、裕二王询问，也可诏阁臣核实。臣感陛下之恩，不敢不冒生以闻。请陛下顾念苍生，惩治奸臣”。

谁知杨继盛朝上奏章，暮入诏狱。原来世宗初见，深感痛切，但又下不了决心，即召严嵩对问，严嵩先是一惊，然后指着疏尾反诬道：“继盛私通二王，诬陷臣下，请陛下明鉴。”世宗反而觉得严嵩言之有理，怒斥杨继盛胆大包天，竟敢于教训起自己来了；加上严嵩极力在世宗面前挑拨，激怒了世宗，便下诏再次将杨继盛投入牢狱。

严嵩这个奸相，惯于施展借刀杀人的诡计，例如，他诬陷浙闽总督张经和浙江巡抚李天宠犯有所谓“玩寇殃民”之罪，想置于死地，竟然将杨继盛的名字列在张经和李天宠的疏后，杨继盛也被定成死罪。

临刑前，杨继盛的妻子张氏曾上疏为夫伸冤，并要求代夫受刑，却被严嵩扣押不报，杨继盛终于饮恨惨死在严嵩的屠刀之下。

沧桑古墓　　丹心千古

位于河北省定兴县东引村东侧里许，一处叫卧龙岗的土台中，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距今已四百余年的古墓，那里长眠着明代与海瑞齐名的廉吏杨继盛。

我曾在清明节前往谒墓，并在杨继盛十三代孙杨德才家中，见到一幅弥足珍贵的杨继盛彩色画像，据说原像早损，系前几年重新修复装裱。遗像穿红衣，执简笏，画工精细，一看就是出自名家之手。像的上端有“题赞”：首行书“杨忠愍公像赞”，末行署“皇六子撰并书”，无年月，只有红印色“皇六子印”。

我曾从有关史料考证确认，画像为清乾隆年间著名画家张月川所绘，“题赞”为清高宗第六子质庄亲王永瑢撰文行笔。不妨抄录于下，以飨读者：

公之蹶生，家于容城。饭牛草泽，以煎以薪。
公之嗜学，志为名臣。读书僧舍，以饪以烹。
少失怙恃，则友其兄。敦师笃友，迈德振民。
潜心经术，考律正声。揲蓍决数，脱剑谈兵。
远睎三代，高扪九阏。跻彼泰岱，云气悖兴。
赋诗寄意，亮节崚嶒。既成进士，列曹铨衡。
改隶司马，巾车是膺。鸳鹭刷羽，鹏鹗振翎。
侯鸾逆议，蜂螫騬撄。毒遭反噬，狄道孤征。
瓦砾毁弃，铁中铮铮。入勷秋典，旋稽武勋。
相嵩秉政、鄢赵为群。奸五罪十，神州憎瞋。
执简奏劾，诋斥纵横。俯踏虎尾，仰忤龙鳞。
是非飚烈，谁扫雾雰。公忠以伸，嵩恶遂倾。
浩然之气，上轶苍冥。伊古千桢，宗社之灵。
如风草劲，似金石贞。彪炳史册，光耀日星。
公之精诚，直谏殒生。千秋万祀，永荷褒旌。
哀哉遗训，沥血缕陈。妻淑子令，垂裕后人。
瞻公之形，知公之神。世以为楷，景此典型。

我曾将这幅珍贵的画像拍照下来，赠给著名作家端木蕻良先生。他曾对我说过杨继盛的生平，当他端详着这张遗像时，不禁激起感情的波澜，他说着说着老泪横流：“杨继盛是个爱国忠臣，他死得真惨呀，怎么忠良就没有好下场？”他的夫人急忙从书房走过来劝慰说：“端木是个富于正义感的人，他对古今世间不平的事爱激动，也许是文化人特有的气质吧。”1996 年，在端木老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抱病写下一篇散文《杨椒山遗影》，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虽说杨继盛已死去几百年了，但至今仍活在许多人的心里，他是永生的。

（责任编辑　吴　畏）

“天国”内讧

焚毁南京报恩寺塔

● 经盛鸿

1856 年 10 月，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的上空正翻腾着杨、韦内讧的阴云。北王韦昌辉在杀害了东王杨秀清及其两万部属后，又阴谋杀害翼王石达开。石达开逃往安庆，起兵东下进攻天京，讨伐韦昌辉。韦昌辉急忙加强对天京的防守。天京的形势分外紧张。

这一天，一队太平军将士手捧韦昌辉的将令，从天京城南的聚宝门(今中华门)冲出，直奔长干桥南，进入位于雨花台山麓的大报恩寺。经过几年的战火，大报恩寺早已残破不堪，惟有那著名的琉璃塔仍巍然矗立着。这队太平军运来炸药与易燃物品装入塔内，只听轰然一声巨响，整个琉璃塔便陷入浓烟烈火中，这座历史奇迹的辉煌建筑便化成了一片瓦砾废墟。

世界中古奇迹
——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

据明代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一)与其他史料记载，南京城南的报恩寺及其琉璃塔，是明成祖朱棣为报答与宣扬其父明太祖朱元璋与马皇后所建。明成祖朱棣敕工部于南京聚宝门外因火灾毁坏的寺塔原址，“依大内图式，造九级一色琉璃塔一座，曰第一塔，以扬先皇太后之德。”(《江南报恩寺琉璃塔全图》，嘉庆七年报恩寺内僧刻)。因此称大报恩寺。

但据明清文人笔记与近代学者考证，明成祖实际上更多是为纪念其生母碽妃所建。碽妃本高丽人，入明宫为朱元璋妃，因未足月生朱棣，被朱元璋视为不祥，赐死，受“铁裙”之刑，死状极惨。(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朱棣成年后被封为燕王，藩地北京，后发动“靖难”之役，夺政为帝，是为明成祖。

报恩寺与塔始建于永乐十年(公元 1412 年)十月，完成于宣德三年(公元 1428 年)六月，前后历时 16 年，耗费钱粮银达 248 万两以上，其中有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后所剩的金钱百余万。因寺与塔营建工程浩大，明成祖下旨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良匠军工计 10 万人。

大报恩寺规模宏伟，占地极广。琉璃塔高 32 丈 9 尺，高出云表，巍巍屹立，塔身九层，八面开门，四实四虚，隔层错开。每层用砖数相等，但体积逐渐缩小，高度增加。此塔全用砖结构，几乎不用木料。因而在明嘉靖四十五年二月十八日，报恩寺因雷电着火，各殿堂烧为灰烬，唯独琉璃塔安然无恙。

大报恩寺与琉璃塔建成时，明成祖朱棣已死，由在位的明宣宗下旨大斋七日夜，然后点燃长明塔灯。从此，报恩寺与琉璃塔香火兴旺，信徒与游人不绝，开始了它辉煌的鼎盛时期。

清代的康熙、乾隆是两位极附风雅的皇帝。康熙帝在 1684 年(康熙二十三年)南巡到南京，登上报恩寺塔最高层，在每一层都各画匾额一块；又赐金佛一尊和金刚经一部，供奉塔顶。乾隆帝在 1749 年(乾隆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南巡幸寺，登浮图，赐御画额。”(张英:《南巡扈从纪略》)。经过这两位皇帝的褒扬，报恩寺塔更是声名大振。相传，清代皇家园林圆明园的宝塔就是完全仿照此塔所建。

大报恩寺琉璃塔，还吸引了世界各国人士。明清四百年间，慕名来南京访问的外国人络绎不绝。《陶庵梦忆》称:“海外蛮夷重译至者百有余国，见报恩塔必顶礼赞叹而去，谓四大部州所无也。”一些旅行家、文学家、美术家提出，将中国的报恩寺琉璃塔、长城与埃及的金字塔、亚历山大陵墓、意大利比萨斜塔等，并称为世界中古七大奇迹，载入许多国家的百科全书。直到 1842 年 8 月，英国远征舰队驶抵南京江面，逼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时，还以胜利者姿态游寺登塔。

在太平天国战火中的琉璃塔

1853 年(清咸丰三年)3 月,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军,从武汉沿江而下,包围了南京。在攻城战斗中,太平军曾利用高大的琉璃塔向城内发炮轰击。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记载,攻城的太平军"运仓圣庙中之炮,置报恩寺第三层,向城轰击。城内开炮对轰,砰磷之声,一日不绝。"汪士铎撰的《光绪江宁府志》卷八也写道:"咸丰三年正月二十四日(1853 年 3 月 3 日),发匪踞塔,俯瞰城中,施炮,炮弹有落中正街者"。

太平军占据南京后,在各城门外多设军营防守。其中以城南聚宝门外的雨花台军营最大,整个大报恩寺和琉璃塔都被军营包围。"山上各庙宇僧房悉圈在内,又在山顶砌有望楼一座,挺立山巅,高与报恩寺塔并峙。"(涤浮道人:《金陵杂记》)报恩寺琉璃塔被太平军用来作为监视南京东郊孝陵卫清江南大营的重要凭依。

1854 年 5 月底,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一年以后,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乘美国海军舰队的旗舰"色士奎哈那"号到达南京,对太平天国作外交访问。在南京期间,以美国海军助理军医法斯为首的几名美国官员,于 5 月 30 日特地寻访游览大报恩寺琉璃塔,成为最后游览此塔的外国人。

"天国"内讧焚胜迹

从 1851 年 1 月 11 日在广西金田起义开始的太平天国,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内,夺取了中国半壁江山,定都南京,改名天京,后又出兵北伐,前锋直抵天津,震动北京,登上胜利的高峰。可是在这胜利的形势下,由于中国农民小生产者的落后性与狭隘性,由于传统的帝王思想与特权腐化思想的侵蚀破坏,使得太平天国领导集团迅速腐败变质,争权夺利。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

东王杨秀清大权在握,骄横跋扈,"威风张扬,不知自忌",后公然向天王洪秀全逼封万岁;天王洪秀全则足不出宫,生活腐朽而又专制猜忌,秘密指示韦昌辉等人除掉杨秀清;北王韦昌辉"阴柔奸险,……(对杨)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张德坚:《贼情汇纂》),在接到洪秀全的密令后,立即率领亲信部队三千人从江西前线回师,于 1856 年 9 月 2 日晚回到天京,包围东王府,袭杀了杨秀清全家及其部属二万余人。翼王石达开在湖北前线督师,闻讯赶回,劝阻韦昌辉,不听,反欲加害。石只身吊城逃离天京,全家老小被韦杀害。石达开气愤难平,召集所部回师靖难,大军直指天京城。在这种情况下,"韦昌辉犹欲负隅顽抗,他深恐翼王凭借报恩寺古塔以作攻城之炮垒,先下令毁之。"(布列治门:《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

一场罪恶的大火在天京城南聚宝门外燃烧了几日几夜。它不仅使历史奇迹报恩寺塔荡然无存,而且也形象地宣告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走向衰亡与失败。报恩寺塔的毁灭并没有阻挡住韦昌辉的失败,很快他就被洪秀全杀死。而胜利入天京的翼王也很快因洪秀全的猜忌而分裂出走。洪秀全本人则在几年以后,天京城快被曾国藩的湘军攻陷前夕,黯然死去。

(责任编辑　吴　畏)

南京报恩寺鸟瞰图

北洋天然水寨：刘公岛

● 吴济夫

我国海防要地刘公岛，素有东海屏藩之称。清人张荫桓曰："北洋形势，威海卫岛屿环拱，天然一水寨也"。

据文化遗迹推断，早在七千年前，威海一带已有渔民聚居，汉代名石落村，元代称清泉奇。1398年(明洪武三十一年)，明政府决定在此设卫屯兵，取威慑海上倭寇之意，故名曰威海。1403年(永乐元年)筑威海卫城，同时在沿海山峰和刘公岛上修筑烟墩，使之成为北洋海防堡垒。

刘公岛之名由来久远。元、明史籍载称刘家岛，简称刘岛，其后习称刘公岛。清光绪年间，议设海军。1881年(光绪七年)，北洋舰只首次驻泊刘公岛，当时只有12只军舰。七年后，北洋舰队成立，刘公岛遂成基地。此时，北洋舰队已拥有舰艇近五十艘，约五万吨位，实力居远东各国之首。

刘公岛实际是一座山，孤峰屹立，碧海萦环。主峰旗顶山，海拔152米。该岛东西长4.08公里，南北最宽处1.5公里，面积3.15平方公里，距威海商港口岸2.1海里。其岛东、西、北三面是悬崖峭壁，巨石林立，海中多有暗礁，地势十分险要。南面平缓，岩奇谷秀，浓荫蔽日，芳草萋萋，清幽静逸，气候宜人。海滩平坦，水稳浪缓，碧波荡漾，是天然的海水浴场。清代北洋水师提督署依山面海而建，在苍松翠柏掩映下宏伟壮丽，威严典雅，远远望去如同仙山琼阁。189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由于清廷腐败无能，造成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爱国将士愤而自刎，成为近代史上的一曲悲歌。

渡海登上刘公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旗顶山南麓那座庞大的建筑群——海军公所，俗称提督衙门，当年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此坐镇议事。它依山面海，绿树荫翳，高踞危岩，气象恢宏。登上台阶，大门两侧，有东西辕门、旗杆和乐亭，对峙而立，为北洋水师庆祝大典和迎送宾客而设。迈进衙署气势宏伟威严的朱漆大门，内为三进院落，占地一万多平方米。前、中、后厅与东西厢房以及跨廊连成一体，檐牙高啄，雕梁画栋，长廊迂曲缦回，完全是我国传统的建筑风格，气势宏伟，蔚为壮观。前院西厢陈列着丁汝昌、邓世昌、刘步蟾等爱国将领的遗像和他们率领北洋水师广大官兵在甲午海战中英勇抗击敌寇的一幅幅真实的历史照片，再现了当年的激战场面。中院正面是议事厅，为当年丁汝昌和他的副官、参将们坐镇议事之处，现在成为北洋海军一次军事会议的蜡像馆。丁汝昌身着官服，坐在正中，威严沉着，大义凛然；汉纳根副提督(德国人)、刘步瞻总兵、邓世昌副将等九名副官、参将分列两旁，形象逼真，神态各异：邓世昌肃立，侃侃而谈；刘步蟾端坐，目视前方，义愤填膺；林永泰手拿战报，凝目深思；林永升侧身静听邓世昌的发言……生动地再现了北洋海军将领们的英雄气概，及其出海迎击日舰、誓死保卫祖国领海的决心。

东厅是当年丁汝昌处理公务之处，现在是丁汝昌激愤自刎报国前的蜡象。西厢展出了部分战舰的模型，后院陈列着北洋海军使用过的部分实物。当时北洋水师虽然损失和伤亡较大，但日本侵略者亦遭重创。由于李鸿章极力夸大我方损失，并电令北洋海军固守威海卫不准出战，虽然丁汝昌指挥北洋海军击退了敌人海陆两方面数次进攻，坚持抵抗10天，终因弹尽粮绝，援兵无望，才抱恨自刎殉国，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壮丽篇章。

出北洋水师提督署，沿蜿蜒崎岖的山道登上旗顶峰，旗顶山炮台建筑和当年旗杆石座犹在，虽历经八十余年的风雨剥蚀和兵火迭乘，仍安然无恙。顺山脊东望，有东峰、南嘴、东弘三座炮台，西望有麻井、黄岛两座炮台，当年共拥有62门大炮，与威海和日岛的炮台相互依恃，组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这些炮台威严古拙，带着19世纪末的古老气息，象一只只雄狮猛虎。在甲午海战中，它们发威、怒吼，使一批批敌寇葬身火海大洋，跟随北洋水师主人战斗到最后一息。

驱足山巅，俯瞰全岛，当年丁汝昌的寓所、水师学堂、巨大的铁码头……历历在目。龙王庙、刘公庙及古老的戏楼，参差于绿树丛中。新建的旅游码头，宽敞整洁。1986年修筑的环岛公路，在苍松翠柏中蜿蜿蜒蜒，绰绰约约，时隐时现。南望威海湾波光闪闪，大小船舶来来往往。如今，刘公岛已成了祖国的门户，坚不可摧的海上堡垒和名扬中外的旅游胜地，北洋水师提督署也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刘公岛真正成了璀璨夺目的海上明珠。

(责任编辑　赵友慈)

在嘉峪关上

● 陈淀国

嘉峪关，坐落在祁连雪峰和马鬃黑山之间，是我国万里长城西端的终点。

我站在城关极目远望，绵延起伏的群峰，突兀挺拔，犹如一列刺天利剑。

居高鸟瞰，这座正方形周长为七百三十三米的城堡。空旷、森严，昔日屯兵之地，如今却已是花红柳绿的"关中之园"。城的东门、西门上，耸立着雕梁画栋的三层楼，城苑四隅的角楼，壮观多姿，造型别致。当东西方经济、文化最兴盛时，这里还是驼铃叮咚的古丝绸之路的隘口，直到明洪武五年(1372 年)才建嘉峪关。葡萄牙人鄂本笃，1602 年就是沿着这条古道，从印度来到中国，并曾写道："由哈密行九日，抵支那国北方之长城，此城世界著名。停留处曰嘉峪关。在此休息二十五日，以待省总督之回音，可否入。至后总督复音许入，于是起身。行一日抵肃州(酒泉)。"

严格地讲，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之说，不够确切。从历史看，长城是分期、分段而建，东边最远到鸭绿江，西边远达新疆罗布泊。

嘉峪关不但城墙高大，城堞也坚厚。可以想见，用砖的数量会是何等惊人！这些砖是在百十里远的地方烧制后，用牛车运到城下，再由劳役顺着陡险的"马道"，用肩膀一块块扛到工地的。

据说有一天，一个放羊娃来到城楼上看望在那干活患病的父亲，一见老人累成那个样子，悲痛之余，便悄悄动起脑筋。他从腰间解下布带，一头拴上一块墙砖，搭在羊背上。短鞭一挥，山羊轻而易举登上了又高又陡的城墙。于是，工匠们无不仿效此法，由羊群替人运砖。

嘉峪关墙底砌着的一块块一人多高的巨型青石。它们都是从很远的山上开采、加工的。可是天寒地冻，坡陡路滑，人抬不动，车拉不便，怎么运出去呢?

正在人们一筹莫展时，有位老石匠想出了个妙主意：大伙七手八脚，引来山泉水，浇在坡道上，很快形成一条银光闪闪的"传送带"，把一块块成吨重的巨石，送到了目的地。

当我兴致勃勃来到阁楼，经人指点，见到阁楼后墙的檐台上，有块大砖。原来这里边也有段动人的传说哩！

修建嘉峪关，有个精通"九九算法"的老工匠易开占，智慧非凡，他计算用料，能精确到不差一块砖。

当时，主管修关的监事官，根本不相信他有如此高超的本领，故意在施工备料中，偷偷地多加了一块砖。结果，当这座巍巍雄关关楼建成，恰恰多出了一块砖。人们为了表示对这位能工巧匠的敬佩与怀念，把这块砖一直保留下来，放到阁楼后墙的檐台上，并把它叫做"定城砖"……

我漫步到城楼东侧一棵孤树下，有个青年在专心写生。画的是《嘉峪晴烟》。上面还写着一首诗：

烟笼嘉峪碧晴岘，影拂昆仑万里遥。
最是晴天闲望处，薄云淡雾锁山腰。

小伙子停住画笔，主动告诉说：这诗是明代诗人戴弁所作。而这"嘉峪晴烟"，又是肃州著名八景之一：每当晴空万里之时，便会在这一望无际的瀚海戈壁上，看到嘉峪雄关犹如一艘巨大海轮，被茫茫晨霭所包围一般，显得壮观、柔和。

他还告诉我，当年修建这座嘉峪关，几万民工，风餐露宿，用蓬蒿做柴，戈壁滩从早到晚烟雾不断。尽管工完人离，可这烟雾却久久不散。越是晴天越是明显。

我离开嘉峪关时，已夕阳西坠，绚丽的晚霞把嘉峪关点染得更美、更美。

(责任编辑　刘　文)

嘉　峪　关

编读窗

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

——读萧克《朱毛红军侧记》有感

● 靳树鹏

四年前的夏天，萧克将军为《陈独秀诗集》写了序言，此前，特地邀我们几位编者到京交谈这部诗集的注释。老将军平易近人，他论诗及人，笑语风生，兴致勃勃同我们谈了两个小时。临别时，他又把刚出版的大作《朱毛红军侧记》题签赠送。这是一部关于党史、军史的重要著作，翔实生动地记述了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

萧老在这部书的前言中说："这是一个曾在朱毛红军战斗过的老战士的怀念与追思"，"我不满于自己的记忆，许多问题都是在翻阅大量原始资料基础上进行研究的，还曾与一些当事人商讨，与党史、军史部门的研究人员共同研究，认真甄别分析，做到事实准确，至少减少错误"。"史是传信之书"，"一字之出，必须慎重"，"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

将军风仪，感人至深。

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所谓历史就是胜利者的历史。史家固然要分析判定成败，但史家并不总是以成败论英雄。司马迁就不大欣赏"成王败寇"的历史观，他的《史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但司马迁在《史记》中敢把陈涉（陈胜）列入诸侯，写为"世家"，肯定了这次起义在亡秦中的作用，可与汤、武的功业相比。对垓下被围、乌江自刎又从未做过帝王的项羽，司马迁却给我们留下一篇精彩的《项羽本纪》。这篇本纪写得笔酣墨饱，对项羽充满了同情，有赞美也有批评。倍受后人赞赏的失败的英雄很多，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已成千古绝唱。他在《后出师表》中的"鞠躬尽力（后人传载时多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句，一直被人们传诵。

有一部书确实是为胜利者而写的，曾被"经典"化，这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据记载，这部书先后用 67 种文字出版 301 次，印数达 4281.6 万册，是苏联图书出版史上印数最多的出版物之一。1938 年 11 月 14 日，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党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的宣传提法》的决定。《决定》把这本书说成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新的强大思想武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域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

其实，这部书许多地方歪曲了历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避而不谈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反而通过斯大林的某些著作夸大斯大林的功绩，以论（斯大林之论）代史，形成"那里有斯大林，那里就胜利"的叙史模式。这部书给斯大林罩上了一贯正确的光环，长期以来成为"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

这部书出台之前，斯大林就说："结束对党史叙述的随意性和混乱状态，消除在已出版的许多党史教科书中存在的大量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对党的理论和党的历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的随意解释。"一个执政党的领袖，不允许随意解释党的历史，本无可厚非，但不允许存在不同的观点，就等于扼杀了历史科学。撰写历史更需要时间的过滤和沉淀，也只有通过不同观点的比较研究才能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我们党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支持依据史料的认真的史学研究，鼓励不同观点的争鸣。但我们也要看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对我们有过不小的影响，所以史学工作者才注意清除这些影响。

萧老的治学箴言是："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伪造历史，可以遮人耳目于一时，但终究要被历史唾弃。

（责任编辑　家　驹）

《我所知道的沈钧儒一家》的照片说明有误

周总理侄女、沈钧儒的孙媳周秉德同志来电话，指出《炎黄春秋》第 3 期《我所知道的沈钧儒一家》一文配发照片的说明有误，应改为："作者与沈人骅、周秉德夫妇及其子孙合影"。

本刊编者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非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所讲

《炎黄春秋》每期必读。天津开人代会期间，我带去几本，被其他代表拿走，说要仔细拜读。

今年第3期让我爱不释手，又使我了解到几个过去不知道的事件和人物。与天津有关的内容，也令我感兴趣。爱国企业家毕鸣岐是我很熟悉的原天津市副市长，他的夫人就是新华社报道的天津工商十大姐之一，我们都很熟悉；陈必第的丈夫张纪正是天津有名的大夫。

不过，介绍陈必第的文章中写道，1949年10月1日那天，陈必第在天津一个叫“法国公园”的地方听到广播，说毛泽东在天安门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这句话是毛泽东1949年9月21日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讲的，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并未讲这句话，是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这个错误，在不少报刊上都曾出现过，在《炎黄春秋》这个史料性很强的刊物上再次出现，是很不应该的。　　**天津　　石坚**

我家两代人与《炎黄春秋》是朋友

1992年，我在保定火车站书店偶然见到了《炎黄春秋》，从此坚持每月购买。我手头保存了1993年以来的全套《炎黄春秋》，这是我保存最好的一种期刊。

我订阅了一份《炎黄春秋》，总有人向我借阅，借阅者又传给好几个人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期刊世界中，《炎黄春秋》以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为办刊原则，不仅受到中老年知识分子、干部的喜爱，连我三十几岁的儿子也争着阅读。《炎黄春秋》成了我一家两代人的朋友。

有些文章留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但也不无值得商榷之处。如1996年第1期关于陈布雷、陈琏父女的文章，不仅写了陈家父女政治上的分歧，也写了陈布雷对女儿的绵绵父女之情，可见题目只说父女分道扬镳是不够的。

另外，1996年第5期和1997年第1期各有一篇谈西安事变的文章，仔细对照，有不一致之处。如召开政治局会议到底是在毛泽东处还是在张闻天处？两篇文章说法不一。

保定市干休所　　安伟

《炎黄春秋》充实我晚年的生活

我离休前，有十多年是搞文史和党史工作的专职干部，因而对宣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宏扬党和民族优秀传统的书刊，怀有特别的深情。《炎黄春秋》恰恰适合我的阅读兴趣和晚年工作的需要。我离休以后，仍帮助文史和党史部门做些征集资料的编辑、审阅工作；在老干部支部里，我是副书记兼宣传委员；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举办讲座还有时邀我参加。《炎黄春秋》自然成了我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像今年第3期的《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知识分子政策上敢说敢为的陶铸》，第2期的《60年前延安处理的一起高干犯罪案》，第1期的《谭震林清廉的一家》。去年的《说实话办实事，陆定一立德立言立身》、《错误开除刘少奇党籍时陈少敏唯一反对票的是非毁誉》、《试析“康生现象”的历史条件》、《葛佩琦“大右派”的“铁案”是怎样翻过来的》、《张闻天为何三让总书记》、《李默庵纵谈湖南起义》，以及《在农村工作大论争中求实直言的邓子恢》和《1958年那条“总路线”形成前后的党内争论》等等，都是我们这些工作几十年，经过了这些运动的老人所需要了解的历史真相。既是我们写回忆录需要的参考史料，又是教育中青年干部和广大青少年的好教材。

中共湖南宁乡县委老干部支部
周德民

多登些反映事实真相的“亲历”的文章

我以浓厚的兴趣读了《炎黄春秋》第3期，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发生过许多影响深远、震撼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重大事件。我认为，趁当时亲历和参与了这些事件的老同志还健在，把这些事件的真相如实地写出来，传之于世，汲取教训，“以史为鉴”，教育国人，无疑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炎黄春秋》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登出了许多使人振聋发聩的文章，受到广大读者的赞许。请接受我——一位忠实读者对编辑同志的衷心感谢，并望通过编者向所有本着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秉笔直书的作者表示深深的敬仰之情。

兰州金昌路甘肃省电力局
干休所　　　　牛兆奇

炎黄春秋

毛泽东蒋介石座上客
根据地国统区穿梭人
胡仁奎传奇

从越南来的洪水将军

1950年上海拉响空袭警报

“天国”内讧焚毁南京报恩寺塔

乐坛英才郑律成

奔向延安热土

ISSN 1003-1170

05>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邮发代号：82 — 507
订阅价：4.00元　零售价：5.00元